

泥比邻 土香

2016年4月
NO. 捌
社区伙伴出版

- 专 题 当我们谈论PGS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个共同的农夫市集的PGS之路
城乡农协力，重建信任之路
- 行动者 青年影像行动：永远都在过程中
- 见 远 老子和量子物理学
在“人的普遍智识”启迪下的思考
- 解 读 为了死得平静而坦然





泥比 土邻 香

《比邻泥土香》第八期

2016年4月

(内部资料)

出版：社区伙伴

地址：香港九龙佐敦西贡街20号志和商业大厦13字楼

电话：+852-24580011 传真：+852-24307099

编委：邓文嫦 陈宇辉 黄励 梁笑媚

编辑：陈靖 高雪松

插图：全海燕 设计：张晓磊

承印：广州今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声明：刊内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如需转载，请联络：blntx@pcd.org.hk

网址：<http://pcd.org.hk>

往期下载地址：<http://pcd.org.hk/zh.hans/content/刊物>

(本刊使用大豆油墨及再生纸印刷)

刊首语

从去年夏天开始筹划准备这一期《比邻泥土香》，内心一直混杂着兴奋和忐忑的感觉。待文章初具雏形后，忐忑不安的感觉更强了，哎，这一期好多篇文章都是篇幅超长，而且用了很多专业术语，就差没出现最高深的物理学公式了。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一期文章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十分有关系，比如，今天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吃饭、吃这样的饭？

记得在北京和田松老师讨论时他说到，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在吃着“机械自然观种出来的米”，这样的米不健康也不好吃。田松老师接受过很严密的科学训练，但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没有提到任何技术性的解决手段，反而提到他经常会带女儿到京郊的农场去走一走，接触泥土和农人。

当时我们开始准备《专题》的组稿，正在学习国内越来越红火的PGS（参与式保障体系），听到田老师的分享后感触良多。我们自觉在这一话题上没有既定的答案，反而是希望把我们的疑问抛出来和伙伴们一起讨论。比如，CSA（社区支持农业）与PGS是什么关系？当我们了解到国外在PGS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国内伙伴的一些探索后，我们就更想知道PGS这样一个还在丰富的地方实践中生成的经验，究竟在回应什么核心的问题？它有其“制度性”但又与排斥一般人参与的认证制度不同，那么当中的参与者，例如小生产者、一般的消费者与NGO、销售平台等的关系是什么呢？专家知识与在地经验、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与小农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关系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国内的伙伴有很多讨论、对话，也特地接触了印度、泰国、台湾等地的一些经验。最后我们以“城乡信任与PGS”作为这一期专题之名，其实是被当中一些故事所打动，希望与大家分享。

如果说《专题》触碰到制度、标准等话题，那本期《见·远》收入的关于科学的思考的文章，可以说是尝试从更根本的层面思考相关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为这一栏目想过很多名字，以期帮我们厘清思路，例如“整全的科学”、“科学的边界”之类，但最后发觉根本上来说不是关于我们怎么定义科学，而是我们怎么认识人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曾读过一句话，大意是认识和理解复杂的事物只能通过对话。因此，面对无比复杂的自然，作为来自自然也

仰赖自然生存的人，我们究竟怎么与自然对话呢？除了现代很看重的头脑、理性，被我们忽视甚至有被抛弃之可能的情感、心灵，其位置在哪里？这个栏目中呈现的几篇文章，在邀请也在启发我们回到人自身这更复杂精妙的存在，在“名”之中看见“道”。郝冰老师在《意识与物质分分合合》一文中说到“门在那儿，还不止一扇；道在那儿，不止一条；现在的问题是，你在哪儿？”是个值得想了又想、十分有启发性的提问。

联系到今天这样一个人们认为科技强大到可以干涉死亡的世界里，怎么谦虚地把自己交给死亡，从死——这生的对立——中重获生的意义；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中怎么通过走向他人、又回向内心的方式，来探索更好的生活，都可能与我们怎么在海洋中做好既快乐舞蹈又能舍下执着的浪花有关。这些在《解·读》、《行动者》等文章中，有着很生动的演绎，在生命之间的相撞对话中，我们或许会有很多惊喜收获。

我们希望不是以出版作为这一期的结束，而是期许可以通过后续的一些互动交流，继续让一些有趣的讨论可以发酵，甚至一些行动变成可能。非常期待和欢迎伙伴们的参与、支持。

《比邻泥土香》编辑小组



01 刊首语

专题：城乡信任与PGS

- | | |
|------------------------|--------------------|
| 06 当我们谈论PGS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 陈宇辉 |
| 10 一个共同的农夫市集的PGS之路 | 蒋亦凡 |
| 19 止于至善，无需刻意 | 陈靖 |
| 28 参与式保障体系与Wanakaset网络 | Michael B. Commons |
| 35 参与式保障体系中小农的参与及对此的思考 | 白亚丽 |
| 39 印度PGS实践 | 张春 |
| 45 城乡农协力，重建信任之路 | 张雅云 |

行动者

- | | |
|-------------------|--------|
| 56 果酒变酸，不是变质而是升华 | 李霖 |
| 60 “老师说” | 罗靖 |
| 65 青年影像行动：永远都在过程中 | 小木 |
| 70 协作者手记 | Heaven |

见远

- | | |
|-------------------------|----------|
| 76 意识与物质分分合合 | 郝冰 |
| 78 无名有名——当我遇上Shantena老师 | 陈宇辉 |
| 82 老子和量子物理学 | Shantena |
| 92 在“人的普遍智识”启迪下的思考 | 朱明 |

解读

- | | |
|------------------|-----|
| 102 为了死得平静而坦然 | 陆晓娅 |
| 107 我们是舞动的山石 | 俸云芸 |
| 111 这是我们喜欢的生活和选择 | 米莱 |



专题：城乡信任与**PGS**

当我们谈论PGS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 | 陈宇辉¹

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

——《百年孤寂》，贾西亚·马奎斯

术语凡例
参与式保障体系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PGS
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FOAM
该三个概念多以英文缩写表 示，本专题内不另做说明

缘起

犹记得我与同事在2012、2013年听闻参与式保障体系成为国内社区支持农业圈子新兴的热门话题时，我还抱着侥幸的心态以为这新概念不过又是昙花一现，搞不好它三天半月就会消失在日新月异的词汇当中，于是乎问了一下同事，大概知道了它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抛出来的、平衡商业性第三方认证体系的东西，接着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到我比较认真地去看待它时，时间已跳到2014年下半年了。事缘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团队举办了“PGS的本土化”工作坊，邀请了我与一些同事参

1. 作者为社区伙伴城市项目经理。

加，同时来自多个省市、在过去几年CSA运动中的重要组织者们都参与了这次工作坊；在工作坊前我才临时抱佛脚地去看资料、了解背景。在工作坊上听IFOAM的伙伴分享国际经验，参与到各地伙伴的热烈讨论中，一方面增加了我对PGS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我心里勾起了不少的疑问。

比如说，IFOAM的分享者多番声明PGS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这样我们如何理解与会者们希望有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以供参考？在PGS的落实当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以如何发生？北京的工作坊的主要参加者多为做销售的中间平台，那农民与小生产者如何参与呢？他们是否愿意参与？

退一步去看，PGS在国际上出现的背景是怎样的？它其实是在回应什么样的问题？当中国的行动者把这概念嫁接到其行动场景当中，他们的关注点、需求、特点甚至弱点会是什么？当有论者说PGS是CSA的高级阶段而此观点并非不无争议时，在做另类食物系统、支持返乡青年、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伙伴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在推动PGS的同时，该如何回应上述的说法？

如果换个角度看，与中国有差不多社会背景、都是以小农为主的一些地方，他们又如何处理上述一大堆的问题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希望找到与伙伴们对话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不少伙伴已经迈出了脚步开始建立自己的PGS，也许提供一些空间让大家梳理、分享自己的想法是我们能做的事情。

于是我们萌生了利用《比邻泥土香》的出版，做一个名为“城乡信任与PGS”的专题的想法。利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更细致地聆听在地的行动者们的

想法与尝试，也可以藉此了解其他地方的经验与思考。

国内脉络

专题首两篇文章率先为我们介绍了两个国内团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与沃土工坊——的经验。蒋亦凡的文章清晰地带出：对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来说，与其说PGS是为了建立质量保障的制度，不如说它就像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努力去做的其他事情（比如举办公众教育的活动、积极参与CSA运动的讨论）一样，是为了彰显这团队所信守的价值，比如说消费者的组织与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尊重与支持等。文章也同样清晰地表达出：对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团队来说，PGS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区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其体系的建立本身。

对于透过销售平台的经营来支持返乡青年的沃土工坊来说，他们最重视的也是与返乡青年的互信与相互支持，而不是某一种保障体制。在访谈沃土负责人郝冠辉时，我与陈靖都充分感受到，不管是与返乡青年或与消费者，相互的信任是在日常的互动中慢慢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有厚度的关系才是重点。透过相互支持、共同学习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某种程度上沃土其实是在建立一个跨地的社群。

由于小农户分散，加上网络物流的便利等，现在国内逐渐出现更多的与以上两团队相类似的中间平台，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和沃土工坊的经验与坚持应该能为不少新伙伴带来可以借鉴的经验。

泰国和印度小农的身影

在泰国生活多年的迈克尔（Michael Commons），本身既是农

民，也是推动生态农业、PGS等的NGO工作者。他的文章以自己亲身参与的小农组织Wanakaset网络的经验为基础，分享了小农与小生产者PGS的系统中所扮演的主动的角色。这个小组从保护森林、保障小农生计出发，在面对市场时充分展示出小农所有的主体性——以自给自足为最高原则，在有剩余时才把农产品卖向市场。IFOAM提到PGS的一个要素就是“参与”，并提出标准应当充分考虑生产者所处的场景；而迈克尔与伙伴们也展示出了在地的小农组织如何因其本土条件、自然情况以及农民对自给自足的理解等，提出适合自己小组的生产规则，我们不难从迈克尔的文字中感受到他们因此而为自己带来的满足感。白亚丽与另一位来自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伙伴去年年底在泰国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他们走访了一些有建立PGS小组的泰国农村社区，她的文章为我们添上了另一个视角——以在中国推动农民合作社为己任的组织者如何从泰国的农村社区取经。她与同事的观察与学习，对所有关心中国乡村建设并希望将PGS带给中国农村的伙伴来说，应该是来得十分及时的提点。

印度与中国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小农在发展主义之下的生存困难；为此我们特别想了解印度的经验。张春的文章帮我们整理了在这样的脉络下印度在生态农业与PGS推动上的历程；而她也在印度民间PGS的重要组织者、印度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IIRD）的负责人乔伊·丹尼尔先生（Joy Daniel）来中国参与国际CSA大会的时候访问了他。作为关心

印度农村及农民的工作者，丹尼尔先生多番强调民间PGS系统对真正意义的小农的重视与支持，应该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来自海峡对岸的思考

因想了解PGS的发展及相关的思考，我特意于去年10月到台湾一趟。感谢浩然基金会的全仁与张雅云的支持，我们在五天之内拜访了七、八个单位，与不同的伙伴讨论了他们怎么看待城乡互信、有没有采纳PGS以及背后的原因。张雅云的文章最后挑了两个案例来写²，即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及喜愿共合园。相比起一些开宗明义地说在使用PGS的平台而言，喜愿共合园只是宣称采纳了IFOAM的PGS的部分原则，而台湾主妇联盟合作社的“自主管理系统”的建立和运作与PGS更是完全没有关系。

雅云的文章清晰地梳理出上述两个平台的发展脉络，及在这脉络下发展出来的与小农户合作的“产品管理体制”。顺着雅云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团队的“产品管理体制”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理念与思考，而这些接地气的设计一方面暗合IFOAM的PGS理念，另一方面也容让这些团队在PGS这一概念舶来时有与之对话的可能。

在走访台湾的过程里边有几个片段反映了台湾伙伴在城乡互信、支持小农的事业上的思考，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姑且以它们来做本文的总结。

与花莲好事集的吴其璵先生聊了一个下午关于他们的PGS运作后，他在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的路上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的见面啦，这样子

2. 雅云也另外写了一篇名为《原促会，走出原乡经济的路径》的文章，记录了台湾原住民族学院促进会秘书长金惠雯讲“部落E购”的PGS的实践，文章发布于社区伙伴微信公众号及网页上。

才有信任。”

在与台湾最早做PGS系统的“部落E购”负责人金惠雯聊时，她提及，因无法做好消费者组织而一直都感到自己在做的PGS不完善，直到最近受一位印度朋友的启发她才想通——“我的平台就是要做农民组织的参与呀，消费者的参与可以由其他平台如跟我们合作的合朴农学市集做；作为一个把农产品从部落带到都市的通路商，我们本身某程度上也是个消费者代表了。”

与喜愿共合国的施明煌先生聊天是件赏心乐事，十分有意思的是虽然我道明来意说想了解喜愿在建立城乡信任上的经验，但施先生却（后来才知道是必须）把喜愿走过的历程娓娓道来，从

国际粮食市场投机对小麦价格的影响到粮食自主的重要，以及与农友形成有共同追求的群体云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只有在理解清楚喜愿对问题的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出喜愿的产品管理系统等相关的选择与安排。

为了这个专题的名字我们编辑团队纠结了很久：专题其实是跟“参与式保障体系”相关，但又怕以“参与式保障体系”来命名专题让人误会我们要谈很技术性的事情。“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叫“阿猫阿狗”也无所谓，我们就是想和大家好好地谈一谈：在生态农业、城乡互动的领域里边，真正的信任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一个共同的农夫市集的PGS之路

——参与式保障体系促进CSA发展的经验

文 | 蒋亦凡¹

去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位于三元桥凤凰商街的社区中心里，和市集的召集人常天乐、IFOAM的PGS项目协调人科妮莉亚·克赫纳（Cornelia Kirchner）一起，准备着一个关于PGS的工作坊。与此同时，正有一场农夫市集在门外的凤凰商街热热闹闹地举行。这个社区中心名叫“集室”，分内外两间，外间是由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团队运营的菜店，销售市集农友和北京以外同样可追溯、可信赖的生产者的农产品；里间是团队的办公室兼仓库、餐厅和交流空间。我们就在里面这间忙活。这时，由集室代销的几千斤“良心梨”从河北沧州运到了，需要堆

到里间。不一会儿，进来一群人，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挪家具的挪家具。穿梭往来的男男女女，有市集工作者、也有农友、志愿者，还有消费者，大家干活不分彼此、热火朝天。人影晃动间，几百箱梨就在屋里拔地而起，码得整整齐齐。适逢这时屋里的背景音乐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Beat It》，让眼前的这一幕仿佛一场热力四射的现代舞，这首老歌也在这样的团结、开放、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具有了别样的感染力。

这个场景就像是参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多方关系的一个缩影。用常天乐的话说，市集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供

1.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2011年开始组织农夫市集，并倡导CSA、可持续农业，同时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议题。

参与其中的各方发挥。而这种开放平台的身份，也决定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追求更好的“自我修养”——PGS的过程中，有自己清晰的发展轨迹和明确的目标。

市集创办于2010年，最初只是一个迷你的文艺范儿农夫市集，五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是国内CSA运动的一个标杆案例。目前它以每月8~10场的频率在北京市区的多个合作场地开集，服务着来自北京城市周边的四十多个中小规模生态农场、十来家小型手工作坊，还有数以万计的消费者，年直接销售额达到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元（人民币），间接销售额更高于此。生产者普遍因为加入市集而拓宽了销路，获得了与其产品良好的生态、健康品质相称的优价回报，实现了更好的经营状况。可以说，它成功地在大型食品分销体系林立的北京建立起了一个另类市场，面向中小规模生态农业和传统食物文化，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流与互动为信任基础。

PGS脱胎于有机农业运动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旨在建立的“PGS”，是英文“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的首字母缩写，“参与式保障体系”是对它的直译。这是一种在世界有机农业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针对有机小农的产品质量保障体系，是对主流体系的补充，或毋宁为纠正。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各地拥有政府认可的第三方有机认证体系陆续建立，有效地辅助了一个有机农产品市场的诞生。但是，这些认证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产业化、出口型的有机产业的。姑且不论这种产业模式是否符合“有机农业”关于低成本、资源循环利用、生物多样性、社区经济的理念，光

是它高昂的认证费用、复杂的手续首先就排斥了小规模生产者。而一些小规模生产者更怀疑，这种靠一个检验员一年来看一两回的监督到底能起到多大的监督效果。既然不被主流认证体系接纳，各地的有机小农就另辟蹊径，纷纷搞出自己的“另类认证模式”。起初他们并没有共同的名字，工作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通过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主体，同时包括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来实现对农场生产过程的监督，并向这套工作机制的传播效应所能达到的本地市场传递对产品质量的信任。2004年，这些另类认证团体在巴西的托雷斯开了个会，肯定这套模式对全世界有机小农的发展的意义，总结出它的一些关键特征，并赋予了它们一个共同的名称“参与式保障体系”。会后，会议的主办方之一IFOAM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把在全世界推广PGS作为它的一项长期工作。根据该联盟的统计：2015年，世界上共有133个PGS在43个国家运作，另有102个正在47个国家得到开发。全世界有五万三千多生产者参加了PGS，其中有两万四千多得到了认证。

PGS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运动特征。它是有机小农在被商业化的有机农业部门边缘化的局面下，争取社会承认和市场机会的努力，是在原本强调农业的社区属性的有机农业变得不得不通过外部机构的认证来获得市场承认的局面下，重新强调社区自身建立规则和秩序、实现信任的一种探索。

这一运动的思想来自有机农业运动本身。法国的“自然与进步”（Nature & Progress）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机农业团体之一，它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PGS践行者。1964年，一群法国

农民、农学家、医生、消费者出于对绿色革命带来的化学农业的不满而成立了这个有机农业团体，并在1972年开始使用参与式手法来对会员进行有机生产的合规评估。相比而言，欧洲共同体的有机农业标准要等到1991年才诞生，欧洲的第三方认证体系的出现则还要等四年。但是，当这套官方认证体系诞生之后，却喧宾夺主，将获得第三方认证作为获得有机资质的先决条件，以不够“保密”和“独立”为由，将“自然与进步”所采用的参与式方法排除在外，这意味着用参与式方法认证的产品不能称“有机”。但是，“自然与进步”并没有放弃自己那套历史悠久的方法，活跃的地方团体继续用之运作直至今日。因为这套方法的好处是，官方认可与否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赢得本地市场消费者的心。

市集遇见PGS：似曾相识，又相见恨晚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同事们对建设市集自己的PGS的想法酝酿已久。2011年10月，常天乐在第三届全国CSA大会上听到IFOAM中国代表周泽江老师介绍PGS，才知道原来市集所使用的一些工作方法在国际上已有先例，而且这种新工具还有很多当时市集并没有意识到的重要价值。在2013年3月市集的一场全体大会（参加者为全体农商户和工作人员）的文件中就已经写道：“市集必须建立PGS，这是市集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市集同事晓云生说：“如果农夫市集没有PGS，这种形式就没法走得更远。因为只有在具备了这种系统、规范的制度之后，市集所倡导的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协作，以及多方参与的农场拜访来实现质量保障的思想才更有说服力，也使它在与其他的

市场模式（包括那些假借CSA之名行纯粹逐利之实的李鬼模式）竞争公众认可的角逐中拥有更大的优势。”

但不仅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需要PGS。经常去各地参会、考察的常天乐早已经看到：尽管具体情况充满差异，但各地的农夫市集和其他类型的CSA平台其实都有对PGS的需求。而CSA运动是一个整体，如果这场运动拥有了PGS工具，就会极大地促进公众对CSA运动的认可和参与。2014年，市集向全球绿色环境基金（Global Greengrants Fund, GGF）申请了一笔小额资助，编译一些国际上PGS的资料。后来，市集受邀申请德国NGO亚洲之家基金会的“中欧NGO交流项目”，于是常天乐决定把IFOAM作为人员交流伙伴，再深入研究一下PGS。并且趁科妮莉亚9月在中国交换工作时，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邀请国内多地的CSA同仁一起在北京讨论大家对PGS的需求是什么，各地建立自己的PGS，甚或要建立全国性的PGS网络，究竟该怎么做。我作为CSA运动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被常天乐邀请入伙，一起筹备工作坊。

就像任何一个CSA项目一样，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天生就具备了一个PGS的雏形。公开透明、鼓励参与，是市集多年来保障产品质量、赢得消费者信任的基本手段。早些年，他们常常在市集上在微博上询问有没有粉丝可以开车带他们一起去考察某个农场。但这不仅是为了解决交通工具，也是为了拉到“人证”。这时市集还没有任何规范化的农场监督制度，寻找人证的方式，总是不问来路，充分开放。

一个“共同的”市集的来历

市集对消费者参与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市集本身组织形式的开放

性的体现。市集的前身是2010年几个在京的外国艺术家和学生举办的农夫市集，当时在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IATP）担任项目官员的常天乐作为志愿者协助组织和宣传，她的一大贡献是把微博宣传做得有声有色，让市集充分面向中国消费者，赢得了大量顾客。后来几个外国创始人陆续退出，离开中国，常天乐这个帮忙的成了负责的。好在有很多中国志愿者加入，帮常天乐一起张罗，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四人小团队。又干了一阵，常天乐深感市集正是自己之前在研究所工作时所追求的“替代性食物体系”的绝佳模式，于是干脆辞掉了研究所的工作，全职组织市集。说是全职，却不拿工资，其他几位同事也是一样，都纯粹因为“好这口”，认同市集的理念、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这样，市集就成了一个由一群全职志愿者支撑的公益项目，团队成员义务劳动，也来去自由，团队氛围平等而友善，决策靠大家讨论。同事们曾经提出：为了宣传市集，要把常天乐作为一个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形象，作为市集的灵魂人物推出。她是美国“海归”、曾供职于大报、大公司和国际研究机构，英语和普通话一样流利，而且出口成章，形象也富有亲和力。但她始终拒绝被“推出”，坚持应该突出的是市集这个平台本身。而她至今都管自己叫市集的“召集人”——她负责把大家招呼到一起，但拿主意要靠大家商量，不由她说了算，但如果项目出了问题，她也负责“着急”。2012年夏天，市集开始有一些收入，终于可以给团队支付微薄且平均的薪水。次年12月集室开张，又增加了一个团队，目前全职工作人员数量达到11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曾是市集上的消费者。而在这个团队“管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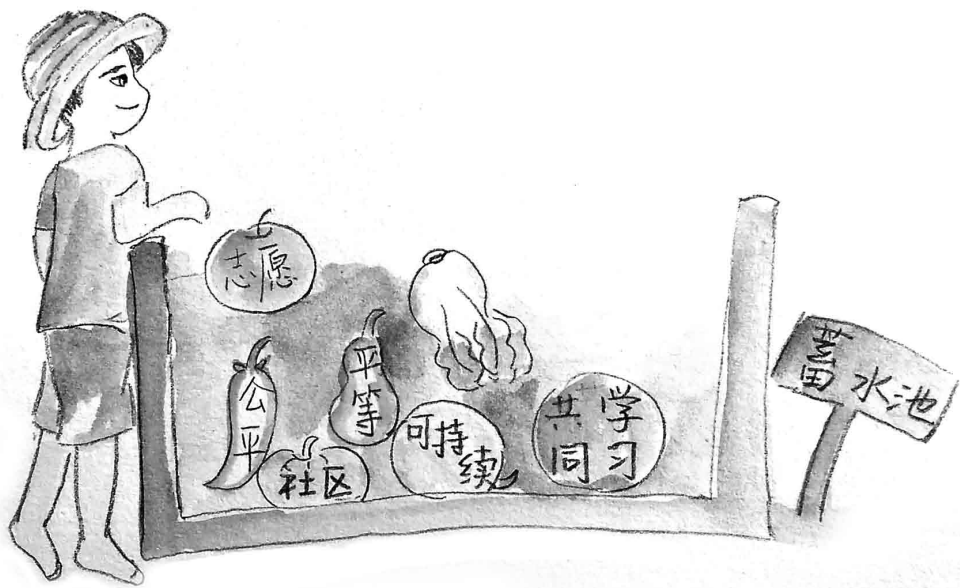
的市集，则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或机构，毋宁说，它是这个流动的志愿者群体以及他们所服务的农友和消费者群体的“共同的”市集，市集的不少事务会拿出来与农友们协商，一些活跃的消费者也会被邀请其中。

据常天乐估计，全北京有近一万个家庭的农产品购自市集或由于市集而直接向农户购买，有一千人差不多每周都来赶集，与她脸熟的消费者有小一百人，负责更多一线事务的同事们会认识更多，而其中又有几十人是非常投入的消费者，他们有的把CSA、有机农业的原则甚至方法吃得很透，常常能在市集举行的交流活动中替市集组织团队宣讲理念、解答问题，甚至回应挑战。有的成为市集的志愿者，从看摊、搬运，到编辑微博、微信，到提供专业咨询；有一些则举家默默成了农场的忠实志愿者，还有一些则成为参加农场拜访的积极分子。

这并非率性而为。一方面，这是因为市集发展之初曾有很多个人和机构为它的成长出过力，所以至今团队仍然把它看成一个属于大家的市集，团队是在替公众/社群托管它。这种认识也反映在市集的财务安排上——团队的薪水十分微薄（起初3000元/月，后来一度稳定在4000元/月，目前开始以多劳多得为原则实现差异化），省出资金用于办公经费、拜访农友、举办交流活动等事业发展。

另一方面，这也与常天乐对消费合作社的热衷有关。常天乐在美国工作时，曾经考察过美国的一批消费合作社，为那种一群人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需求的力量所感染。被IATP派回中国后，她在2010年5月策划举办过一次“消费者合作国际交流会”，可能是国内迄今举办过的唯一的关于消费合作社

这样，PGS就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的蓄水池。



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IATP邀请了美国、德国、台湾等地合作社的负责人和会员，分享他们的经验，而来自国内CSA社群的代表则探讨如何把这些经验与自己的工作相结合。这些消费合作社的共同点，是一群理念接近的消费者集中资金，有时还有自己的劳动，来建立大家共同拥有的消费品供应平台，这样既能获得理想的产品，又能将原本会被商场、超市等大型销售渠道赚去的利润留在自己和生产者的手中。一些合作社为了获得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就与农户相约：农户进行生态生产，合作社则付以优价。这些合作社内部都有民主决策机制，会员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合作社的主人。常天乐想：市集是否也能效仿消费合作社，为农户、消费者和市集的工作团队共同拥有，由大家一起

管理？正是这种想法赋予了市集多方参与的开放性。

2012年初，市集团队尝试将这种思考付诸实施。为此他们召开了全体大会，宣布将组建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外部专家共同组成的市集管委会。工作随后由一个多方组成的筹委会推进，但可惜后来因为消费者和外部专家难以动员，这项动议未能实现。几个月后，当市集面临法律注册，常天乐再次把合作社模式拿出来探讨。她的想法是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股东上限50人的规定，召集囊括以上多方的49人（为了决策效率而选择单数）作为股东注册公司，并制订合作社章程，使之事实上是一个体现各方会员利益的合作社。但这个想法由于操作层面过于复杂，没能得到团队同事的支持，也只能作罢。

且行且思，朝着PGS前进

尽管事后分析，由于消费者的数量庞大和川流不息，以上两套涉及明确的代表权和所有权的方案其实都不适合市集这种模式，但这种把市集作为一个“公共物品”的思想，被团队继承了下来，影响了团队的思维方式。而当PGS这一工具浮现之后，常天乐感到：这是另一种可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市集管理的机制，通过PGS，他们可以在产品质量保障、知识营造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市集最早的PGS制度建设尝试，可能是那次对生产标准的修订升级。2011年秋天，市集打算把原先简单的生产底线要求“认同有机理念，耕种过程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养殖密度合理，散养为主，不喂含抗生素和激素的饲料”制定为更细化、更专业的生产标准。本着PGS“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游戏规则”的原则，市集团队先邀请农户们分头撰写不同生产门类的标准。一些农户很积极，不久便拿出了草稿，然后是向农友征求意见。虽然意见很多，但好歹汇总成为了一个初稿。然后，所有农户被拉到一个农场，关起门来逐条审议初稿。结果，每一条都有相左的意见，水平高的人希望把标准定高些，水平低的人希望定低些，这让审议过程成为一场令大家筋疲力尽的“车轮大战”。最终结果，是保留了原先那条一句话原则。

如今回忆当时的情形，并展望未来的PGS，常天乐有点怀疑制定细化生产标准的意义。国外的PGS所采用的生产标准，通常是根据一些主流有机生产标准修改，使之更符合小农实际。常天乐认为：具体到罗列哪些投入品可用，哪些又不可用，就会造成没写进去的东西被滥用。据她观察，市集上最容易出状况的农场是那些并没有鲜明的生态理

念，更多是带着生产“健康食品”的想法而做的农场。由于缺少对农场的生态设计，这些农场较多依赖外购投入品，这就是问题的来源。因为，即便不论外购投入品是否符合有机农业本土资源循环利用的原则，光是它们的成分就非常不透明，常带有不合格成分。所谓“商品有机肥”往往并不符合有机标准，就是一个例子。

在常天乐看来，有机生产标准仍然是一个工业化思路的产物。好的有机实践，是遵循一系列符合有机农业价值观的原则。PGS除了组织利益相关方协商制定这些原则，还可以为生产者建立经常性的交流和学习机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这些原则。她的同事晓云生认为，生产标准可以是PGS知识库中的内容，供生产者学习、参考，但不应该是追求的目标。PGS该做的是帮助农户逐步实现真正的有机农业生产。

市集的另一项努力，是在2014年春天设置了专门的岗位来推进“准PGS”的工作。负责的同事塔拉学艺术出身，但一反人们对文艺青年的刻板印象，她勤奋、认真、不怕吃苦，兢兢业业推进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设计了一套农场信息登记表，并苦口婆心、穷追不舍地促成市集上三十余户农户逐一填写完毕，并在随后的农场考察中核对。这份表格囊括了农场概况、生产部署和生产方式的方方面面。这样，全体农户的生产细节第一次完整地有了书面呈现。很多农户从中第一次看到自己农场的全方位信息被形诸文字，记录在册。这其实正是PGS模式所要求的每一个成员农场需要提交的“管理档案”，有了这份档案，未来无论是对农场开展监督还是提供支持，都有了参照点。

农夫市集还希望这套信息能有另一个用处——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市集从不干涉农户定价，但是农户们的生产水平有高低，农场的自然资源条件也有好有坏，而消费者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不同农户的农产品的价值（兼有食用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哪怕是准确的横向比较。这使得市集过去的产品定价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卖出更好价钱的，未必是生产水平更高的农户，而可能是更擅长营销，或产品看上去更喜人的农户。而随着市集于10月初在全部农友的摊位前公示源自这套农场信息登记表的农场信息，新的价格秩序将会逐渐形成。当消费者可以借此更好地分辨农场高下的时候，农户们将会更有动力，也更有明确的方向，去追求更好的生产实践。这是信息对称的好处。

第二件事是加强了农场拜访的频率、规范性和严格程度。具体的变化包括：农场拜访的频率增加到每周一次；为了确保拜访小组的专业判断力，每次都有农友参加；为了让在现场的观察更细致、周到、有条理，专门设计了表格供拜访小组成员填写，并在事后提供总结反馈，开展讨论；为了让长期的疑点能够得到求证，对个别农场采取了突击检查的形式。严格的考察的确发现了问题，有三家农户因为严重违反规定而被清退。其中有的是拿非自己生产的产品来卖（声称是有有机肥供应关系的“合作基地”的），有的则是由于农场负责人不管技术，而实际负责技术的人使用了违禁投入品。这证明了：一个高度注重理念的群体内部，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哪怕“监督”这个词听上去没理念、伤感情。

但塔拉和同事们也被一些问题困扰：拜访小组的专业能力几乎全部来自市集上的农友，虽然农友们出于共通有

无和维护自己所赖以发展的市集的声望的考虑，会负责地给出他们的专业判断，但积极参与的农友并不多（路途遥远和耗时是主要原因），而且往往不愿多次拜访同一家农场。农友的参与性始终不高，塔拉总要特意邀请，这成了一桩耗费精力的工作。而市集同事们的农业知识远不如农友们，只懂原理，不懂具体，对观察到的现象难下判断，发生分歧的时候难有结论。而消费者的专业性，往往更低于市集同事，有些不懂得看土壤质量，只觉得农场整齐干净就是好，非常主观。这让市集同事们意识到三件事：第一，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市集同事，要想开展有质量的农场拜访，必须有相应的有机农业知识培训；第二，如果有一套制度能促进农户们参与对彼此农场的拜访，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地开展交流和学习，从而有助于大家农业水平的提高，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农艺进步和监管到位的良性循环。这两件事正是PGS可以做的：PGS不全是关于“认证”和“监督”，它还特别强调向生产者提供支持。“共同学习”正是一个PGS团体自我支持的机制。第三点与PGS并无必然联系，但也是PGS的一种工作技巧——需要分流那些仅仅带着游农家乐的心态加入农场考察团，没有把它作为一项工作来对待、没有任何知识储备的消费者。他们想出的分流办法是：另设更具消遣娱乐性的、收费的农场游项目。

常天乐还有另一个观察：市集上不断出现一些对CSA有着很深的理解和认同的消费者，他们常常不满足于通过购买来支持，也愿意用志愿服务的形式提供支持，以此作为他们对于一个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的追求。常天乐说：“有很多这种高素质的消费者曾经向市集团队抛出过橄榄枝，但是我们接不住。”

如果有了PGS，就可以有专门的职能来汇聚这些资源，使之成为这个质量保障体系的劳力、智力和传播媒介。这样，PGS就成为一个社会资本的蓄水池。

不忘PGS的根基：在地主体性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背景，同时了解到国内其他一些CSA平台都有类似的需求和困惑，希望国内CSA运动能够拥有这种“制度基础设施”来追求更深层的发展，我们决定在2014年9月召开那个在文章开头提到的“PGS的本土化”工作坊。这也是为了对主流农业模式做出回应：通过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来创造一个有序的、属于生态小农的农产品市场。

此次工作坊邀请了全国十多家机构的工作人员，第一天先通过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PGS项目协调人科妮莉亚的介绍，以及我们所翻译的该联盟出版或推荐的PGS介绍性材料，来了解PGS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各地CSA社区的代表也介绍了他们和PGS相关的一些工作和困惑。第二天尝试通过PGS的手法考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相关的若干家农场，以对这种手法进行评估。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我们聚在顺义的一家农场讨论对PGS的需求、设想，以及各地在建设PGS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差异性。

在工作坊的讨论中，浮现出了几个关键的问题，加深了我们对PGS的理解，打开了对它的想象。

在第一天的讨论中，刚好在京出差，前来旁听的社区伙伴邓文娴老师坦诚地表达了她一个担忧：从社区伙伴推广CSA的工作经验来看，不同社区的

状况是非常不一样的，PGS同样是要在这十分不同的环境中建立一种信任与合作的体系，但目前对PGS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来自城市，那么生产者的主体性该如何体现，其积极性来自何处？她担心PGS会被片面地看作一种认证工具和市场开拓工具，考虑的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忽略了更根本的东西。社区伙伴是中国大陆CSA运动理念的播种者之一，在它十多年来无论是与农村还是城市社群的合作中，都十分注重对社区的培力，激发出其内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在回应文娴时说：PGS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工具。PGS所倡导的以平等磋商来制定游戏规则、以小农的信任为工作的前提去加以引导和支持，以及共同的学习和知识的营造，都是社区培力的原则，而如果没有社区的成长，“参与式保障体系”的工作也就不可能顺利开展，因为根本不会出现有质量的“参与”，因而也无法说服它的“受众”（本地市场的消费者群体）。

这个观点得到了常天乐和在场的市集同事们的认同。

而这种去了解和理解PGS工作所在地社群的愿望，也体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主要由常天乐和我承担、由乐施会（OXFAM）²资助的“PGS的本土化”研究项目中。该项目计划调研全国六个城市区域，了解当地对PGS有需要的社群的个性和共性，以此为基础来提供一套可供大家利用的工具文本。

关于PGS的社会发展功能，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坊之后不久，我读到了IFOAM发布的报告《社会过程与参与式保障体系之互动的全球比较研究》（Global Comparative Study on

2. 乐施会是一个国际扶贫发展机构，旨在推动民众力量，消除贫穷。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Processes and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正呼应了这个主题。它调查了全球八个成熟的PGS在做“认证”之外开展的社会发展活动，发现其中包括：分享农业技术和传统知识、保育传统种子、小规模互助金融、复兴集体劳动等活动。这些活动所能带来的社会发展，除了有助开拓农产品销路从而改善农民生计，还有助于加强社区纽带、节约成本、巩固粮食安全，以及优化自然资源管理，等等。可以期待，未来中国的地方性PGS团体也能追求各自多元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只要这些地方PGS团体能真正立足本土开展工作，或者说，是“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

第二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涉及如何想象PGS的“认证”功能对市场格局的影响。我在工作坊上发表了一个观点：CSA和PGS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CSA强调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而PGS的“认证”功能却并不追求这种关系，甚至让它变得不再那么必要。因为有了认证，消费者就可以看认证标签，而不再那么关心农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肯定不是PGS的目的。如果“认证”的结果是产品因为获得了认证标签而“不胫而走”，去到没有社群纽带和团结关系的陌生人市场逐浪，那么这种PGS必将迷失自我。因为吸引大

量陌生顾客的愿望，将使一个PGS失去建设和维护一个由多种利益相关方共同组成的社群的意识，转而更加注重广告、公关、品牌营造等塑造平台知名度和权威性的手段。

常天乐也看到这种危险，她反对把PGS称作“认证”，而宁可称它为“质量保障”工具。她反对贴上认证标签的产品进入陌生人市场。因为在她看来，PGS必须是加强CSA的社群团结关系的工具，而非削弱它。她认为，如果单从产品层面来看，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PGS首先必须是服务于保障市集自身产品的质量，其次这些产品可以凭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PGS”质量保障产品的名义，进入国内CSA运动的销售渠道，从而扩大销路，甚至包括远销北京以外的市场。但北京本地市场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本地市场是PGS所赖以运作的本地利益相关方社群的来源。同时她也希望看到：各地都能出现立足本土、独立、茁壮的PGS，而且它们能够建立跨地域的联合。这将是CSA运动新的春天。

在创办第六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最成功的农夫市集即将再度启航。我们有理由对它的PGS航程抱有乐观的期待，因为它一直高举着PGS的核心原则——具有共同愿景的本地社群的多方参与。■

止于至善，无需刻意

对话 | 陈宇辉、郝冠辉
记录与整理 | 陈靖

CSA、社会企业，这些新的概念在国内发展的时候，似乎都少不了沃土工坊（以下简称“沃土”）的身影。当PGS出现时，沃土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呢？笔者与社区伙伴城市项目经理陈宇辉一起探访了沃土的负责人郝冠辉（以下简称“小郝”）。

沃土是一个教育机构

宇辉：

沃土这两年发展得很快，你们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小郝：

从四年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思考做沃土这个平台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近来慢慢变得清晰。为什么我们要支持有机农业，支持知识青年返乡？首先这是一个相对善的事情。相对善，而不是绝对的善。返乡青年回家搞生态农业、保护土地，背后有一颗善心。但这未必是绝对的善。如果心是保护土地，关心农村发展，那就是善；如果是要从土地上榨取利润，虽然做的还是有机食品，但就是不善。我们支持的是一颗善心。我们关心应该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去对待返乡青年，我们有自己的界定。这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重重、消费者人心惶惶的时代，吃得健康、安全，也是一个相对的善。如果我们的

目标是刺激大家的贪婪，为了让大家多消费，那就是不善。如果我们认为，做这件事本身就是善的话，那也不对。这只是相对的善。还是要从心上知道根本在哪里。如果只执着于一个形式上的善，认为这个事情是好事，不管怎么做都行，那势必慢慢会走向不善。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我们自己——经营者——会生活，知道什么是生活，能够带领团队去学会生活，同时能够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家一起去学会生活。这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卖了多少东西，帮助了多少返乡青年。沃土的团队刚创办时，我们每天上班前都要读一遍《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希望沃土不再是社会企业，而是一个教育机构，去传播生态农业的理念，传播怎么去生活。现在沃土已经开始卖书了。因为我们意识到，单靠有机食品并不能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生活。我们在返乡交流会上请台湾的孙春华老师¹讲课，就是为了要学习怎么生活，怎么用一个良好的心态去做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技术或者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宇辉：

在团队的层面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吗？

小郝：

我觉得大家都是认同的。投身沃土的员工，都知道这是社会企业，都带着一颗善心。当我们立志止于至善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变化，会朝一个正确方向迈进。我们现在有沃土大学，同事罗燕组织的，教大家生活，包括做面包、了解广州的风土人情、女性成长课、听孙老师的讲座等等。

宇辉：

所以这是一个有共同理念又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团队，可以这样理解吗？这和返乡青年或者消费者是同一个事情吗？

小郝：

我们自己做好了才能影响别人。现在机缘到了，我们就可以通过推荐关于生活美学或者心灵成长的书籍，引导我们的消费者把生活过好。返乡青年最初都是在经济方面挣扎，为温饱努力，所以沃土过去最大的目标是帮助他们做销售，解决销路。我们组织返乡青年交流会，并定了几个目标：其一是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互助，其二是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其三就是为大家的

1. 孙春华女士，星云大师的弟子，台湾化育基金会的创始人。

返乡指明道路。一年一次的返乡青年交流会虽然次数不多，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组织”的力量，很多新加入的返乡青年会感到：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是有网络的。返乡青年交流会也承载着我们对返乡青年的期待，返乡不仅仅是生产有机食物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自己的“田园生活”过好，让返乡成为人人都羡慕的事业。所以在第二次返乡青年交流会上，我们请了爱娃教育的陈曦老师分享“田园生活美学”，和台湾的孙春华老师分享“如何把返乡的生活过好”等主题。

宇辉：

对返乡青年，除了一年一次的交流会还会做些什么吗？

小郝：

没有太刻意，只是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地做些事，帮助他们过得更好，幸福快乐。有个别的会交流多一些，比如说姚慧峰。我2014年到他那里参加返乡青年交流会的时候，就有跟他讨论，作为基督徒，他的修行可以怎么做。

谈到返乡青年的时候，我们要表达什么？

宇辉：

这个很有趣。返乡青年最初返乡，都多多少少带着对农村现状的看法，现在这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小郝：

还是很重要的。这是最初的缘起，我们还是要做农村发展、乡村建设，而且要知道根在哪里——根是在人的成长。要不然做着做着大家都去发财了，发完财都去打麻将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农业本身是一个很善的东西，就看我们怎么去表达，怎么去想。谈到返乡青年的时候，我们要表达什么？第一是称赞返乡青年关爱土地，支持农村发展的善心，称赞他们辛勤劳动，不畏烈日严寒的吃苦之心。我们传递的也是这种理念，最根本的还是人心的改变。我昨天看到《汉声》的编辑翟明磊发出的一篇文章特别有感触。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要像谷子一样把头垂向大地，要自己去劳作，才知道我们的本在什么地方。”

“种田不容易，种了田以后才知道中国的精耕细作是多么了不起。”

“农夫就是大地的艺术家，中国人的品格是来自于

耕作，因为耕作需要心力，所以我们形成勤劳忍耐；因为做米是没有投机性的，所以形成了安静中庸；因为要与土地共存，所以仁爱和平。因此米食文化哺育了百姓的性格，更在精神层次上提升了民族的高度。”

如果我们写米，只是强调好吃，产量有限，所以卖100块一斤，大家都来买吧，这是不善。但写米写得像翟明磊那样，是善。因为他传递的是正确的思想。我们觉得沃土应该这样去行。

宇辉：

你怎么看过去几年沃土的发展和农村发展、乡村建设的关系？返乡青年过去几年是生存的需要，你们过去的重点也放在这方面。但其中会不会也有些挣扎，比如说要传达的信息、要坚持的理念受到一些挑战和诱惑？

小郝：

当然会。比如说过去几年虽然我有这样的想法，但也有心念不够坚定的时候。今年开始我的心更坚定了。我现在挺闲的，不管具体的事情，也不看销售额了，每天的任务就是跟大家聊天。沃土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

宇辉：

你们跟返乡青年是什么样的关系？

小郝：

一开始我们就说是交朋友，现在更是如此。

宇辉：

这当中是比较微妙吧？一方面你们是朋友，一方面你们又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小郝：

是比较微妙。有些返乡青年可能觉得不够对等，因为我们是采购方。但我们在心理上还是把他们当朋友的。



宇辉：

当他们这样看待你们的时候，你们怎么去回应，或者自处？

小郝：

我觉得回应不了。如果有人误解我们，只能继续让他误解下去。当然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返乡青年都是非常
有觉悟的，记得今年小米收成时，李遇夏打电话问我们需要多少小米，她可以全部留给我们。要知道，遇夏通过自己的零售渠道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我们还是请她优先考虑自己的零售，剩下的给到我们就行。这种互相的支持和信任，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超越买卖的真实关系

宇辉：

你们团队好像跟每个生产者都有超越买卖的故事。比如说慧峰最开始返乡的时候，你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小郝：

沃土有意识地开始支持返乡青年是在2011年。慧峰的家乡在江西宜丰，是传统的稻米产区，他返乡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种植生态水稻。水稻刚好是沃土销量最大的产品，本身也有很大的供应缺口，所以我们很顺畅地达成共识。这个看起来很简单，但却是决定返乡青年能否顺利走下去的一个决定因素。

在慧峰返乡的第一年，生态种植产量如何，他心里是没有谱的。为了让他能够安心种田，我们给每亩定一个最低保障价，承诺按照这个标准来收购。这样，无论收成如何，都可以保证慧峰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很多返乡青年返乡的初期，我们都和他们有这样的约定。不过，最低的保障收购价只是在返乡的初期实行，因为，一方面随着他们技术稳定，产量会稳步提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形成依赖。

再比如李遇夏，本来返乡主要种土豆，但是有一次她寄土豆的时候，顺带捎了些小米过来。我们一吃觉得这个小米的品质太好了，在沃土平台一定受欢迎，于是就让她帮我们种一些小米。第二年她的小米果真热销，土豆没有赚到钱，倒是小米把钱赚到了。

也有些产品我们本身并没有销售，但是为了帮助返乡青年做销售，我们会拓展相应的品类。比如谢雪梅的家乡是天竺葵精油的产区，我们当时并不销售精油类的产品，为了帮助返乡青年的产品能够找到销路，特意成

立了金盏花工作室，用她的精油加工成各种护肤品。

和返乡青年关于产品方面的事务性工作都是沃土团队在接洽。但策略规划、种植技术的提高和心理成长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我来做。很多返乡青年遭遇的困难，往往是他们的发展策略出了问题，印象最深的是柠檬君。本身第一年返乡租的柠檬园已经过大，因为管理不善所以没有收成；第二年接着在云南租了柠檬园；第三年又新建了一个百亩的柠檬园。结果返乡之前积累的资金已基本耗尽，在我们的劝说下终于放弃，把柠檬园收缩到20亩，专心管理，希望来年有好的收成。还有一位返乡青年种了100多近200亩的莲子，地方搞得很美，但摊子过大，最后东西卖不出去，只能当普通产品卖。

我们对返乡青年的定义严格一点来说：是返自己的家乡，种植自己家的土地。当然也有返乡青年自己家里没有地，不得不租用耕地。但原则上我们不提倡租用土地，第一，地租成本很高；第二，规模扩大之后不得不雇佣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很高。我们希望返乡青年自己种植成功之后带动身边的乡邻一起种植，而不是自己扩大规模。这样子既能够带动身边的乡邻提高收入，又不会增加自身的成本。

宇辉：

除了你们，他们还有其他的渠道吗？你们怎么处理这种合作关系？

小郝：

他们都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并不止沃土这一个。一方面我们会建议他们分散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优先考虑本地品种。比如说唐亮的主要产品是姜，但广东连山本地有姜，还又便宜又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卖他的姜，只能通过卖他的豆瓣酱的方式去支持。

宇辉：

关于生产标准和规范，你们是怎么去协商的？

小郝：

第一次的生产标准是在2014年第一次返乡青年交流大会的时候一起协商的，后来第二次交流会再次强调，把背后的考虑讲透，比如说规模化养殖的动物的粪便为什么不能用。像定价这种事情，我们会建议定一个消费者能接受的合理价位，跟生产者沟通。我们也会考虑生产者的成本。雪梅的精油价格就是我给提上去的。她原来的定价每公斤不到两千块，我跟她一算，成本是定价的好几倍。当然后来产量增加了，她也主动降了价。再比如说遇夏的小

米，今年的产量有提高，也主动降了价。如果生产者报价太高了，卖不动的话上线也没有意义。

宇辉：

听说沃土准备做社区店？

小郝：

八年前沃土开始销售生态农产品时，选择了社会企业的道路。因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生产者可以提供生态农产品给大家，也不知道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消费者是否愿意参与。这些年，在大家的支持下，沃土发展起来了，但因为电商模式的应用，和消费者却是疏远了。其实，越早接触的消费者对沃土的信任度越高、购买量越大，投诉量又少。后面加入的消费者买得不多，因为彼此的沟通不够，投诉也比较多。我觉得这是网络时代的一种关系，看似拉近了距离，实际上却缺少了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深度关系需要见面去建立。所以我们认为需要重新回到线下，回到社区，通过沃土团队和消费者朋友，建立有机生活消费合作社，大家可以重新坐下来，慢慢聊，慢慢品味生活。

PGS，无需刻意去做

宇辉：

几年前在全国CSA大会上提出了PGS这个概念，过了不久就有人接过来要去用，你怎么看PGS这两年在国内的发展？

小郝：

我真正开始接触PGS是2014年在北京参加CSA大会，当时觉得有点意思，可以试试。所以我们也组织返乡青年一起讨论生产规范，组织消费者的培训，让他们了解什么是PGS，但是沃土的生产者都比较远，消费者真正的参与比较困难，所以现在更多是将其作为一套认证体系，规范返乡青年的生产。如果不形成一套公开的相关的标准，确实很难让越来越多新的消费者产生信任。我们期望能够通过推动消费合作社，吸引消费者参与进来。当消费者朋友成为了合作社的股东，甚至成为管理者、店长，去做生产者探访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宇辉：

生产规范出来了，相互的监督、交流怎么解决？

小郝：

这个比较难，但我们也会去做。我们去西安考察猕猴桃基地时，就请西安农夫市集的李红星全程参与，做同行评估。不过评估结果都不及格：有些用了化肥，甚至膨大剂，有些用了工业化养殖动物的粪便。当同行或

农友之间的走访不容易发生的时候，我们主要靠自己的团队去探访。这算是一种沃土的内部控制。

宇辉：

在沃土的经验中，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信任沃土？

小郝：

很早以前，我在店里做服务员的时候，消费者信任我，信任我们的产品。大家现在信任沃土这个平台，相信这个平台是有要求、有保证的，我们也通过文案去传递生产过程对生态原则的坚守。老消费者、老生产者的信任基础比较好。客服统计过，年消费在一万以上的，投诉最少。因为他们能理解，即使出了问题也会很包容。当然，我们也会主动去联系更换。不过，从态度上来说，还是相对友好的。但新的就需要通过各种活动来促进，这对我们员工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宇辉：

分享一下我听说到的泰国经验。有一些参与到PGS小组的农友说过，以前带着各种各样理念来的NGO会给他们定一套标准，比如说公平贸易的标准，但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按要求来去满足它。但PGS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他们可以在里面学习，可以成为一个小组，到处去看，而且可以自己在里面提标准应该怎么定。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小郝：

我觉得可以先从基础做起，让大家学习基础知识体系。沃土之前曾尝试招募消费者和我们一起探访返乡青年，共同考察农场的种植与生产记录情况，再对比他们保留的生产记录进行评估。为此我们专门办过一次PGS项目消费者参与培训课程，普及关于有机农业、有机肥、土壤管理、病虫害和转基因这些概念和知识，否则只是让大家去看符不符合标准多枯燥啊，大家互相之间有基础知识交流学习才好玩一点，大家才有动力。我不太提倡为了这个事情而做这个事情。

宇辉：

去年国内有不少关于PGS的推广，你觉得会有更多的人建立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吗？

小郝：

我仍然觉得我们现在还没走到那一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给农户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其次是要让消费者参与到我们的事业里面来。这两步走好了，可能PGS就会自然出现了，不用我们刻意去做。

返乡青年简介：

李遇夏：2010年参加社区伙伴CSA实习生项目，在北京德润屋生态农场学习。2013年返回丈夫家乡河北张家口种植生态土豆及小米。更多故事，请见《比邻泥土香》第七期《我的返乡青年探访路》。

谢雪梅：2010年参加社区伙伴CSA实习生项目，在桂林双山自然农园学习。2012年返回家乡云南大理从事迷迭香、天竺葵等有机香草的生态种植，并提炼精油和纯露。

姚慧峰：2010年参加社区伙伴CSA实习生项目，在广州沃土工坊学习。2012年返回家乡江西宜丰种植生态水稻。2013年成立“宜丰县稻香南垣生态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了12户社员。

张扬：2013年，从北京回到家乡四川威远，开始种植生态柠檬，人称“柠檬君”。更多故事，请见《比邻泥土香》第七期《朴门农业实践》。 ■



参与式保障体系 与Wanakaset¹网络

文 | 迈克尔·考门斯 (Michael B. Commons)²

译 | 高雪松

我积极参与泰国的有机农业运动已有十一载，一直与地球之网基金会³（Earth Net Foundation）/绿色之网合作社⁴（Green Net Cooperative）一同工作，它们是此运动的关键先行者，于二十二年前发起此运动。过去的十一年中，我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帮助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小农户组织及相关联的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家们发展成功的有机产品价值链。对我们及我们的资助方来说，这种方法能够也已经改善了小农户的生计，支持了有益的生态实践，开

发了有机市场，并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获得了有机食物。

成功的有机产品价值链中的一个关键元素就是消费者的信任与信心，相信产品是真正有机的。有不同的方法来建立和维系这种信任。在推动有机农业的益处的问题上（益处包括：农户能够获得认可、获得市场，消费者能获得有机种植的农产品，我们的环境和生态系统没有被施以化学品，并且变得更加健康和高产），如何去做并不重要。如我经常说的，一枚长在后院的有机种植

1. Wanakaset, 泰文“混农林业”的意思。

2. 作者迈克尔在地球之网基金会工作，推动有机农耕，公平贸易以及气候变化弹性，同时在生活中与妻子一道实践有机农耕和有机混农林业。

3. 地球之网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主要目标是促进和支持有机食品、天然用品和生态手工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

4. 绿色之网合作社成立于1993年，为泰国一家社会企业，旨在建立消费者与友善耕作的农夫及小生产者的连接。

的番茄或芒果，并不因为它没有标签而少些有机或健康的内涵，付钱让别人来认证你自种自食的食物是没意义的。但如果要在市场上建立信任，尤其是存在长距离运输以及许多农户合作销售的情况下，单单声称自己的产品是有机的往往是不够的。第三方认证是现在许多国家有机行业中通用的做法，在某些地区甚至有硬性的法律规定，但这不是唯一的做法，也不必然是每种情况下的最佳做法。要感谢IFOAM传播信息和推动有机农业PGS的工作，这些替代方法正在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采用。在泰国也是如此情形，在PGS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许多团体加入，还有更多的农友组成网络，将PGS作为可以对他们有益的工具。

我与妻子和家人一起参加了Wanakaset网络成为会员，这是我个人

在PGS中的参与。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更大的由地球之网基金会和其他相关利益方协作的“PGS有机+”（PGS Organic+）行动的一部分。Wanakaset网络由Pooyai Viboon Khemchalerm先生发起，实践混农林业和自给自足。许多成员多年来一直每月聚会分享经验和知识。我们的主要原则是：利用知识，让我们从多样的自然资源中满足自身的生活所需。在泰国，我们说我们有五项基本需要：大米，食物（与米饭同吃的），药物，家居用品和土壤肥力。我们知道，如果具备相关知识，所有这些需要皆可从大自然中获得供应。通过变得更为自给自足，更少依赖金钱，我们能够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比如有机农作物和天然产品）为家庭所用，因而更利于健康并降低支出，使我们免于负债而更有财务稳定性。

自给自足在更广泛的泰国有机农业运动中是一个关键原则，Pooyai Viboon先生是最先清晰宣传这一原则的前辈之一。他投身有机农业得益于之前的失败教训。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位先锋农民，带头实践那个时代所推广的新方法，种植经济作物如木薯、甘蔗，并增加自己的土地面积。几年后他却发现：当他收获作物卖到市场时，他的负债比收益还多。他意识到自己破产了。每年他售卖的作物价格相差无几，但投入品的成本却在升高，而且土地需要更多的肥料来生产同样的产量。不仅如此，他也早已停止为自己的需要而耕种。后来，他想办法卖掉了大部分土地，偿还了债务，只留下1.5公顷土地用于自己耕种。他回忆起父辈们依靠很少的土地就可以养活大家庭，这不过是不太久以前的事，而如今他拥有40公顷土地却徒增自己的债务。后来他想明白了，父辈不是为了钱而种，而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家庭而劳作。他们拥有知识技能和资源来生产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只将剩余部分出售换钱。因此，他想清楚了，不再一心想挣钱，而是转为满足自己的家庭所需，如有剩余再出售。这是一个大胆而巨大的转变，他一路坚持下来并取得了成功。后来他开发出一套简单而强大的工具，称之为“家庭会计”。如果



一户农家对自己诚实并肯花时间来记录每一笔开销，只需三个月左右，这个记录即可清楚地描绘出钱的去向。实际收入不是挣多少钱，而是所挣的钱减去支出。Pooyai Viboon用水龙头下的有洞的水桶来比喻：即使是流量很大的水龙头，也很难注满一个满是洞的水桶；然而，如果你堵住所有的洞，即使是缓慢的滴灌也会注满水桶。他多年的经验发现：不需要做到百分百自给自足，对于个人或家庭层面来说，那样做也不可取。其实做到25%的自给自足，即你需要的25%（或更多）是由你自己的知识、资源和努力（而非金钱）来满足的，这就足以走出负债的循环，转而改变为增加盈余。网络中的大多数成员至少种植一部分自己所需的食物和大米，因为自家的有机农作物的质量是其他所比不了的。除此以外，不同的成员则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兴趣，更多专注于其他自足的技能 and 实践，例如草药、自然建筑或天然产品的生产。更大的网络因此可以交换知识和资源，帮助利用剩余并增加集体的自足力。PGS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保障系统中的一种自给自足形式。其中，大多数的工作和努力是由成员承担的，与付费给外人提供服务的做法形成对比。当我们掌握了一项技能，我们不仅可以从产出中受益——成果可能是有机的农作物，或一间泥土房的咖啡馆，我们还因此成为熟练的园丁、建筑工或其他，从中获得滋养。

尽管我们的最初努力是为自身的利益，当我们享受做某事且学习做好它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还能够轻易获得剩余和产品用以分享和售卖。为此，我们中的许多人继续发展自身的技能，用我们已有的资源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以期过上美好生活。以我妻子为例，她正经营的天然产品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我们在没有任何有机的身份或认证的情况下，在市场层面上也获得了成功，为此，我们讨论并确认了：作为一个团体，PGS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益处。一些市场很具体地要求有机产品，并且对其真实性需要有保证。因此，实践PGS能够打开并获得新的市场。我们也非常喜欢参与式过程的整个概念。我们努力定期开展同伴参访，拜访我们的同伴，检验，同时学习，分享想法，这是一个与我们现行原则一致的有价值的过程。

在决定继续向前发展之后，我们在地球之网基金会/绿色之网的Vitoon Panyakul先生的协作下开始了开发我们的标准的参与式过程。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大约有12位活跃的成员。我们需要尽量简单的标准，只覆盖必需的元素，也要满足IFOAM的有机原则，并融入Wanakaset的特色。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决定什么是Wanakaset的特点，并将此放入标准。我们希望使用这个工具既能保证产品符合有机标准又能标明这些产品来自Wanakaset，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满足我们原则的标准。

在初始的讨论过程，我们请每一位参与的成员写下Wanakaset对我们的重要意义。每条经成员共同认可的内容都会涵盖在我们的标准里。因为“Wanakaset”直译为“混农林业”，我们认为我们的农场

必须有一部分呈现森林的特质。一些成员的农场的大部分是多用途森林，另外一些成员种植很多水稻。水稻作为我们食物的基础对于泰国人的自给自足是十分重要的，但水稻不是在森林中种植的。尽管Wanakaset的稻农有单独的森林面积，他们通常会拓宽稻田的堤岸，并把堤岸的土地转化成包含树木的多层次的生产。同时，白蚁岛⁵（通常是覆盖树木的）也能得到保护。考虑到这些，我们决定最低15%的混农林业比例是所有成员都能做到的。我们都认为自给自足是一个重点，然而如何考察却是困难得多的事。我们都认同我们的PGS有机农田需要遵循自给自足的原则，提供食物、每日所需的材料和长期的安全感（通常是作为长期投资的硬木树木），于是我们将此立为一项标准，但此标准要求农友成员开展同辈交流互访来做评价。尽管很难用一个标准的形式来解释，但大多数成员还是有信心去把握这一概念，在做交流互访时，可以看到不同的物种。此外，受访的农友还需要能够解释其用途。如果一个农友种植某植物且知道其用途，就是自给自足。生物多样性是大家共同认可的最后一项重点。我们决定要求我们的农场在第一年最少要有50种的不同植物（作为食物或其他用途），到第三年至少要有100种。我记得有几位成员说过这一数量要求过低，因为很容易就可以种植100种以上的植物。然而，我认为，我们考虑标准时应该用最低标准并希望鼓励更多人采纳这些大家都认可的做法。我们设立的标准的其他内容力求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涵盖有机原则，为此，我们订立了十条初始的标准。后来在月例会上将订立的标准向其他成员解释，并获得通过。

在确定了这初始的标准之后，我

5. 白蚁是热带和亚热带生态系统最主要的无脊椎分解者，它们取食朽木、土壤上的枯枝落叶、腐殖质等纤维碎屑，可以影响腐化作用，改变土壤的物理及化学物性，造成物质的重新分布。大型的白蚁丘，可高出地面几十厘米甚至几米，是由白蚁咀嚼泥土后建筑而成，丰富了生物的多样性。

Wanakaset PGS的基本生产标准*

1. 不得为耕作而清除公共林，必须努力保护农友土地周围的森林；
2. 用于自给自足的用途的土地至少有15%属于混农林。这一土地上必须种有提供食物、日常用途和安全感的价值的物种；
3. 自给自足和混农林的面积加起来第一年必须种有至少50种植物，第三年至少100种；
4. 从自给自足的农场土地产出的农作物若要作为有机PGS产品出售，其种植物必须至少12个月不用任何农用化学品，并且已经通过PGS的检验过程；
5. 如果农友的自给自足农地坐落在坡地上并且有水土流失的风险，该农友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6. 在认证的土地上禁止因任何理由使用化肥、除草剂、农药、人工荷尔蒙或任何合成化学品；
7. 禁止使用从市场购买的有机肥料和其他投入品，因为它们可能含有化学成分，除非该投入品已经被农友网络检验过并且未发现其含有任何禁用的化学成分；
8. 如果相邻土地喷洒了农用化学品或者使用了化肥，自给自足农地必须种植隔离作物来防止化学污染；
9. 禁止将还没有通过PGS认证的农产品作为有机PGS农产品销售；如果在发生后被发现，农友网络可以决定取消其成员资格；
10. 农友成员必须参加项目的每次会议和活动，如果有人连续五次没有参加活动，将考虑取消其成员资格。

*备注：此标准以泰文撰写，这里只是大致的译文且只是第一版。随着时间推移，农友网络将视需要对标准进行回顾和修改。

们继续讨论，并在该标准基础上制定了两页纸的简单的考察表格。我们选择了基本的同辈评估系统，类似于我之前跟新西兰的非营利组织“有机农场”

（Organic Farm New Zealand, OFNZ）的丹尼斯·恩莱特（Dennis Enright）学到的他们在新西兰所采用的方法。基本的形式是将同一地区的3-7名农友成员划分为一个同辈评估小组。每一个农友要接受3个以上的其他农友（可以包括其他Wanakaset小组的成员）的来访。他们访问农场，填写评估表格，问

问题，等等。我家的农场是最初用来实验这个体系的两家农场之一，因为距离我们的聚会地点——Pooyai Viboon家很近。这个过程很有趣，是第一次我们网络中的许多伙伴成员结伴来到我们的农场。对于如何在我家的森林农场系统增加一些不同的作物，我们获得了很多建议，其他成员也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另外，我们还与来访者分享了种子。从此，其他想要加入PGS的成员都需要接受同辈的探访。

在网络里，一些农友成员只是销

售如稻米等纯粹的单品，但也有许多人加工制作香膏、香皂、香波、茶叶等产品用以销售。为此，我们最近的讨论都是围绕加工所使用的标准来展开。虽然我们都同意只在达到我们标准的产品上使用“PGS有机+”的标记，同时可以继续销售没有这一标志的其他Wanakaset产品，然而，使更多我们的产品成为“有机+”产品的过程却一点儿都不轻松。我们团体中有几种产品是单一成分的产品，如有机糖（由农友种植和加工），竹叶茶，苏木（用于茶和天然印染）。但其他产品，如香膏、香皂，配方是我们学来的并使用了许多原料，像香膏中使用的石化啫喱，通常不被允许使用在认证的天然产品中。我妻子的香皂配方也使用了椰子油和棕榈油，以获得大家所喜欢的稳定性和质感。尽管我们可以生产我们自己的有机椰子油（另外市场上也有其他有机椰子油供应商），但我们却不认识销售有机棕榈油的人，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把油棕榈果加工成初榨棕榈油。（即便如此，我还是种植了几棵油棕榈，作为我们土地的长期目标之一。）因此我们清楚知道非常需要开发出新的配方，以便不再使用那些在天然产品中不能采用的原料成分。对于此类加工产品，我们也制定出相关标准：有机原料成分达到75%的加工产品，可以使用有机标识。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只有寥寥几种产品达到了我们的PGS标准。

我们的PGS发展过程没有外部消费者的参与，并且除了在有机天然集市的

初始发布之外，我们还没有使用“PGS有机+”的标识，所以，暂时只是推广几种单一原料的有机产品。然而，在“有机天然博览会2015”（Organic & Natural Expo 2015）上，还是获得了很多的青睐和认可。一些老顾客很高兴我们向前推动了这个过程，还有一些潜在消费者表示有兴趣在我们能提供“PGS有机+”标识的时候销售我们的产品。Wanakaset成员对PGS的需要或许会小于其他人，因为我们的网络已经有了很正面的名声。事实上，我们决定向前推动PGS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真实性。我们售卖的规模很小，通常销售的人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自由地分享我们如何生产产品的知识，不同植物的用途和价值，还有很多其他内容。这种开放和透明，我认为，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评价。他们并不期待奇迹，他们只期待真实，而这也是我们努力提供的。有些人会说消费者要求太高。我却感觉大多数广告和标签如果不是完全不诚实的话，也都具误导性。消费者来到集市，跟我妻子聊天，我妻子会确切地解释她是如何制作酸角洗面奶和青柠洗发香波的，这样，消费者也可以选择自给自足，自己亲手制作。大多数时候，倾听的人会因此得到非常不同的产品体验——在一个产品中体验到了诚挚和真实，并且与制作者建立起友谊。

“PGS有机+”的行动还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参与其中，包括柠檬农场（Lemon Farm）⁶，Sampran模式⁷，Suan Nguen Mee Ma⁸，农地改革办公室（Agricultural Land Reform Office，

6. 一个专注于有机和天然食物的连锁超市。
7. Sampran Riverside酒店发起的在佛统府（Nakornpathom Province）Sampran地区推动有机农业的项目。
8. Suan Nguen Mee Ma社会企业，负责监管Green Market（绿色市场），这是一个使用PGS做质量控制的有机农夫市场体系。



ALRO），绿色之网合作社，和Ton Ping 咖啡。在这个行动中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通用的标识，这将成为推动有机PGS的真正力量。目前，我们已经制定出一个通用标识，可以贴在产品的机构标识旁边。因此，柠檬农场能够在商品上把他们自己的标识贴在“PGS有机+”的标识旁边。尽管我们于2015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有机天然博览会2015”上为这一标识举办了发布并推广了PGS，我们暂时仍处在一个为参与的组织使用这一标识而授权的过程中。我们决定，要获得使用这一标识的权利，任何组织的PGS必须接受评估以确保它满足有机的原则，并且它使用的过程能够有效确保使用标识的产品的有机性质。我们并不期待有一个通用的标准或者通用的方法，但我们期待标准和方法有效。因此允许在一个共同享有的原则上保持很多的灵活性。

在泰国，PGS有不只一个推动者或项目，并且每年都在深化发展。有的人害怕这种多元性，但我个人觉得PGS可以帮助把数以千计的农友和消费者在共同的利益上联结起来。这样可以迅速

地增加有机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我们曾经帮助过不少南亚和东南亚的农民组织，向他们讲授各种不同的有机保障体系，后来他们就从一个内部的保障体系（类似于PGS）做起，若干年后，随着他们质量管理能力和生产线的发展和完善，外国进口商会要求他们寻求第三方的认证，使他们的某些产品可以销售到这些市场。采取过内部保障体系那一步骤后，认证就变得容易，认证实体会缩短其所要求的转化期，因为相信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保障过程。

因此，很明显，PGS既能够很有效地发展其信任链，也能够需要在需要采取申请认证这一步时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世界更加健康，朝向有机农业实践的广泛转变将是重要的一步，既可改善我们的环境健康，又可改善我们自己的健康。没有人会认为我们需要吃更多的农药残留，或者我们的土壤和生态因农用化学品和农药的残留而受益。为了我们的星球，我们的国家——享有“世界厨房”美誉的泰国，我们需要可以促成这一转变的尽量多的选择。有机农业的PGS提供了开辟这一道路的很多机会和灵活性。■

参与式保障体系中小农的参与及对此的思考

文 | 白亚丽¹

PGS是IFOAM推动有机农业运动中采用的一项重要认证体系，近两年开始被引入中国，并成为部分推动有机农业和公平贸易的实践者使用的一种工具，同时业内也有一些机构从研究的角度推动PGS概念的传播。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²推动以小农户和合作社为参与主体的农村社区发展和生态农业，因长期与农户和合作社保持密切关系，自然会从农户和乡村社区的角度观察和思考PGS的发展，以及在工作中的结合的可能性。2015年12月份，

笔者受社区伙伴的支持，在泰国北部清迈地区两个非常成熟的社区梅塔村（Ban Mae Ta, Mae Ta District）和龙岛村（Ban Nong-Tao, Maewang District）实习一个月，并在实习过程中有机会对两个社区及清迈有机农夫市集的农户进行PGS的访谈和观察学习，根据直观感受形成了以下对比思考。

PGS与生态农业运动的关系

相比生态农业在中国10多年短暂的历程，泰国民间组织推动生态农业的

1. 作者从2001年开始投入乡村建设活动，目前在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担任农村发展部督导。
2. 前身为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自2001年开始组织大学生支农活动，于2004年在北京正式注册为民间组织。梁漱溟乡建中心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核心目标，以推动农民合作和城乡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致力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文化研究、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的新乡村建设和推进工作、大学生行动教育与新文化研究及其推广工作。

历史已有20多年之久，而二者的运动缘起也不尽相同。与因回应城市中产阶级食品安全的诉求和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而产生的中国生态农业运动不同，清迈地区的生态农业发展是出于乡村社区欲摆脱主流依附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驱动，即农民不满单一化种植和由此带来的生活高度货币化和债务陷阱。他们认为必须转型成多样性种植的生态农业才能降低生产成本，同时逐步减少从市场上购买不健康食物的数量，满足自足经济的需要。

中国前5年的生态农业运动，多以小农在社区层面小范围试验生态农业为主，并在部分地区在地构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小规模的贸易关系。但农户在技术、销售及理念传播等方面的能力都非常薄弱，靠中间团体的教育培训、资源引荐、活动推广才能和消费者产生互动，而消费者的购买习惯长期受主流消费模式诱导，对购买生态产品行为背后的价值缺乏思考和重塑。记得2006年我们组织国仁绿色联盟³的小农户带着食材进入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社区时，社区的消费者对产品价格、产品品相及正规机构认证的要求都带有很强的主流消费意识。

近5年，食品安全的潮流议题使得城市消费者因对健康安全产品的诉求而裹入这场运动，同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驱动，而受过教育的新农人也抓住此契机，参与推动了中国CSA运动的发展。相比传统上擅长生产的小农，新农人比较易于将新理念与生产结合，在传播工具的应用、产品故事的传播、引导消费者的价值理念等方面都更有优势。在话语空间方面，是新农人与中间机构（如民间组织、农夫市集、研究机构等平



台）在前端引领着生态农业运动。我个人认为，无论社会各界，抑或政策制度层面，对农业的关注度远远大于构成“三农”问题中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这就导致大家在整个运动层面更关注健康农产品本身，而乡村整体环境的可持续与作为承载社区可持续的农民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况且作为小农户很难利用并透过新媒体知晓整个领域发生的变化，就比如PGS被提出来，本身又是英文概念的缩写，在农村社区层面，是很难单单通过提出概念来带动农民参与到整个运动中的。而且农民在社区发展层面的主体意识也尚在培育之中，只有局部地区的生态小农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但仍然很难去参与和形成话语。

PGS运动，为谁参与？谁的参与？

10年与20年，对社区层面农户的培育工作时间不同，在PGS参与各方中农户相对外部人的主体意识也就有很大

3. 2006年4月，来自山东、山西、吉林、河南和湖北的七家农民合作社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在温铁军教授的倡导、指导下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办公室设在北京。

差别了。我们在泰国的梅塔社区访谈不同的农户，他们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对生态理念有很深刻的认识。首先，农户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为了身体健康首先自己要食用健康的蔬菜粮食。其次，在采用生态耕作的背后，有着对社区森林、土地、水、种子等作为生态环境体系组成的各部分的友善关爱和合理使用，有着延续本地智慧和社区文化的哲学思考。因为曾经的森林退化、水资源减少和土地的破坏性使用与单一化种植不无关系。他们爱护森林，才能有源源不断的灌溉饮用水资源、建房树木以及森林中各种资源的食用和非食用使用。在与消费者的关系上，他们说“市集上都是长期的朋友”，他们只需要合理的价格回报；而对于新开办的市集，一些农户很主动参与赶集，而不会仅仅考虑销售额度而只参与消费者稳定、地段好的市集，他们这样说：“如果新开始的市集都不去支持，那永远都缺少顾客”；他们有序地参与市集的活动及管理；他们掌握自身的生活节奏，享受整个过程，而不为更多的销售额忧愁。

也正因农户在原本从事生态农业多年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理念，在我们问及市集上的农户PGS为何以及何时被采纳时，农户这样回答：“PGS工具的引入，是因为在市集上或者销售过程中，消费者常常问到产品如何认证和保证的问题。也是这几年才开始被使用。”清迈地区PGS网络召集小组的农户提到自己从事生态农业的时间，短则5、6年，长则20多年。这说明农户在使用PGS工具之前，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深刻的思考。因此PGS被引入使用时，农户的参与非常活跃，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市集PGS召集小组的主要成员是小农户和生产者，他们有着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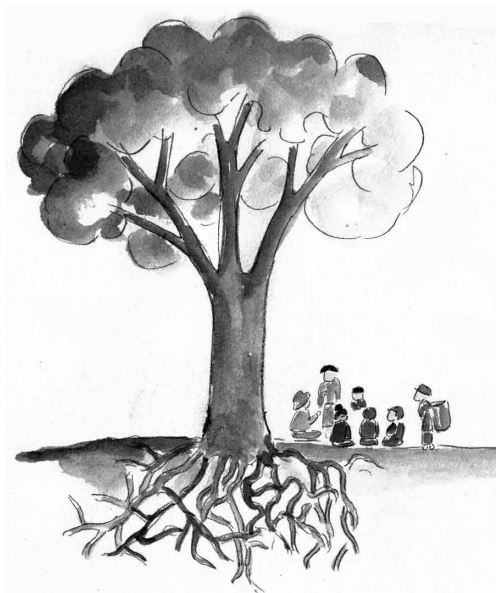
富的技术可以为其他农户提供指导，有强烈的意愿去支持其他地区的农户，也具备一定的能力去发起组织探访活动，消费者作为PGS参与一方也可根据自身时间选择参与探访活动。作为克伦族原住民聚居地的龙岛村，有着30多年的社区自主发展意识、资源主权观念、社区可持续的本土智慧和独特的克伦族文化。在与外部合作时，他们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村民主导。克伦族的PGS工作开展源于生态农业小组在与柠檬农场（Lemon Farm）公司的合作过程中被要求使用PGS，用柠檬农场的说法是：面向消费者的产品销售过程中需要采纳PGS认证体系。在我们的实习期间，我们看到生态农业小组的成员晚上一起讨论填写一份近10页的PGS文档，文档中包含农户、土地、品种等多方面信息，甚至要求农户画出生态耕作土地的具体位置图，这对农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说，因自己在家无法单独搞定这份文件，必须坐在一起商讨如何填写。生态农业小组的返乡青年Kwiv进一步解释说：事实上，在克伦族的文化中，信用不是靠纸质契约来保证的，他们社区内有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监督方式和社会契约文化，这种必须填写纸质文档的做法让他们多少有些不舒服。这点与中国的农村有相似性，任何外部主体对农民的监督都是高成本的，只有靠农民自律和社区内部互相的约束最可行。但当面对外部约束体系的进入时，他们看待PGS的态度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社区领袖认为他们要反转借用PGS，让工具为自身所用。在PGS运行体系过程中，克伦族的生态农业小组作为生产一方，非常有自主意识地透过PGS引导消费者认识他们的产品，比如咖啡的种植和加工过程，以及克伦族的原住民文化。

社区自治降低PGS执行成本

PGS被采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小规模生产者往往很难支付有关部门的有机认证费用。因此，PGS也应是一项低成本的运作体系。但因消费者和生产者距离相对较远，除了生产者的高度自觉，在农村社区层面，农户往往更认同社区内部熟人社会的制约，而社区内部的骨干也能利用本土知识指导社区农户遇到的相关技术问题。梅塔村有近10名社区骨干人员接受过相关PGS机构的多年培训，不仅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而且有在地社区与农民工作的非正规管理方法。其实相关机构的PGS准则往往十几条，但社区会在这十几条的基础上发展社区内部的准则。因每个社区不同，每组的自然环境不同，作物品种不同，准则自然不同。而且监督者不仅仅是不定期监督农户，最重要的是在工作过程中如何随时随地给遇到技术难题、与消费者有沟通问题的农户提供支持。他们也更强调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非一朝一夕，要不断引导和支持农户转化理念，尤其是刚刚转化为生态种植的农户。

而清迈有机农夫市集上的PGS召集小组也分享他们在组织跨社区的网络活动中怎样降低PGS成本：“我们自带食物，大家共同分担车用汽油。”他们表达了对参与PGS探访活动极大的主动性和热情。

而对于中国的PGS经验，由于地域广阔、农户生产的产品种类多样、地域文化多元、发展阶段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无法发展一套高成本的PGS执行体系，如果任何PGS的实践和操作在朝高成本方向发展，就需要警惕违背了其低



成本的基本内涵。在更广范围内推动的应该是一种基于对工具背后理念认可的共识，同时发展基于地方的低成本运作的区域性网络，而农村社区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自组织形成的监督是PGS过程中降低成本的最重要的基础和环节。

最后，跳出来看，我其实更想表达的是，相比工具本身，相比研究，更持久的工作是参与相关方的理念和意识的培育，尤其是小农户的支持和陪伴工作，他们所需要的技术、他们与外部平等的对话能力以及对自身所从事的生态农耕的深层次的价值思考，都需要相关团体坚持不懈地投入。在工作层面，需要各个机构的协力以及对小农户立场价值的认同。我们更看到，农户、生产者，生态农业首先的驱动不是经济价值，梅塔村最贫困的农户通过生态耕作逐步摆脱债务，当被问及当下对幸福的理解时，夫妻不约而同地说：相比金钱，有健康食物和闲暇时间是第一幸福之事。■

印度PGS 实践

文 | 张春¹

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PGS Organic Council）主席乔伊·丹尼尔（Joy Daniel）先生有个目标，就是把印度那百分之二十多因买不起化肥、农药、商业种子，不得不进行有机种植的农户，都纳入到PGS的认证体系中。PGS是“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简称，是一种低成本的有机农产品认证方式。有机种植农户加入当地的PGS小组，小组成员之间按照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的有机种植标准，互相认证。在印度，PGS认证后的产品就可以打上有机标签直接到市场上销售——当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印度一样，承认PGS的合法性。

和费用昂贵、程序复杂的第三方认证相比，PGS认证的成本要低很多。由于当前有机农产品的盈利空间比普通

农产品要高出不少，对无法负担高昂第三方认证费用的小农，能通过PGS体系获得有机认证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业种植的收益。印度的PGS有机农业认证体系，现在是国际上最为先进完整的PGS体系之一，也有望成为印度主要的有机认证方式。这不仅有助于丹尼尔实现他和PGS有机农业委员会的发展目标，对以农业人口为主且人地关系紧张的印度也有特殊的意义。印度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当前农业从业人口仍占总人口一半左右。独立近70年来，其农业发展十分有限就源于历史遗留的人多地少的问题——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继承了原英属印度75%的谷物种植区和69%的灌溉面积（包括不少经常闹灾荒的干旱地区），却需要养

1. 张春，关心有机农业的环境媒体人士，现居北京。作者参考了印度官方和民间两套PGS体系的相关网站及书籍，结合印度民间PGS的负责人乔伊·丹尼尔的采访完成此文。

活原英属印度82%的人口²。因此，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成了印度政府多年来多种农业农村改革的核心。独立之后，印度进行了旨在取消中间人地主的农村土地改革，试图建立耕种合作社；后又开展了促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提高生产力的“乡村发展计划”（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³，以及致力于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的农业“绿色革命”。按照后来的研究，这几项改革均以失败告终。“绿色革命”确实提高了产量，但其在贫困地区的推广，却大大加重了小农种植的成本，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贫穷的小农通过借钱甚至高利贷购买昂贵的种子和化肥，又常因恶劣的自然条件而血本无归，因还不起欠款、生活无望而自杀的农民不在少数⁴。由于灌溉条件优越而成功提高产量的旁遮普邦（Punjab），则因为过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水土污染，成为癌症高发地。PGS有机农业的兴起，正好为小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印度PGS体系构成

当前印度国内有两个大型的PGS体系，一个是官方的，叫做 PGS India；一个是民间的，即文首提到的印度 PGS 有机农业委员会。如上所说，PGS认证在印度是得到官方认可的，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体系，经过认证的农产品都可以贴上“PGS有机”（PGS-India

Organic）或者“PGS绿色”（PGS-India Green）的标签，在市场上出售。

民间体系：PGS Organic Council⁵是以民间NGO为基础构成的，当前有20个NGO机构成员。

这些NGO大多是在印度农村的发展过程中，以扶贫、帮助农村妇女儿童以及推动乡村发展等方式，嵌入农业发展体系中来的。他们在农村工作多年，长期致力于帮助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在地经验。具有相似工作目标的各家NGO，早就感受到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促进交流和协作。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印度农业部最终在2006年促成了“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的成立。

丹尼尔介绍说，200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印度农业部和一个印度NGO联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邀请了全国和有机农业相关的NGO参加。会议开了三天，最终决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机农业委员会。建立之初，该委员会只是一个非正式、志愿参与的机构，致力于促进印度国内有机农业的生产和消费，直到2011年，才在果阿邦（Goa）正式注册为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

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的架构相对简单，有四个层级：个体农户，地方小组，地方NGO，PGS有机农业委员会全国委员会。

1）新的个体农户要承诺按照PGS

2. 孙培钧，《印度独立以来农业发展战略的演变》，1990年，第1页。作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南亚研究》主编。

3. 孙培钧，《印度独立以来农业发展战略的演变》，1990年，第4页。据该文，乡村发展计划的实施可分为上升和衰落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从1952到1961年，衰落阶段从1962到1974年，此后乡村发展计划名存实亡，印度农村发展工作已由各种其他计划所代替。

4. 《印度引进转基因棉花种子酿大规模农民自杀潮》，载于《新京报》，2010年6月20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620/02113359583.shtml>

5. 该组织网站为<http://www.pgsgorganic.in/>

有机标准进行种植，并保证他们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都进行有机种植，才被允许申请加入。

2) 地方小组由当地5个或更多个体农户组成，按照PGS有机标准对新申请的农户进行评估认证；新的小组需要填写相关表格、接受有机标准评估，并通过直接合作的NGO将材料递交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秘书处审核通过。

3) NGO成员机构，负责帮助农民建立地方小组，也直接协助当地地方小组的工作。NGO定期将地方小组代表聚集起来交流分享。但不同的NGO情况有所不同，如丹尼尔负责的机构几乎每周都有交流会。一般的机构最少一个月会交流一次，丹尼尔说，这样就保证能及时获得农民的反馈。

4) 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全国委员会，负责总的协调和管理工作。印度有机农协（Organic Farming Association of India, OFAI）负责处理保管所有地方小组的资料，而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IIRD）负责发放证书。由各NGO代表组成的秘书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审核通过地方小组，并就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该秘书处，给每个地方小组一个编号，为认证的农场提供短信或者互联网查询服务，同时维护印度的有机参与式认证系统的网站数据库等。

所有的NGO和其协作的地方小组，都是按照成员机构之一的印度有机农协的PGS规程来操作。印度有机农协也是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的一员。为了方便农民阅读和理解，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把操作手册简化成两页纸的承诺书，只有最基本的要求，如不使用转基因种子，不使用农药化肥，努力在自己的农业系统中实

现生物多样性等。

PGS有机的要求，主要是对生产要素的限制，而并未限制作物品种或规定农法，各地方品种、耕作方法和与之相联系的传统文化，因而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定期的交流和分享，也保证了优良品种和传统的好的耕作方法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使用。此外，PGS有机种植的要求简化，也方便地方根据特殊情况进行变通处理，以及农民在掌握基本要求之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和耕作习惯，对种植、养殖的标准进行完善。例如，山羊并不是统一蓄养的牲畜。一个村子的地方小组养了很多可能破坏树林和菜地的山羊，做协助工作的NGO就特别增加了关于山羊蓄养的标准，要求山羊必须在远离树林的固定的草地蓄养。满足相关的要求以后，山羊蓄养也可以加入PGS认证了。

民间NGO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帮助农民参与到PGS认证和有机生产中来，也建立销售渠道，帮助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例如，地方NGO“Keystone Foundation”成立于1995年，主要为印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本土蜂蜜以及一些林产品提供市场营销的支持，搭建生产群体和消费者之间的平台。他们选择做参与式的有机产品质量保障体系，主要是为了保护环境以及提高农民的生计。Keystone Foundation帮忙做市场营销，可以减少中间商对农民压价。一般的农民群体虽然生产的是原生态的农产品，但是没有好的议价力量和销售渠道，只能在每日市场或是周末市场销售，收入难以保障。与此同时，Keystone Foundation也会介入教育农民怎么保护生态环境，不要在生产中破坏森林，以及帮助建立农产品的标准。

丹尼尔所在机构农村综合发展

研究所的支持工作更为立体。它是一个成立于1987年的NGO，他们和当地农民协作，在有机农业、经济适用住房、小微企业创建，以及社区为本的健康、环境教育、妇女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这个机构也是IFOAM，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印度公平贸易组织（Fair Trade India）的成员。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地方小组自己就能够做市场销售，并推广有机种植；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机构下的农民合作社，承担小部分的宣传和销售工作；而网站的推广则帮助把产品卖到全国。

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Marathwada地区。这里普遍存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不平等问题。该区域发生多起农民自杀，就是因为农民贷款购买转基因棉花种子无力偿还。2015年第一季度，就有601位农民因为反常大雨造成绝收而自杀⁶。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的工作宗旨就是帮助草根阶层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以获取可持续的生计。现在，和它合作的农民没有出现自杀的情况。丹尼尔解释说是“因为没有债”。进行有机种植之后，农民不需要再借钱买种子、借钱还钱。印度农民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债务，是还不上债的绝望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官方体系：官方体系“印度参与式保障体系（PGS India）”⁷是政府将国际上关于PGS的讨论本地化的结果⁸，正式机构约于2012年成立，由印度农业合作部国家有机农业中心

（National Centre of Organic Farming）推动。该体系由在加济阿巴德（Ghaziabad）的总部办公室和分布在全国的六个区域办公室协同工作。推广低认证成本的PGS体系，是有机农业中心的工作内容之一。

比之民间体系，官方体系的架构更接近政府行政体系。PGS India的人员大约一半来自NGO，一半来自政府。最高管辖权在“国家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常规工作在国家有机农业中心的PGS India秘书处。秘书处下设七个根据方位划分的大区域委员会，如北部委员会，北中部委员会，东北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等。大区域委员会下一级，是各大区域下属的小区域委员会，共76个（根据PGS India网站数据）。小区域委员会直接管理地方小组。地方小组的组成和审核程序与民间体系类似。

该体系为各个管理层级都制定了操作手册，规定了职责范围和标准。不过，丹尼尔认为，在行政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PGS认证，缺乏发源民间的基础，其实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认证。事实上，负责地方小组认证和培训的小区域委员会，在培训和散发培训材料时，都是要向农民收费的。

小农在PGS体系中的存在

PGS体系给小农的自主空间很大，有想法的小农往往能够得到不错的发展。不过在各自能力和眼界的局限下，大部分小农在加入初期参与的主动性不是太高。

丹尼尔的机构农村综合发展研究

6. 信息来源：<http://news.sohu.com/20150421/n411585964.shtml>

7. 网站为<http://pgsindia-ncof.gov.in/>

8. 作者引用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亚洲主席周泽江的说法。

所开展农村工作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建立互助小组，如成员筹钱作为基础经费，供有需要（如计划做点小生意）的人借用，借用者则按期归还到共同经费中；第二种是共同活动型，如合作销售产品；第三种，就是机构借钱给农民，帮他们获取政府援助项目，一般等到项目（如厕所建设）完成之后政府才会付钱给农民。

大多数的农民很难被组织起来，自组织就更困难了。以互助小组为例，10个互助小组就可以组成一个地方联合小组（可以建立更多的服务功能，帮助更多人）。但是这要耗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形成。“他们不愿意主动去想合作的事情，也不愿想销售渠道的问题”，丹尼尔说，只有一两个地方组织是农民自发的——都是受过教育或者是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农民。此外，把女性组织起来要比组织男性容易得多。和丹尼尔的机构合作的地方小组，70%的成员都是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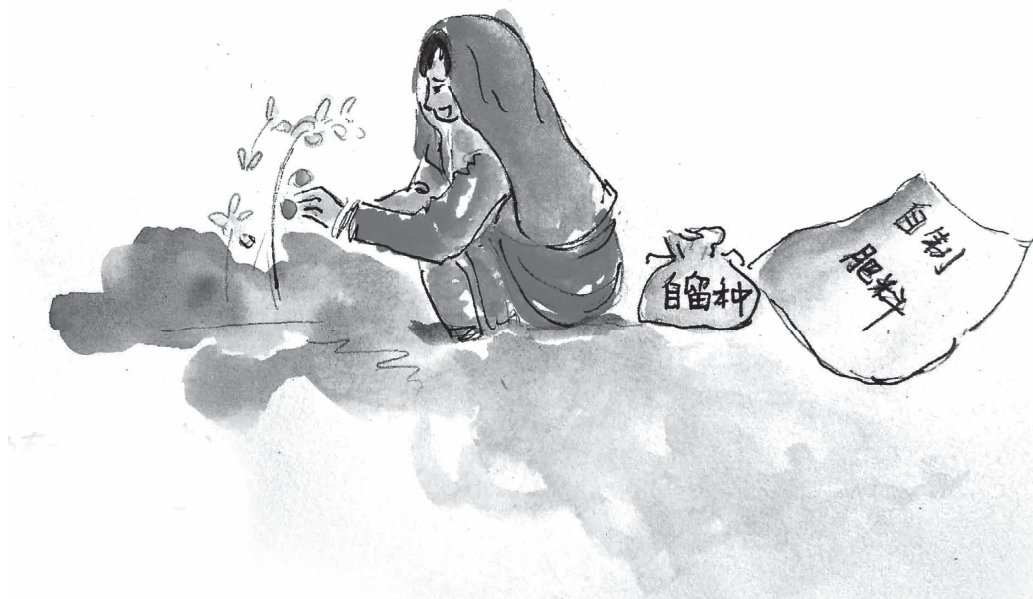
可以说，PGS给农民充分赋权，但是小农运用这种权利的能力，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形成。如丹尼尔所说，一般小

农并没有提出标准和建议的能力，他们在加入地方小组的前两三年，通常只是听从NGO的指导意见。丹尼尔和同事对地方小组协助工作，也主要在这些刚入行不久的小组。待他们熟悉了之后，再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发展。

许多小农确实借助有机农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逐渐找回了作为一个自主生产者的自信和成就。如一位名叫Shantabai的女士，2010加入了当地的农民俱乐部后，她从农民俱乐部的种子银行获得了种子，开始在自留菜地种植有机蔬菜，并学会了制作有机肥。现在她出售有机肥给有机农户可以赚钱，将自留地的菜卖到有机市场，也可以获得每周近200印度卢比的收入。因为丈夫在十多年前已经过世，她艰难地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长大，现在她有信心供还在上学的小女儿读到毕业。

印度农业面临的挑战，以及PGS的前景

印度有机产品的消费，主要平台是专门的有机市场，四分之三是在国内消费。PGS认证能否在印度得到更广泛



的推广，还不得而知。丹尼尔也不清楚有机产品市场容量有多大。

全球农业发展趋势下，一些共同的挑战也影响着印度。

影响最大的就是当前越来越流行的合同农业——大的农业公司租下连片的土地，农民变成雇工，拿着公司的种子和肥料按要求种植。此举可以减少农民风险，保证其稳定盈利。但此种情况下，农民常常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种植。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大多是使用农药化肥的农业，租用期限（一般5-10年）到了以后，土地已经完全变了样。农民也可能早就忘记了原来的耕种习惯和与之关联的农村文化、丢掉了以前的种子，一切都要从头再来，这对乡土社会和农民本身来说，都是巨大且可能无法挽回的损失。

第二是农业规模化导致的边际成本下降。随着粮食产业进入到大农业时代，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降低了单

位粮食的生产成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无法实现规模化，若要到市场去竞争，就要满足粮食采购公司的标准，进行基础设施改造、购买新设备等，导致其单位产量的成本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越来越难以生存。全世界范围之内，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都是在逐渐消失的。

在印度当前的经济水平之下，作为生计农业存在的小农，已然面临市场的冲击，合同农业可能会吸引相当一部分小农参与，并影响印度乡村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丹尼尔所担心的。

目前来看，印度政府对PGS的鼓励政策，对小农的吸引力还是看得见的：过去五年间，印度PGS有机农业委员会的地方小组增加了3倍。印度当前参与PGS的生产单位是23,317个，通过认证的生产者是21,240位。⁹更多的小农加入进来的可能性还很大，就看有机市场容量和小农盈利空间是否能保持。■

9. 信息来源：<http://www.ifoam.bio/en/pgs-map>

城乡农协力， 重建信任之路

文 | 张雅云¹

2014年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城市化前景报告》即指出，全球70亿人口中已有半数居住在都市地区，然而全球都市人口比例将持续升高，到2045年时，估计全球生活在都市的人口将超过60亿。

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分法之下，台湾的城乡发展也展现出这样的样貌：城市的金融业、商业服务业似乎象征着进步，而乡村的农林渔牧生产却无形笼罩在一片落伍低迷的氛围中。然而，农业食物是链接城乡的关键元素，生产端和消费端本应是往来热络的；当产地通往餐桌的路径有了障碍，“生产”出的是

一包包失去生产者脸谱的农产蔬果和加工食品，也酿成了一桩桩的食安风暴事件。安心食是奢望吗？近二十年来，台湾经历经济起飞、环境破坏、农食崩解的危机，正因为有这些崩坏，也促成人们思索：乡村是城市的农食基地，城市不该是乡村的掠夺者；城市有义务、有责任成为乡村的协力守护者；透过农食的牵引，找回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信任，召唤出人们对土地的遗忘情感。

台湾一些关注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非营利组织，在发展城乡友善农业协力的路径上，各自开启不同的生产消费对话，大家的努力都指向重建

1.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青芽儿》撰稿志工，关注三农、消费和环境议题，曾任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职员，在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十年间，采访了许多农友生产者，组织社员上街头参与社会运动，体会产地到餐桌的消费生产协力之必要，因此更加确认友善环境的绿色消费可以改变世界，期许成为“字耕农”写下台湾土地的故事。



农业协力的信任之路。2015年10月香港社区伙伴在浩然基金会的安排下，拜访台湾各地友善小农的组织，希望了解IFOAM倡议的PGS²在台湾的发展样貌，几乎是环台一圈的走访，才发现有些组织推动的工作本质是和PGS的精神一致的，但并未使用PGS这个词汇；有的组织对照自身的实践，上网查询研读

原文数据，也到国外参访已有执行PGS的组织，并反复自问这样做是PGS吗？当然也有组织直接在组织介绍里就表明是遵循PGS的六大精神来经营。国际场域一个农业新概念的提出，到底是全然的新，或是它原本就有其在地经验，以下就以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和喜愿共合国的经验来说明。

之一：主妇联盟，倡议自主管理

在台湾，主妇联盟合作社是少数从团结消费者出发，以共同购买为方法，致力于共同守护环境、支持台湾本土、友善小农的合作社组织。也因为开创运动的先锋者是具备农业背景的女性，能够很务实地了解农友生产面的困难，以长时间的专业陪伴和稳定的购买支持，在运动初期就已建立生产消费两端的沟通交流、信息透明及诚信互动的基础。

主妇联盟合作社目前社员数已有六万人，其中约有五万是常态购买的社员，约有一万是不购买的社员，约有一百五十位合作菜农和果农。在主妇联盟也因主张“与农为友”故合作社的菜农果农都称为“农友”，每年与这些菜农果农的聚会交流讨论则称为“农友大会”。

主妇联盟从一百多户家庭发起直接向农民购买的消费运动，历时二十年扩大到五万户家庭的共同购买。组织规模仍小的时候，消费端和生产端的互访交流密切且频繁，早期为了游说农友转作有机，发起人林碧霞博士、翁秀绫甚至是自己载着做好的液肥，送到新北市近郊的三芝供农民使

用，在进行减农药栽培之初，菜种不出来、或者种出来不好看、被虫咬得坑坑洞洞，被大家说是蕾丝边菜，主妇联盟还是坚定收下并珍惜食用，农友觉得不好意思，林碧霞等人只说：

“农友家餐桌有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就用‘种给自己家人吃’的心情来栽种，这样就行了。”这样的体贴心意，也成为日后农友的自豪，现在他们都会骄傲地说：“我们是以种给自家人吃的心情，来交菜给合作社的哟！”

主妇联盟合作社产品开发部钟元鸿说，以往种有机的农民可以随口标，或是手写都不会罚，随着《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规定，以及有机的法条化进展——《有机农产品及有机农产加工品验证管理办法》上路施行，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实务运作也受到一些影响。

台湾为推广有机农业，行政院农委会在1999年公告实施《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准》、《有机农产品验证机构辅导要点》、《有机农产品验证辅导小组设置要点》等行政法规作为管理依据。这些法规在2007年有一次大修改，并于2009年正式开始实施。这次的修改，藉

2. 台湾就PGS一词有不同的译法，除了“参与式保障体系”统一译法外，还有“参与式验证”、“参与式共保系统”等。

由“强制性标示”的规定，减少消费者买到假有机的困扰，但是却对有心加入有机生产行列的农民造成了阻碍。

因应修法，主妇提出自主管理

因为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农友以小农居多，农友栽种面积、农家二代是否愿意接班、农作种类等因素都影响着农友申请有机认证的意愿。基于支持本土农业与友善小农，主妇联盟合作社务实认知农友栽种的困难，考虑农友申请认证的经济负担，以“作物自主管理”来因应，与农友协议共同遵循的规范，不标榜供应有机农产品，而是将符合自主规范生产的产品分为四级，以更谨慎的态度自主规范，在照顾弱势生产者的同

时，也提供给社员高质量的安心农产。

简单来说主妇联盟合作社的自主管理分级大致是：环保 / 环保移行 / 无药物残留 / 安全残留，鼓励农友从减农药栽培迈向有机。但台湾地处亚热带，高温多湿病虫害多，在果树方面要达到有机难度很大，所以农友是采减农药、草生栽培、不用除草剂居多。向社员提供环保、健康、安全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主妇联盟的主张。环保是组织的理想，也是最难达到的目标，故主妇联盟的产品分级最高级是“环保级”等同于有机栽培；再依次为“环保移行期”即有机移行期；“健康级”为减农药栽培并无农药残留；而“安全级”则是减农药栽培，但采收时农药残留符合主妇进货标准。

主妇联盟合作社作物自主管理分级表

 环保级 无农药栽培	1. 栽培环境：无污染疑虑或保留隔离带避免邻田污染 2. 资材：无农药并依照环保级允用资材生产 3. 标准：农友已通过合作社自主管理查验
 环保移行期 无农药栽培	1. 栽培环境：无污染疑虑或保留隔离带避免邻田污染 2. 资材：无农药并依照环保级允用资材生产 3. 标准：目前已合作农友新增之田区，如符合环保级生产方式都必须先经过2-3年的移行期之后，才可审查为环保级
 健康级 无农药残留	作物不得有农药残留，其栽作方式依类别区分： 1. 根茎类、水果、茶叶，符合以下三种情况任一者： (1) 采收时无农药残留，以减农药栽培 (2) 无农药无化肥但无隔离区带，或隔离带不够完整者 (3) 无农药少化肥耕作 2. 菇类：无农药或减用药之介质栽培，无农药残留者
 安全级 农药安全残留	减农药栽培之农产，采收时农药残留符合合作社进货标准者： 1. 水果：卫福部农药残留标准1/2以下，不超过4种农药 2. 根茎类蔬菜、菇类：卫福部农药残留标准1/2以下，不超过2种农药 3. 茶叶：卫福部农药残留标准1/3以下，不超过3种农药 4. 米：卫福部之农药残留标准

钟元鸿说，主妇联盟合作社的“作物自主管理”规范以台湾的有机法规为基准，修正不合理的部分，例如：

允许作物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添加。如果不去考虑台湾的作业环境，只会是流于立法严格、执行薄弱。台湾有机农药

可用的很少，因为药商登记一支就要上百万台币。没有登记在可用农药的清单上，有机就不能用此资材；有些药可用在蔬菜，但却不能用在其他作物。例如：在茶叶中检出蔬菜的用药就是违法，因为没有登记为茶叶的用药。主妇联盟合作社杭白菊的合作农友曾经连续几年都碰到用药问题，即便上架前合作社和农友分别送验都合格才上架，但碰到公部门抽检不合格，农友就被冠上违法的大帽子，而主妇联盟合作社也被媒体报为“卖毒菊花茶”。

主妇联盟合作社内部也曾讨论是不是就不要进杭白菊，避免一直碰到检出的问题，但对于市场充斥大陆农药超标的杭白菊，本土农友种出安全用药的杭白菊却无法得到支持，主妇联盟合作社也觉得矛盾，于是决定依旧年年相挺，最后农友提出转为有机栽种，彻底解决用药的问题，即便产量更少了、卖相也不佳，但透过不断的社员教育和宣传，社员大都会支持这得来不易的本地农产，相信这也是生产、消费两端持续沟通相挺才有的好结果。

自主管理标准如何产生共识

又，主妇联盟合作社的自主管理标准是怎么订出来，又有哪些成员参与呢？钟元鸿表示，参与制订规范的成员包括外部专家学者、内部理事及职员，农友是在规范条文讨论到某一程度时再加入讨论，农友比较在乎的是“规范不合理，在田间是不是做得到”。产品开发部可说是面对农友的第一线，成为合作的农友至少需要一年以上。钟元鸿说起寻找合作农友的不易：“到底是要快速开发新农友，入门把关不严，然后再常常担心农友违规？或是我们花一段时间观察，了解农友栽种习性和栽培管

理？负责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前端与农友彻底沟通，了解彼此需求和期待，农友也愿意遵循自主管理的规范来栽种。这样虽然会花比较长的时间，但才是比较好的互动机制。”

主妇联盟合作社需要反复花些时间了解农友的所言和所行是否一致，产品开发部对一位新进农友至少要进行四次的访视。钟元鸿表示说，“尤其现在的年轻农友都愈来愈会说，但实际上的栽种技术可能不到位，还有农友是否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到现场也是保持对农友现况的了解，例如：有些农友即便有取得外部第三方的有机验证，但不见得会取得合作社自主规范最高‘环保级’的标章，因为我们可能看出他隔离带不完善，可能会有潜在风险，这些不是单靠检验报告、书面数据，或打手机和邮件往返可以做到的，而是一回一回与农友的互动累积出来的经验。”

在合作社的货架上有很小颗长得丑丑的橘子“火烧柑”，这被太阳晒到焦焦丑丑但风味不减的小橘子，原本农友不打算出货，因为在一般市场这样规格的小橘子根本卖不出去，就舍弃不采收了。没想到在产品部到现场访视后，鼓励农友采收出货，把“火烧柑”的田间故事如实告诉社员，一样得到社员的好评购买。

期待社员购买的当下不是只看价格，也会想想背后的价值，对农友有信任，对农作生产栽种有基本了解，共同寻找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平衡之道，这是社员透过绿色消费持续实践共同购买运动的初衷。多年下来，合作社产品开发部的同仁们依旧在产地和餐桌之路往来，社员也透过各式的生产者之旅了解农家生产者的心声，农友生产者也会到合作社各地的站所分享，合作社

的网站、月刊、周报和脸书³专页也持续放送所有来自产地的讯息，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当社员买下一把菜、一件产

品的时候，脑海里可以浮现农友生产者的脸庞，而农友种菜的当下也会想起一张张社员感谢的笑脸。

之二：喜愿共联合国，推参与式生产

一间座落在台湾彰化乡间的面包坊和PGS有什么关系呢？喜愿面包坊因为号召农民种植本土小麦，进而组成了喜愿小麦农友团、喜愿大豆特工队、喜愿咱粮聚乐部，后来陆续又有喜愿谷物制粉所等成立，像是一颗因理念聚合的能量球一般，这些不断长出的小芽小组织全都纳入喜愿共联合国，它也有个长长的全称叫“喜愿社区协力农业营生群组”，从这名字不难体会一群以农为业的社群卷了进来。

喜愿社区协力农业营生群组

2007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也连带影响与每日生活相关的国际粮价飙涨，喜愿面包坊负责人施明煌回忆到，在全球化的漩涡里，一般乡下地区或农业地区对全球化是“钝”的，直到前个月面粉才一包五、六百元，下个月已来到七、八百元，面包坊瞬间感受到生存压力，他也才惊觉到台湾高蛋白谷物几乎全仰赖进口。

施明煌发现“原来不是农民不种，而是没有人要”。于是施明煌开始设想自立型的生产能量，所以喜愿小麦的出现是从需求端出发，因为有需要所以来种。

2007年底到2008年初，施明煌先和台中大雅农民张春炎契作一公顷的小麦，用一期的田间观察仔细体认作物的基本特性。在2008年施明煌再提出本土小麦复耕的论述主张：

小麦可作为在地生产加工食用。

活化休耕地，提高粮食自给率。

丰富单一的地景，除了原有的水稻地景，小麦田也创造了可食地景，让农村的地景地貌更有风趣。

增加农民收入。

因国际粮价波动而引发的生存危机，施明煌以“麦田狂想”为名，号召农友在台湾各地推动本土契作小麦，2008年筹组喜愿小麦契作农友团，并延伸开启台湾本土杂粮复兴之路。考虑水稻和小麦同属禾本科，在二期稻之后继续种小麦，对地利养护并不是那么好，于是2011年集结农友成立喜愿大豆特工队，推动大豆的种植。2011年9月再陆续成立喜愿咱粮聚乐部持续扩大推广本土复耕的力度，且将多元学习的理念与全国教师总工会合作，在全台各个学校成立咱粮学堂，将食农教育落实于学校之中，而这咱粮学堂的开办，也让喜愿小麦的农友有机会进到校园“会会”学校的小麦小农。迈向第九年的麦田狂想曲仍继续传唱着，也一直出现不同的惊喜。

施明煌的麦田狂想计划也获得主妇联盟合作社和联华实业的支持，从本土小麦复耕走到全面的杂粮复耕，施明煌一面试图组织生产者，另一面也串连消费端共同推广更远的杂粮中兴。2007年喜愿从一公顷的麦田开始孵狂想的梦、播复耕的种，来到2015年底时，

3. 脸书即Facebook，流行的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

小麦的栽种面积已有五百公顷，而全台各地加入喜愿共合国的小麦农友也来到二百户、大豆农友有三十多户、芝麻和荞麦农友有二十多户，而且栽种农户分布全台各地。这样栽种多元的农友如何组织？如何创造交流？如何形塑农友的共同愿景？如何建构与消费端的对话平台？多年的历程，施明煌是从小麦农友团一步一步培力的基本功做起的。

喜愿社区协力农业营生群组代表着一起共同追寻相同生活方式与协力关系的团体。社区协力农业的具体作为是：知农，要认识并理解农业；亲农，要亲近农业和土地；惜农，要投入时间陪伴；尊农，让农民得到尊重；食农，好好地实在享用在地农产品。把社区协力农业的关系用一个公式来形容的话就是：

（生产者＋加工者＋消费者＋服务者） $\propto$ 互相承诺＝喜愿社区协力农业营生群组

喜愿组织农友的秘笈

2007年喜愿面包开始与小农合作，协助小麦契作，展开麦田狂想的计划时，除了实体栽种计划，有一项云端计划也同步展开，透过友好组织的介绍和信息专业的协助，建置了喜愿小麦行动化生产履历系统平台，提供给生产者、加工者、消费者一个透明、友善的沟通模式，让彼此相互关怀，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此一平台的特色是自主参与式管理，由栽种农友自行上网登录栽种日志，设计者用友善的操作接口，即便是六十多岁较年长的农民也可以轻松填

写，利用此系统可让农作管理程序化，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也都一目了然。施明煌说：“有了网络也改变农友的田间学习，有问题农友会马上拍照给我看，后来有FB和Line⁴，传递讯息更是方便。”

在实际栽种的生产中，大家一致遵守“友善环境种植”的共识，力行不使用除草剂、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学肥料、不毒（捕）鸟。尤其是碰到“超头痛”的鸟害，那几乎是农友心中最大的痛。苑里农友李信武说：“我们是有方法，用到没方法了。”为了赶鸟，农友什么方法都用上了，不论是稻草人、挂CD光盘片、放老鹰和蛇风筝、放鞭炮和人工敲锣赶鸟，但还是无效。花莲玉里农友曾国旗首次栽种时，原本预计收五千公斤，最后被鸟吃到只收五百公斤。被鸟吃怕了，农友们后来有一默契，不要再谈收成多少，就放在心底吧。也因为鸟害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农友只能以扩大栽种面积来抵消鸟害的损失，于是栽种面积从麦向二百⁵也来到麦向五百。

契作的实力并非财务单一向量，施明煌认为：“关键在于契作团队农民的认同与行动转化为内在的核心价值，这才是永续经营的基石。”就像是前述的鸟害，也是透过农友共同认可，以扩大栽种面积来对抗鸟害，大家才可以结伴有胆继续种下去。农友相挺的文化也是来自平日的累积，喜愿长年透过喜愿契作会议、好农壮游、农事战斗营、铁牛变形金刚等聚会和活动，来形塑喜愿契作大家庭的团队文化，而这些活动也成为农友连结与交流的平台。

4. FB，即Facebook（脸书）；Line（连我），是在台湾和海外比较流行的两个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

5. 麦向即“迈向”的谐音，意为迈向二百公顷。

喜愿契作会议

喜愿契作会议也经过几个阶段的转变，最初是2008年喜愿开始环岛方式种植小麦，与各地农友会商种植方式、面积、播种与收成等细节的不定期集会。到了2012年完成环岛环圈后，转为以东部、西部分场举行契作会议。

施明煌表示，为了进一步内化契作团队的合作价值，于是在2013年改为全台契作农友大集合的方式，除了全台农友可跨区交流外，也能有效汇集农友意见。契作会议上，喜愿会发表次年产销《白皮书》；协助小麦采收后贮存和制粉的联华实业，则针对当期小麦质量做出检讨报告；会议中农友会热烈提出问题与建议。喜愿契作会议逐渐成为契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会议，一些重大讨论都是农友在契作会议上共同讨论决定的。

内心坚信农业运动也是人人可参与的社会运动，2014年施明煌开始构思“参与式民主”的模式，期待形成更具彰显合作价值的运作模式，除倡议“喜愿互助公基金”、组织“喜愿共同管理人”机制外，并实践“喜愿参与式验证”（他律与自律）检核模式。互助公基金来自每位农民和喜愿，农民每契作一公顷缴一千元，喜愿提拨契作总面积的10%（例如：契作总面积是450公顷，喜愿提拨 $450*1000*10\%=45,000$ ）。公基金主要作为农产的灾损补助，减少农友损失，并不用于活动。公基金的管理由各区共同管理人来管理，让权力交回农民，让契作成员也拥有主控权。

施明煌说：“2015年7月在彰化二林喜愿制粉所召开的喜愿契作会议，会中通过喜愿互助公基金与共同管理人的选任，喜愿的契作正式跨入新纪元。”

好农壮游，参与式验证

除了喜愿契作会议上的民主学习，喜愿共合团也发展出“好农壮游”的田间学习。壮游意谓着：旅游时间长、行程挑战高、与人文社会互动深。平日要农友离开自己农地三天，去和其他区的农友深切互动交流，不是容易的事，因此特别以好农壮游来彰显农友这趟热于求知的远行。农友交流直接去看田是最直接而实际的。施明煌说，最初的互访有人看了别人的小麦长得好，会来跟他说：“施先生，他的长那么好，可能有什么？”随着彼此认识之后，农友就会分享自己的栽种经验，没有藏私。好农壮游背后的意涵是参与式验证，有农民面对面的情感维系，也有农地上专业和专业的对话，其实最好的验证是农民对农民的验证，这过程中有自律也有他律的部分。随着小麦产量的增加，为扩充通路，喜愿小麦农友也有申请第三方验证，2015申请有机小麦验证的田区已有70多公顷。

施明煌说，好农壮游不是普通的旅行，是透过访视小麦、大豆在产区的栽培技术，让生产者面对面交流，让农友体认作物的差异，除了外在环境，还有种植文化与人文差异。也让农友领略不同作物会形塑不同的种植文化与作物地景，从而思考并开展农村游艺美学。



因此，好农壮游是着重农友们跨区域的资源链接，相互学习、欣赏、理解与关怀。例如：西部的小麦农友透过壮游知道东部农友曾国旗有经营堆肥合作社，大家就会集结数量向曾国旗购买有机肥，这根本是大家当初不会想到的资材共购。

由农友颁奖的“铁牛变形金刚”

当喜愿小麦契作农友团进行一年一度的好农壮游时，也会在行程中进行“铁牛变形金刚”颁奖。施明煌说：“长久以来，农民是阶级的底层，往往只有努力等待在上位者的奖励和赏识。应该要有一种翻转，所以‘铁牛变形金刚奖’是由喜愿联合国的农民颁发给坚守在农业现场守护农业环境的金刚大士。”截至2015年11月，“铁牛变形金刚”奖章共颁发八面，包括学者台大

郭华仁和卢虎生教授、垦丁畜产分所陈嘉升博士，协力的加工单位联华实业和消费组织主妇联盟等。

农事战斗营

还有“喜愿农事战斗营”，这不是一般农场的打工换宿，而是当喜愿农友有农事困境时才发动的。农事战斗营一期营队通常三天，费用1500元交由农民所得。农民提供食宿，导览当地人文景观，介绍田间农作实务。参与者每天必须有五个小时与农友一起从事农务，协助作物收成。而喜愿则准备1500元福袋（1500元等值的农产品，即喜愿开发的本土小麦和大豆等相关产品），赠予战斗营学员，让参与者更加了解他们参与的农事促成了什么产品的出现，也让大家有机会品尝，此外，农友们也常常还会有米和菜等对学员额外的感谢。



农事战斗营是一场充满欢乐与成就的活动，也最令人怀念；后来也发展成喜愿农友与农友间互相帮忙协助的另一开端。施明煌表示，未来喜愿农事战斗营不仅聚焦在实质生产的劳动协助，更会整合不同作物，举办见学、游艺活动，活络作物的生产环节。喜愿邀请消费者一起从共工中出发、从共学中成长、在共游中欢唱！

咱粮学堂

喜愿另一和消费端大众对话的平台就是咱粮学堂，不仅实现农村即学堂的理念，也让全台各地的老师有机会带领学生向农民学习。喜愿自2011年与全国教师总联合会、主妇联盟和联华实业推广食农教育，也积极呼吁大众关心台湾粮食自给率低落的警讯。2015年，透过工作坊进行脑力激荡与设计，打造出全台湾第一辆的喜愿咱粮学堂教育专车——强纳森行动号，主动走入全台各个校园、农村、都市、部落等社群，传递“食育”对台湾当前农粮生产、农村生活与环境生态的关键影响，并一起守

护大家“碗中的未来”。

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和呼应，喜愿共联合国自2011年4月成立大豆特工队后，即参与主妇联盟基金会、台大种籽实验室、主妇联盟合作社所组成无基改⁶农区的推动，用本土大豆的复耕行动力抗衡国外进口的廉价基改大豆。喜愿着力于农民自主意识的启发与对跨国种籽宰制的觉醒，更要求参与喜愿契约的农友，均需签署无基改的承诺书，并在2013年烘焙展中参与承办无基改记者会。

好的理念早已跨越国界在某处发芽茁壮

看了喜愿共联合国这么多的活力实践，不正是呼应着PGS的六大精神：共享愿景、参与、透明度、诚信、学习过程与分享。不论是主妇联盟或是喜愿共联合国，两个组织并未特别用到PGS这词汇，但细细检视他们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就会发觉原来对的事、好的理念有其共通性，它早就跨越国界在某处发芽茁壮。■

6. 基改即转基因。



行动者

果酒变酸， 不是变质而是升华

文 | 李 霖

逃离城市的森林，带上炭笔和相机，记录着土地的点滴，蜕变成山林里一头快乐的羔羊，抱着对自然的敬畏和敬仰，感叹泥土创造了生命和自然的神奇力量。阳光照进田里心里梦里，坐在田野看着小苗渐渐成长，为它加油呐喊是一种美满。树上摘下的果实是大自然馈赠给辛劳者的礼物，捧在手心是一种温度，你家的茄子换我家的青椒和鸡蛋，串门是成果礼物的分享，渐渐懂得生活源于脚下这片泥土，泥土的气息和生命力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富足和生活所依。

——羔羊（李霖）

“很多水果，来不及吃就会坏，大量地浪费掉。如果变成酒和醋，是一种原始又环保的保存方式。”这是启发我去学习和酿造储存食物的源头。

2007年初我和合伙人在越南河内做木材树根开发，供给各地做艺术品的原料。在这儿的山里，有我在童话里见过的热带雨林和神秘的参天大树，树上还挂着诱人奇特的水果。当地人提醒许

多植物有毒性得注意，我虽好奇但也只能远观它们的美了。在此要学另一种贴近原始的生存方式：徒步一个半小时下山才能去到菜市集。后来和村民熟悉了，便可以搭牛车或三轮摩托车。这里气候炎热，口味酸鲜分明。为了节省买菜的周折，每次买菜都会买多一些，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水果、蔬菜、肉类在东南亚气候里是会快

速变质的。这里虽有发电机，但电压不稳定并且只能供给照明使用，根本应付不来大型电器所需要的用电。不太懂做菜却又必须解决与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我，只能抱着一颗踏入别人地方的敬仰心情，带上翻译跟随下山买菜的妇女们，开启了这趟温饱至美味的探索之旅……花了一些时间，我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习惯了这边酸香微辣的调子，喜欢上这里的天然香料和水果。

东南亚茂密的热带雨林，也没挡住从西方爆发的2008年金融风暴，这次的投资宣告失败。经历了犹如电影桥段般的死里逃生后，我几乎是身无分文地回到广州。幸亏还有一门手艺——摄影，我重新拾起被任性扔下的专业。然而在我说走就走了的这三年，热带雨林中的经历反倒令折返至城市生活变得不那么真实。

新搭档是一名导演。我们在黄埔古村租了个百来平米的空间，用或捡或淘来的废旧材料布置成有不同场景的拍摄空间。随后一个画家被吸引加入，带来了新的视角。在我和导演搭

档的视角中，世界是一个个画面的定格，或者说是一个个的片段，从现实中被抽离出来，我是生活的旁观者。然而，在画家的专业中，他需要去考虑各个细节的衔接，凭着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意识去展现一个整体。这种碰撞，打开了我的眼界，也不知不觉地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然而会聚焦，也有整体观的三个人，说到底还是“艺术家”做派。朋友来了自不必说，好酒好茶伺候着；甚至路人经过，进来坐下想喝茶，我们也热情款待。末了，人家说结账，我们倒很愕然：谈什么钱呐。在免费招待了一年多之后，我们才惊觉，原来这个空间是可以用来营业的！客人多了，需求也多起来。然而我们都没有经营餐厅酒吧的经验啊，怎么应付客人呢？我想起在东南亚的生活，凭着记忆，一遍一遍地尝试，努力去复原和呈现记忆中的味道。酿酒是越南妇女教过我的手艺，但也有失手的时候。若时间和温度把握不当，不及时干预，果酒会发酵过度而变酸。曾经浪费了不少，后来才知道变酸后并





不是变质而是蜕变升华为果醋，于是便开始酿制各种的果酒和果醋。慢慢地，我开发出30余种果酒和果醋。

从小就不爱吃水果的我，常看着水果烂掉而无动于衷。学会泡酒酿醋后，看到任何水果都很有欲望将它们通通塞进坛子里，让它们静静地快乐地酿成美味的果酒和果醋。每一款酒自己都爱不释手。时间酝酿出香醇，不但自己能乐享美味，与伙伴们分享成果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酒吧就这样在支持和鼓励下延续下来了。

酒吧敞开门做生意，就会有认识形形色色的人。“有机”这个名词开始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商机，无奈投资太大。当一个念头产生，缘分也随之而来。城乡汇组织者之一的黄义来我店里之后，建议我可以将这些手作的果酒和果醋拿到城乡汇的农墟去试试。农墟！！记忆中儿时去趁墟是自带菜篮子，自备酱油瓶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摆摊，想想都莫名地兴奋。我捧着大大罐的原酿酒醋参加了农

墟，意外地大受好评。随着一次次的摆摊，一次次的和消费者直接交流，我对自己的信心也建立起来。如果说酒醋作品是围绕个人浪漫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喜好，酱料却是为了满足自己轻松享受美味的产物，它直奔健康主题却不失美味。我开始变着法子，做出不同口味的东南亚酱料。开始只是送给小伙伴做下饭酱拌面料，当越来越多人认可这朴实自然的味道，我干脆就做成瓶装方便大家购买。我个人最喜欢虾仔辣肉酱，辣味由浅到深层次分明，香味由点到面轻轻蔓延，最适合喜欢挑战劲辣的小伙伴。除了鲜辣作为主格调以外，虾仔起到鲜香的作用；特意加的小鲜肉，增添了不少嚼劲的乐趣。吃一小口，保证让你冒汗淋漓。

以前在工作生活里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天马行空的艺术家、设计师又或是爱用概念把人带到云里雾里的广告界大咖，然而城乡汇的伙伴们很不一样。我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真实和质朴，大家的交流都是基于单纯的分享。

事实上做农业的伙伴都很有品味，他们懂得真正的食物，真正的生活。由播种到收成，从开花到结果，耕作的人和食物的情感如此直接，如此真实。

食物背后的故事令我产生莫大的好奇，同时亦涌出一股推动我深入的力量。我并不希望我和家人的生活和富足仅只来自超市和商业；在农业伙伴的身上，我看到最接地气的生活方式，真实无比的生命和人情。仿佛间，我又回到了那片原始的森林，蔚蓝的天空，在田野里快乐奔跑……

城乡汇时常会组织伙伴们互访和

举行大食会，看到这些生活在田野上的精灵们，我也很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偶尔和女儿说起，她似乎知道我心思，悄悄地将小河、大树、小熊形状的房子，还有小花小草及家里小猫茶茶画在一起，一个农场的规划图就这样用她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之后，她又拿出积木，搭出了餐厅、花园、外公外婆所住的房子、我和她自己的房间，还有一个游泳池——这一切都是一个完美人生的构想。对于女儿，我更希望能用一种更接近土地的生活方式给她带来滋养。而我的老朋友——摄影——将记录我另一段人生的开始和点滴。■

“老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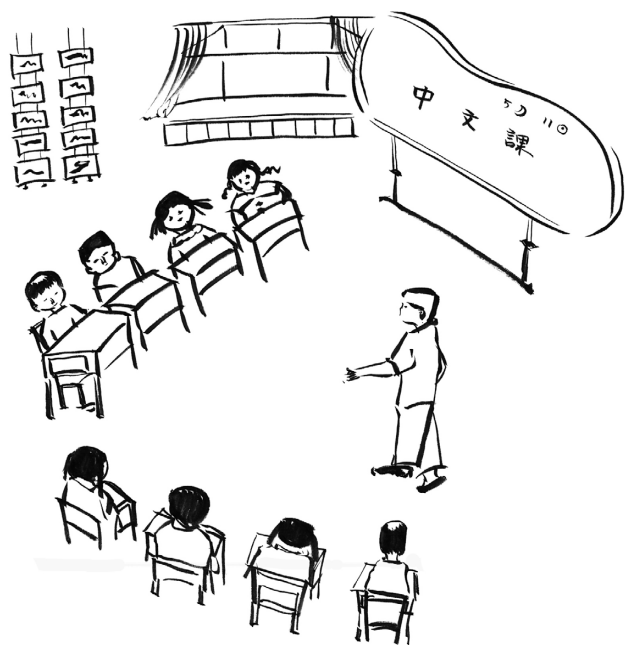
文、图 | 罗 靖

教之初心

零四年，我去成都华德福学校做建校志愿者，教过几个孩子“不入流”的手工，第一次被称作“罗老师”。零六年来到泰国做中文教学志愿老师，因为在泰文的称谓中，“老师”是要放在名字前面的，所以孩子们和学校的其他人就直接用仅会的中文词“老师”称呼我（有的学生偶尔也叫我“老师靖”），我欣然接受。在这间华德福学校，我在幼儿园教手指谣，在小学教一到三年级中文。当时我觉得既新鲜又略带荣耀：我的学生可是最多的了，有一百多个。而我更在意的是，心上有一股单纯的爱意升腾开来。相比之下，这里的孩子似乎比国内的孩子更单纯，也更有礼貌。

初来的时候，我也带着“中国式的浮躁”心愿：我是来传播中国文化的……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了，我是多么的

自负和不自知，我懂中国文化吗？中国文化是什么？直到现在我似乎还说不清楚。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回答。在学校之前的中秋庆典里，他们会拜月（月神娘娘）；走在去市场的小巷里，不少的家门口都挂着八卦，供着神坛。我懂这些吗？我意识到：我过去的生活和教育，是去除了对于自然、神灵和祖先的敬念的。有的只是挂在嘴边的空洞说辞，诸如，“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悠久民族……”这真是个屁，没在生活中传承的文化，数字再大有什么用？我之前听到一个刚刚入职不久的华德福老师要带着毛笔去国外交流。我问她“为什么带？”她说：“虽然我不会写，但也可以告诉外国人，以前的中国人是用毛笔写字的，毛笔是怎么握的，怎么用毛笔写字……要学会秀……”这真是一个“真理”，借用一个推广吟诵的老师的



话说：越是没有，越叫得凶。踏踏实实研究践行的人，是没有时间和功夫耗在面上的。

在学校里，我觉得，中文是排在英语之后的，虽然华德福学校的课程设计并没有将两门外语的地位做一个排序，但在成人惯常的思维里，有用是一个重要标准。我觉得语言的地位不公平，上一次就想着要去争取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这中间就包含着中文课的节数和中文戏剧。这一次再来泰国，我依旧面临这样的问题：中文和英文教学是平等的吗？我要怎样才能求得公平？在一个发端于西方的教育体系里，老师们是否也会有轻视中文的观念在？或是因为不认同我这个外国人，而对中文有一种消极的抵触？自己想来想去，在朋友的提醒下，就追问到了问题的另一层：为什么我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如若再往里探求，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将自己拖入一种比较的心理状态中，为什么不能接受当下的现实，做当下的自己？

几天前，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

条微信：华德福老师的矛盾何其多？这十年，我自己经历了一些，听其他的老师也讲过一些，矛盾显示的既是个性彰显、品行冲突和不认同对方，也是在一个外来文化里，各人对华德福的理解不同。我确实觉得在这个圈子呆得心有些累了，可能有些老师也跟我同样的感受，所以他们有的选择离开，有的自己另起炉灶，导致学校也分分合合。有人在的地方就有矛盾。我不太擅长处理这些，所以常常夹在中间，不开心。还好事物都是有阴有阳的。和老师们相处得不开心时，我可以在单纯的孩子那里找到笑脸，将心力投在他们身上，我为我最喜欢的班写歌，为他们争取到中文戏剧的机会，给他们写属于自己的故事，还带他们做垃圾回收。这一切，既有环境给我的反向作用力，也因为我在那个负面的状态里，希望做一些事情来抓住自己。如果现在让我来选择，我应该不会再做其中的一些事了，至少不会以当时的那种方式做。比如做垃圾回收站，起因是我和孩子们要建一个树

屋，树屋做到一半，树就被砍了，我觉得学校没有保住那棵树，所以我要行动。还有那个时段，戈尔（Al Gore, 全名Albert Arnold Gore）《难以忽视的真相》¹ 全球暖化的论调和台湾慈济² 所宣讲的2020年曼谷将面临海水倒灌的危机，影响了我去开始做环境教育。当时的我是希望孩子们能有环境意识，但在心底，也包含着对老师们没有环境意识的一种负面回应。可这些真的和我有关系吗？我不做环境教育也可以的，毕竟我只是个中文老师。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没做好，跑去做环境教育，这是不务正业。回收站的事情让高年级的部分学生离我远远的——我知道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我，现在又弄出了个回收站——好几次他们经过我身边都是捂住鼻子的。我也在学校工作两年后面临着离职危机。学校找我谈话，说我怎么怎么，我的眼泪不争气地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有我最喜欢的班，我就没有再呆下去的理由。而事实上，最后我离开学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继续教他们到五年级了。谈话之后，我的注意力就转向了中文教学，如何教孩子们画象形文字，如何用更有趣且易被他们理解的方式讲授一个故事。中国能唱的儿歌本就不多，那就自己写。那个时候，如果我对他们没有感情，如果我不想知道他们长大后是什么样子，我离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和孩子们的当下和未来产生关联，这种关联并不是人

智学所提到的有些玄乎的命运关联，而是我希望找到一群人，可以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当他们长大了我还能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共同的生活记忆。所以我想，我要一直教，等第一帮学生长大了，再教这些学生的小孩。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说：我总算做了一件事，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穷老师 富学生

当还在成都做志愿者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中国能上华德福学校的，大部分应是中产和富家子弟，因为学费和学校理念决定和选择了孩子的家长。家境一般的我曾有过这样的念想：穷老师（志愿者）为富家小孩服务（教育），这算哪门子志愿？他们并不需要我帮助，而我自己也更乐意帮助比我弱势的人。来了泰国，一位中文老师告诉我：这里有的学生家里很有钱，某个学生家里有六七台车。我不由得感叹差距之大，因为学校不少老师都是挤公交和搭摩托上班的。虽然在理性上，我应当学会接受一个事实：贫富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可是差距感依然时常在我心里闪过。我曾经接触过的华德福同事家境皆非殷实，他们投入到这个事情上来，多半还是因为热情。大家都知道，华德福老师工资不高，还很辛苦，因为喜欢做这件事，就选择了。在我工作的泰国学校，清一色的全是女老师，不知道国内是否也是女

1. 《难以忽视的真相》（英文：An Inconvenient Truth）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拉蒙家庭视频公司等七家公司于2006年联合发行的一部环保纪录片。由戴维斯·古根海姆（Philip Davis Guggenheim）根据同名图书编导，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进行讲解。该片讲述了全球气候变暖及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明显的灾难性的片段，并在最后呼吁保护环境、减缓暖化。该片获得2007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

2. 慈济基金会，全称“财团法人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致力于社会服务、医疗、教育等领域。其前身为证严法师在1966年4月14日于台湾花莲创立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简称“慈济功德会”。

老师居多。男人一般是要养家的，这样不赚钱的工作只好由女人来承担了。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来看，如果老师和学生间的经济差距很大，也不利于老师的工作。如果老师干这份工作，没有一个可以稳定的且看得见未来的生活保障，她（他）怎么可能用心去养护学生呢？这份心，既包含对于工作和自我的认同，对生命的崇敬，更包括在一个现实生活里：她（他）不用愁吃穿，不用忧住行。

一体的师生关联

在华德福学校，老师与孩子们的关系很紧密，这就需要老师保持一种觉察意识。我最近认识到，一个主课老师和他的学生间的关系，就如同磁石的两极，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共场。就我来说，我是一个权威感缺失的老师，所以在我的课上，调皮的孩子我管不住。对三年级以上的孩子我也有些受挫。这次再来泰国，学校安排我每周都要观察一到三年级的主课老师上课。一年级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男生经常不在状态，所以老师要不时地把走神的孩子拉回来，希望形成一个FORM³，而这个老师的个性中似乎有一种硬硬的特质，所以就显得有些严格。二年级则是很好的一个小团体，自身就形成了一个FORM。主课老师是一位有着两个小孩的妈妈，待人既热情也平和。她在主课上都不怎么去约束孩子，只是要求孩子们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形成一个自我管理的节奏，比如自己盛饭、自己

排队下楼玩耍。我觉得孩子们做得很好，主课老师的黑板画，在课室布置上都呈现着一种美观，有序。而在我的课上，也因为他们的“好”，能与我有一个良性的教学互动。三年级就难管一些了，全班七个男生，一个女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女生在一堆男生中间，不但没有起到中和的作用，还和男生一样活跃。这个年纪本就是一个状态变换的年纪，学生们似一团要燃烧的火，老师如果不更强，是hold⁴不住他们的。这个班的主课老师是一个活跃爱玩的大女生，带这些孩子，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有些不自信的，因为没有带班经验。但慢慢地我发现她有FORM多了，孩子们的状态也跟着在转。在华德福的教师培训中，会讲到老师与学生的命运相系着。我虽然还没体验到这样的关联，但似乎能理解为什么Steiner博士⁵要提出这点，可能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不让教育变成单一技能和知识的传授，变得物质化，就需要让教育有更高的精神导向，让教育包含对生命的爱和敬畏，让老师的生命渗透进孩子的成长中。

我的归属感

老师的生活是什么，那么他呈现给学生的状态，应该就是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了。我从小就生活在一种无归属感的状态中。儿时父母最早南下广州打工，我比同乡的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大城市。看到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我在一种羡慕中希望逃离乡村。后来有机

3. 英文“形式”、“组织”的意思。在这里作者是指课堂的组织，也是上课的形式。因为华德福的课堂总是有运动，有歌唱，由此产生一种形式感。

4. 英文“把握”、“控制”的意思。在这里作者是指老师要在身体的运动、歌唱、游戏学习中观察把握孩子的状态，既允许孩子的天性及个性得到发挥，又要让整个班形成一种学习的整体能力。

5. 关于Steiner博士，请见《在“人的普遍智识”启迪下的思考》一文。

会走出国门时的我，如同一只从井底跳出来的“蛙”，体验到了另外的生活：一方面感受到这个国度的自由呼吸；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异国的孤独。生活很好，可却是别人的，于是学校和学生成了我的依恋。周六不上班的时候，我也会到学校去，享受一个人呆在校园的时光。那种被空寂雕刻的日子，包含着期待和梦想。如果我不教他们，我真的不知道能干什么；如果我不教他们，我也不能继续呆在泰国——这似乎成了我的焦虑。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有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有谁会愿意去割断这种联系呢？即便是忧喜参半的日子。

今年年初，我去探望曾经的学生。时隔四年，发现一切都变了：曾经的学校一分为二，曾经熟悉的家长生死相隔，曾经熟悉的学生擦肩不见，低首不言……我在重重的情感失落中写下了一段文字《漂泊中的爱恋》，以纪念那些还在我记忆里的人和事。不管是否接受这种改变，这都是事实，我只能在这种事实中继续寻找我想完成的事情。

作为自己本职工作的中文教学，我也在困顿中找出路。对于汉字、汉语以及传统文化，我常感到自己的无知。三千年前的甲骨象形文字，我是初识；用了近两千年的繁体汉字我没学过；传统中的道和艺我基本不会……我开始埋怨和反思自己就学时的教育。经过一番探究，我总算知道了拼音是为了外国人学中文而起创的；简体汉字是“废除汉字”不成的延续；我还知道了汉字不是为了记录汉

语而产生的，而是独立于语言的一套体系。所以汉字可以在日本，在韩国，在曾经的越南为不是华人的外国人所用。这全是因为汉字试图表征着世界的实相。十年前，我不知道，古诗是可以吟唱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先吟后录的——而在当时，我还困惑，为什么古代的中国儿童没有儿歌呢？现在我明白了，中国的诗词，蒙书⁶都是可以吟唱的——所以孩子们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儿歌。十年前，我没有机会将吟诵带进课堂，现在终于可以有机会了，也算是一种心愿的补偿吧。可我也自知自己的文化底蕴太薄，德行也不够，就只能边学边行了。心里感谢着给我机会来这边教中文的学校创办人Khun-Usa，感谢着十年前自己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的那帮孩子——是她们⁷让我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前是为她们而教；现在她们长大了，也许不需要再学中文了，所以我会为自己而学，而教。

我敬畏“老师”这个称谓，因为那些单纯的孩子每天还在一遍遍地用“老师”这个词称呼我，因为泰国这个社会还敬重着老师这份职业。当我自觉不能胜任学校这份工作时，我会选择离开。毕竟，老师应是一个社会的良知，他自己本应是一个火种，才有可能点燃那些初涉人世的生命。

唐朝的韩愈曾在《师说》里言：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

我想，此当是不变之理，自当历久弥新；做得如何，就看每个为人师者的愿力和修行了……

6. 古人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学童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最初的蒙学教材是为了满足皇室及仕宦之家子弟识字教育的需要而编写的，在皇室和仕宦之家私传。汉代以后，开始走向社会，成为供大众使用的国民教材。流传至今比较常见的有《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等。

7. 作者的眼中，孩子如花朵般娇弱，需要呵护，所以用“她们”。

青年行动影像¹： 永远都在过程中

文 | 小 木²

一提到集体创作你会想到什么？你还记得你经历过的印象深刻的集体创作吗？你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你之后还会再尝试类似的集体创作吗？你怎么欲言又止，不说话呢？我可能猜到了，当我提到“集体创作”四个字时你已显露出某种不耐烦与焦虑，你的眼睛望向别处，似乎想避免谈到这个话题。我猜你在学生时代经历过不好的集体创作体验吧？那次的集体创作其实全部都是由你一个人完成的，但最后得奖的却是所有人。那让你想起奶奶给你讲的吃大锅饭的故事。你开始有点明白以前那个你不明白的故事了。

不过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另外一个有关集体创作的故事，这个故事与你听到和经历的那些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关于拍摄纪录片的故事。不要紧，如果你不想听，那就在我讲述的时候戴上你旁边的耳机听一首你喜欢的歌吧。那首歌就是今天这个故事的背景音乐。

在这个关于影像的故事里，有一群青年人拿着摄影机走近这个社会中最边缘、弱小、没有声音的群体，将他们的生活与故事录进摄像机当中。加入影像计划的青年人分为几个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选择一个他们想要拍摄的群体进入拍摄，最后制作出一部纪录

1. 青年行动影像是一个青年人和影像的创作计划，推动青年人，通过影像纪录学习善待生命、关注弱势；在行动中表达社会关怀、推及改变。

2. 小木，毕业于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专业，喜欢电影与戏剧。目前为一元公社全职工作人员。



片。这听起来貌似很有趣又能触碰到生活不同面向与群体的过程，吸引了很多内心对于纪录片创作与社会议题怀抱期望的年轻人参加。

最初见到小崔是在九月初的一个下午。他走进一元公社³的办公室，头戴一顶棒球帽，帽檐低低的，留着中长头发。当时我们正在面试几位青年行动影像的报名者。在这次报名参加青年行动影像的几十份简历中，有一份尤其显眼。这份简历在工作经验处写着“算命先生、卖唱歌手、小货车司机、婚礼主持、吉他老师”，这一看简直就是小说里的精彩人生。小崔的简历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脑里不禁开始勾勒藏在这份简历背后的那个人。在当天面试中小崔给人留下的印象依旧如他简历那般强烈。当天我向前来面试的伙伴介绍青年行动影像时，告诉大家这个计划的拍摄对象是底层劳动者和边缘群体，小崔立马

对使用“底层”这个词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不该用“底层”这个词来讲劳动者，说“弱势群体”会好一点。我想小崔之所以对“底层”这个词很敏感，必定与他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关。他说他之前也有过开小货车的经历，但从不会觉得那一类人就是底层。“底层”是一个贬义词，不应该把人分成各种不同的层级。

平日小崔热爱摇滚乐，梦想有一天能组建自己的乐队。他身上还有90年代初玩摇滚的青年的玩世不恭：背着一把大吉他在街上走，站在地下通道里卖唱，什么时候想停下就停下。当时他正处于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青年行动影像正好是一个契机。他想通过用镜头去纪录那些散布在北京各处的流浪歌手与朋克们，去接触身边不一样的人与他们的生活，试图从中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

另一位来参加面试的女生——小

3. 一元公社是一个开放式公益活动中心，开发和支持各类公益创意活动，一周七天开放，全部工作由志愿者承担。

颖静静地坐在桌前，有些不知所措地前后晃动着身体。她在简历中说：“我渴望着生活，世俗的生活，可似乎我一直游离在生活之外。我不明白，是什么将我拒之门外？我想理解和进入真实的生活。”这样的一段话不能说不打动人心。看她简历的时候，只感觉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纯正的真诚与热力，那种对于生活的真切渴望。对于一位大四的学生来说，面对即将步入的社会总是充满期待又不知所措，就像山地人来到城市，望着眼前飞驰而过的车流不知道怎么过马路一般，兴奋又惶恐。在小颖的身上，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仿佛只要跨出一步就会被汽车撞飞的影子。

纪录片对于小颖来说可能就是她接近那所谓真实生活的一个途径。透过镜头去接近生活在我们身边却常常被忽略的普通人，去观看与凝视他们生活的现状与方式。几轮面试下来，青年行动影像便集聚了如同小崔、小颖一般的十多位青年，他们即将拿起手中的摄像机，组成不同的小组，到那生活的大学堂中去闯荡。

面试结束后不久，青年行动影像迎来了第一次的工作坊。在这个工作坊，大家的第一课是关于如何与人合作的。工作坊热身中，大家玩了一个游戏。参与者随意地走在地里，一边做着属于自己的各式各样的动作，一边发出属于自己的不同的声音。游戏到最后，大家走成一个圈，仔细地倾听、观察圈内的每一个人，然后让自己的声音动作做出一些改变，最后达成圈内每个人动作与声音的统一。这个游戏并不容易成功，需要参与者用心观察、倾听其他人，并做出一些让步与妥协。对于自我比较强大的伙伴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游戏，甚至难以理喻。但参与这次游戏的伙伴们还是在协作者的协作

下，试图让动作和声音统一起来。可能是由于大家还不够熟悉彼此的缘故，一段时间过去了，伙伴们还是各自做着各自的动作，难以统一，最后我们不得不停止了这个游戏。

既然叫青年行动影像，其中定包含青年、行动与影像三个要素。纪录片既作为一种青年人行动的手段与工具，让他们去接近身边的弱势群体，去对话、交流；同时它还是一种创作的方式。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中都有其观察与体会世界的方式和视角，哪怕是同样的一只麻雀，在不同的镜头呈现中也会有不同的样貌。而对于集体创作来说，麻雀的样貌是通过小组成员不断地沟通、协商、妥协，最后呈现出来的。所以青年行动影像的青年们遇到的困难是五个人用一支笔画出一只麻雀的困难。当面对一个群体，选择其中的哪一个人作为拍摄对象，怎么与其建立关系并接受拍摄，用什么样的镜头语言与呈现方式，以至拍摄过程中很多小的细节都需要大家通过协商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模式需要参与者们投入大量的时间与自己的组员沟通。这样难免会降低拍摄效率，也让一些小组成员感到浪费时间。

作为这个项目的执行者，在一开始面对大家这些络绎不绝的问题时，我感到很困惑。青年行动影像作为一种让青年人去接触与了解边缘弱势群体的方式，似乎花费时间最多的不是在拍摄上面，而是在处理小组内部事务与协调小组成员的时间、想法、思维方式上面，而这与青年人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的理解当中青年人发展是一个觉醒的过程，是为青年人打开一扇窗或大门，让我们听到淹没在巨大的主流社会之音中的其他声音，让我们看到与

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状态，与我们自身形成对照。也许可以在这基础上，开始让青年人有意愿并自觉地去关注身处其中的社会与存在于这个社会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在以往，我理解的觉醒是乌托邦式的，从没想过一个觉醒的过程中充满的也许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的伟大事迹。而现实，至少在我经历的现实与我之前所设想的有很大的反差。现实中的觉醒让我觉得那也许不是觉醒本身，而是充满各式各样琐碎耗神之事的过程。一个觉醒的过程。

我意识到青年行动影像是一个过程多于结果，是在一次拍摄工作坊中。在那次的工作坊中，每个小组都要向大家展示自己拍摄到的素材，一起讨论面临的困难与阻力。其中一个小组从该计划一开始便显示出非常高的热情与创造力，思维非常活跃，对于拍摄的议题和拍摄手法有很多的想法。但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实践，该小组在工作坊上与大家分享他们面临的困难、展示素材之时却

显得低落、受挫。该小组的成员几乎全都有自己的正职，他们只有利用周末和其他的休息时间与被拍摄者相处。在这段时间，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与他们的拍摄对象见面，但那天展示出来的却是一段声音、视觉都模糊，没有太多内容的场景。看着自己手上所拥有的这点素材呈现在荧幕上，与预想中的有着太大的差距，他们都没有说话。在接下来的困难分享中他们想法非常多，大多数都是各种不同的还未发生的担忧，而这些担忧直指最后是否能够拍出一部好的纪录片这个结果。就在这时我忽然意识到，不仅是这个小组，还有其他的小组都太注重结果了。

但不论是青年行动影像还是纪录片本身，其实更强调的是对过程的细致体察。当镜头对准一位家政工大姐的时候，若拍摄者脑海里想的只是怎样拍出一部好的纪录片，怎样问出下一个好的问题时，他其实就已经抽离了现场。而一旦他抽离现场，就无法真正去感受当下情景中的



人，并对人的情感做出真实的回应。如果青年行动影像只是让小组成员觉得最后要拍出多好看的纪录片，那就开始远离这个计划的初衷了。当想法都是指向最终的结果之时，无论那些想法多么机灵、漂亮，当镜头将他们拉到被拍摄者跟前时，他们仍旧是失声的。

我慢慢意识到，在参与青年行动影像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协作者的我自己，还是小组成员们，在一开始都太注重结果了。因为我们太注重结果，所以在小组内部遇到问题时不会静下来从这些问题中去学习和思考，去反思自己在团队中的作用和位置，从而更了解自己。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我们大多用集体创作这一模式的缺点来做挡箭牌。也是因为我们太注重结果，所以忽略了拍摄过程中的人，包括拍摄对象，我们自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慢慢意识到，青年行动影像的可贵之处在于首先它制造了一个没有太多利益冲突的团队工作的机会，这有利于年轻人去发现

自己在团队工作中的所长所短。其次是青年行动影像让我们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场与过程当中，因为当摄影机一开机，我们就必须用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去与被拍摄者沟通互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以了解到那些看似与我们生活相距甚远但却又如此相像的没有名字与声音的生命。这样的过程，我们得以看到、听到卑微渺小却又无比宏大的生命故事。

写到这里，如同这篇文章零散的布局一般，我对青年行动影像的认识，也是在这些零散琐碎的过程中慢慢生发出来的。从一开始对于集体创作的质疑、对于充斥于纯粹事物中的琐碎费神之事，到现在的一些新的认识与理解，所有的事情都在行动中开始发生和改变：我们的思想、态度、对于事物的认识……在这篇文章结束之时，青年行动影像计划还在进行着，之后我的想法还会随着实践而有所变化，希望唯一不变的是在过程中不断地感受与思考。■

协作者手记

文 | Heaven

我的三个生命片段

工作坊中常有一些个人生命故事分享的环节，作为协作者，我们尝试去问的多是“影响生命发展方向的三件事情”之类的问题，目标当然不仅仅是帮助团队建立深度联结，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环节来帮助参加者探索“我是谁”。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工作坊场景下，我也被问过类似的问题很多次。有些时候答案是一样的，但每过一段时间会发现答案有变化。每一次被问到的时候，我总乐于再一次寻找，让自己进一步探索。因此，这一篇自我的梳理，我也想先从这个问题的开始，先来分享“我是谁”。

我是我父母的女儿。记得小的时候，家里虽不富有，但因为父母都是国企干部，逢年过节，总会有很多人来家里拜访。但我们家境从来没有过大富大

贵，甚至在90年代末国企倒闭转型的时间，曾经一度经济困难。那段时间妈妈一直担忧会影响我的求学，直到我大学毕业，才舒了一口气。长大一点的时候，慢慢了解了父母的一些故事：我的爸爸乐于助人，曾经年轻有为，有很多机会升迁。但据他的说法，由于不想也不会巴结领导，错过了很多机会；而很多昔日的伙伴，已经身居要职；妈妈是一家国企的厂长。国企倒闭潮的那段时间，妈妈申请了早退（提早退休）然后又被返聘，处理企业倒闭后的善后工作。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来拜托妈妈帮忙，自然送礼的人也不少。父母总说：如果要富有，我们家也不缺机会，但有些事情，总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一关。后来，当有机会梳理家庭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才看到父母对我价值观的影响：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诚实和



关心他人的人。父母的言传身教，是我最后选择成为一名NGOer¹的基础。

我是一名公益行动者。2004年成为义工的宝贵经历为我打开了进入公益领域的大门。当时对公益的理解很狭隘，以为公益就是服务他人。2008年，我参加了当时和谐发展促进会（SHD）²组织的一个青年公益领袖成长计划。现在想起来，当时在培训时间之外，一群人最经常做的就是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弹琴聊天，事情也没做成什么，但很多以前的价值观被打破重建。SHD帮我从一个更立体的角度理解社会议题，包括怎么看待公益、怎么看待少数和边缘。我第一次看到自己身上主流观点留下的烙印和影

响。这一段经历，让我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及社会，开始了寻找自己关注的议题，以及希望回应议题的方式和路径。

我是一名协作者，通过提供工作坊/会议协作，推动共同学习或议事，从而协助团队/个人去回应他们所面对的议题。这个身份始于2009年，与另外两个小伙伴因为关注本土义工的成长，而成立了现在的机构。开始的时候想得很简单，没什么特别清晰的方向：看到什么有趣，或有什么资源来，就组织怎样的工作坊；看到义工缺学习，就组织培训。后来接触到协作，直觉地认为这样的方式很契合志愿者团队的特质，便顺其自然地走上了协作者的道路。协作

1. 指在公益组织工作的人。

2. 和谐发展促进会于2007年4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期望透过多元的培训项目，培养新一代的公益组织领袖，促进交流及整理经验，从而推动和谐及公义社会的发展。



更像是一种工具或方式，各种各样主题的工作坊不成体系，看不到人的改变，也看不到问题的改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也不确认工作坊的价值在哪里。这让我很迷惘。于是不断追问自己：义工/行动者的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追求的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改变？我的议题在哪里？协作究竟是我的议题，还是我的方式？个人学习如何推动社会的改变？……偶然的的机会，在泰国参加了BEST³的学习，探索个人转化与社会转化之间的路径，以及之后多次在泰国民间社区参访的经历，开始让自己对社会发展有了更立体的想象，对我们的生活

可以有怎样的形态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对协作者的角色以及所需要具备的发展视角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有一次，我很疑惑地问当时的老师：作为一个任何议题都可以进行协作的协作者，我找不到我的位置，也找不到我的议题。我的老师当时回答：当然有，你的议题可以是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你的工作可以推动参与及平等的文化。当时一知半解，模糊地觉得对，但梳理不清楚。直至回到国内，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梳理协作者发展的路径，才慢慢地看到其中的关系。这个时候，才有了目标感，也才开始看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3. Buddhist Education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的缩写，即佛教教育和社会转化。BEST课程是IWP（International Wome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Justice，国际和平正义妇女伙伴）开发设计的一个以社会转化为目的的佛教教育课程。IWP由女性主义活动家Ouyporn Khuankaew和Ginger Norwood于2002年创立，主要通过培训学习支持泰国、南亚和东南亚的关注和平正义的草根妇女组织。她们遵循非暴力的工作原则，建立在整全的女权主义基础上，推动社会行动者在个人、社区以及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化。BEST课程是泰国的社会行动者运用过去15年里与来自草根团体到政府团体的社会改变者的工作经验而开发出来的，其理论/信念体系的根基包括非暴力社会行动、精神修行/实践和反压迫的女性主义。课程希望通过社会结构性的分析来理解个人转化与结构性转化的互为依赖的关系，在此之上支持参加者将精神力量/实践和社会行动整合起来。



我开始认为，面对一个真实议题的协作者是最贴近社区/社群的工作者，协作者带着怎样的价值观工作，必将影响着他所面对的社群/社区；协作者带着怎样的发展观，必将推动着社群/社区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如果协作者认为参与、伙伴型文化是这个社会文化的重要因子，那他们的工作也可以推动一个更强调民众共同参与、权力分享的社区/社群。因此，我们把协作者从传统的狭隘的会议协作/工作坊协作中抽离出来，而看作是一个推动社区/社群改变的主体。我期待，自己有能力 and 这些协作者在一起，一起成长。

为什么是协作？

协作是一门推动参与的技术，无论应用在学习上，还是应用在问题解决、项目发展上。协作者更像是点燃团队智慧的一支火柴，让团队在此过程中相互分享、讨论和激发，从而达成目标。因而，对于传统的培训或咨询，协

作者更像是流程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而非给予答案的人或提出解决方案的人，我们把工作坊的主体还回给“参加者”。而“参与”隐含着的假设前提是：每一位参加者的经验和知识都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相互的身上学习，每一个人都可以贡献。参加者不再是被知识“填充”的个体，而是成为集体智慧的创造者之一。参加者在过程中被鼓励表达、倾听、欣赏和相互理解，从而确立对自我的认同和接纳。于是，参加者可以在参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的培力。

与此同时，协作在让一个团队有意识地探索参与的内涵，及重构团队权力结构。在参与的过程中，大家会开始思索“谁的声音是重要的”、“参与如何发生”、“如何让更多人卷入进来”、“如何看待团队的主流和边缘”、“如何才是真正的共识”，当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到团队工作中的时候，参与的文化才有机会生根发芽。

我们希望社会改变不是一个人或一小群人在孤独地做的事情。我们希望社区/社群工作者可以带着更多的参与的意识和方法，来发动更多不同的民众参与进来，当越来越多人有了参与的意识，我们的社会文化土壤，才可以产生改变。

九月跟一群社区妈妈做了个两天的工作坊，通过协作来帮助这群妈妈们组成的社区组织解决她们在志愿者发展和维系上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借用着一个框架，我提问题，妈妈们自己就叽叽喳喳地聊开，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法就出来。有些时候也不急着拉大家回来，大家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更能打开。这过程就像跳舞，有时候是我领着她们，有时候是她们领着我。我很享受过程中相互陪伴的感觉。对我而言，花一段时间，和一群社区的伙伴一起，共同面对她们遇到的困难，再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这样的经验真实而亲近。而这些真实的体验，也成为了我工作的动力。

正因为有了这些想法和体验，我希望我的工作推动“协作”：一个在技术之外，还有很多内涵探讨和挖掘的议题。

协作是一场个人修炼之旅

我更把协作的实践看作是我个人修行的旅程。

为了更好地以参加者为中心，我需要学习放下脑袋中批判的声音，学习如何中性。2015年6月份，我参加PCD（社区伙伴）组织的泰国TOT⁴工作坊。我们探讨“放下自我”，修习正念，更敏感地觉察和回到当下。我们练

习感知自己的身体、观察自己的感受，看到自己的意识和想法，当保持着这种觉知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有意识地放下自我，更可以看到参加者，同时培养自己的直觉。而“放下自我”，也包含着放下“以人类为中心”的思考，我们需要和自然建立联结，建立与世界的一体感，从而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去定位，同时需要不断地探索自我的状态、看到自己的习性、执念，看到自己对权力的使用……

实践协作的路上，遇上很多很好的老师和前辈。尽管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专注发展的方向，但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很共同的协作者特质。如：

敏锐 对自我的敏锐，对参加者状态的敏锐，对团队状态的敏锐，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质给予不同的回应和支持。

谦卑 有着坚韧而盈满的内在，却愿意对新事情新观点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可以把自己放得很低，但没有失去自我。

勇气 看到问题并愿意行动的勇气，内外一致，愿意把真实的自我展现。

保持着内心的平和 不容易摇摆的内在，在风浪到来的时候保持着平和的内心，同时这种平和的力量能够传递给其他人。

写到这一段，我忽然意识到：这些写下的特质，都是我特别欣赏而又希望自己可以具备的。

如果说，协作的实践为我的生命创造了什么，我想会是：让我在行动中不断理解社会和世界的同时，学习探索自我的内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平和、更开放和更与世界联结的人。■

4. Training of Trainers的缩写，即协作者培训。



见 · 远

意识与物质分分合合

文 | 郝 冰¹

Shantena仿佛一位自在的导游，在人类意识演化的道路上，指点我们一路的风景，从远古万物有灵，一路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心物两分，本意是为思想不容质疑地立论，不料却是南辕北辙，人类意识沿着科学范式与约化主义从欧洲启程一路狂奔，直到物理学家对物质的研究精微到量子的层面，峰回路转地得出结论——物质不存在——缠结、定域性，EPR实验，爱因斯坦与玻尔长达八年的争论都是这一结论的背书。跟随的游客正在困惑间不知何去何从时，Shantena话锋一转，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下子转回到几千年前的东方，人类的意识

与物质俨然在时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圆。作为读者，心没被悬在虚空之中，颇为妥帖。Shantena是一位量子物理学家，也是发现黑洞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是把《道德经》和《易经》翻译成英文的人。所以他所述的物质与意识，自是严谨高妙通透，值得一读再读。而他走到你面前时，却是一位最随和谦虚的长者。

宇辉就这样迎面遇到了Shantena。一开始，他想的是印证自己练习太极拳在身体和意识方面的体验，却意外地在量子物理学和老子的启发下，回顾了自己的生平，检视自己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宇辉与自己面对面，诚实地看着。

1. 作者系北京天下溪自然学园园长。2010年和杨艳老师合作创办天下溪自然学园，践行华德福幼教理念及王凤仪先生的哲学思想。2015年参加了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举办的“当量子力学遇上道家哲学 - 关怀天地的整全思考”转化工作坊，并在Shantena随后的北京交流活动中担任翻译。

注：本文中的名词，请详见各文中脚注。

曾经的相信与困惑变成一个又一个的二元对立浮现出来，如自然与社会、结构与个体、社会的理论与现实，自身的理念与行动。我们看到一个真诚的青年面对世界时的追求与茫然。进退失据的内心，不只属于宇辉个人，至少我有过。分型学、量子物理学和老子，不约而同地破掉了二元疆界，个体的意识破掉了我执，融入一个更完整的图景，更灵活更舒展更自在了。

一百年前Rudolf Steiner用西方人习惯的语言与逻辑，不厌其烦地讲着看似来自东方的意识，告诉他的听众人是三元的，精神也是一种科学，人的意识演变有着不同的阶段。在人智学的启迪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华德福教育、活力农耕、人智医学，人智学金融等领域，以及优律司美、绘画艺术等样式在世界各地的社群中得以实践。过去十年，华德福教育在大陆得到家长的回应，作为对于突破传统教育的一种可能选择，成为教育界的一种现

象。而对于其思想根源的人智学，深入者寥寥。朱明为我们做了“人智学”（Anthroposophy）导读，分享了他的思考。他认同Rudolf Steiner说：“华德福学校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文化行动，目的是要革新我们今日的灵性生活。我们应该考虑到所有事物内在的转变；整个社会运动最终必将回归灵性，而学校教育问题是当今激烈而重大的灵性问题中的一个分支。”而这一出发点若见容于当前惯于个体批判的理性灵心，仍然有待时日。

三个人，三篇文章，链接了不同时代、年龄、地域和文化的一种不约而同的寻找。量子高深难测，老子玄妙浩渺，Steiner博大精深。这些视角，怎么读都有趣。还是应了老子的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门在那儿，还不止一扇；道在那儿，不止一条；现在的问题是，你在哪儿？■

无名有名—— 当我遇上Shantena老师

文 | 陈宇辉¹

“当量子力学遇上道家哲学”工作坊²开始时，主持人问参加者们的期待，我当时的回答是想印证自己练习太极几年下来的心得。没想到工作坊的内容却带领我走得更远，帮助我重新检视与确认自己世界观的模塑与改变。

我生于一个普通的香港家庭。父亲中学毕业后一直对职业、工作赚钱等看得很轻，而把心思放在他所相信的、为国家培养年轻人的志愿服务事业；母亲念完高中后在一所中学工作，曾执教鞭，及后因声带问题而改为在学校担任文员，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学校服务。父母在我小时候，除了新闻、时事节目及

一些知识性的节目外，基本不让我与妹妹看太多电视节目，反倒比较鼓励我们多看书。人文、社会的关怀是他们传给我的宝贵礼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人”——“社会”以及个人在当中的角色是我最关心的内涵。我记得高中时有位很好的基督徒同学诚心向我介绍她的信仰，我虽深有感动但婉拒说，我希望继续相信人的力量，而不想把力量交托给信仰。大学时我念政治学，念兹在兹的是公正、公义的社会应该是何等模样，人的解放（emancipation）如何可能等命题。科

1. 作者系社区伙伴城市项目经理。

2. 2015年10月，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举办主题为“当量子力学遇上道家哲学——关怀天地的整全思考”的五天转化工作坊。相关资讯请见：<http://www.kfbg.org/chi/events/quantum-physics-daoism-2015.aspx>。除此外，本刊其他地方涉及Quantum Physics都统一翻译为“量子物理学”。

学、自然（在那时还是更多地理解为自然环境）对我来说更多只是高中课本上的知识，是为了升学的必要之恶。

在追寻的过程中当然有失落有困惑的时候。比如大学时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思潮，反思自己如何被社会大环境所模造，并意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制着身处的社会而无处可逃，那种孤独惶恐实在无以名状。又或者读到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议题后，一步步地剥离自己被建构起来的性别意识，看似有所“充权”；但有一回母亲的困惑让我意识到性别枷锁的真实，读了几年书的我惶然无法协助，只能在家人面前哭成泪人。

尽管如此，过程中我还是一步一步地、在上述的家庭背景及知识追寻的基础上，寻找参与、介入社会的位置与方式。大学时我参与了跟公民教育、公民培养相关的团队，并同时保持着对学生运动的关注与对话，从而找到了一个能实践自己的平台。踏入社会后，机缘巧合下我进入了NGO的领域，以职业的方式参与到政策倡议、环境运动、社区发展当中，关心的一直还是上边提到的、对社会公义及人的解放的继续寻求。

但慢慢地困惑开始浮现。

首先是因立场所带来的泾渭分明。每个人、团队投入到“社会参与”时，多多少少都带着自己的社会分析进入到公共场域，并希望自己所相信的价值得到落实，从而推动社会向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然而当今的社会矛盾异常激烈，信息传播的速度

又令黑白瞬间二分。自我的膨胀，乃至对知识、理性的自信，让意识形态、立场变得牢不可破。在这样的脉络下，我对该如何介入社会、推动自己所相信的改变越发变得犹疑不决、思前想后，甚至开始怀疑仅仅是从社会的视角介入是否足够？

再者则是所谓结构（structure）与个人（agency）的二分。个人组成了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模塑着个人的行为。在比较早期的探索中，我的注意力比较多地放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上，比如说政策法规的倡议、关心全球贸易体系的不公平等等。后来慢慢觉得总是把手指指向别人而无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对劲，开始将视点转移到社区、群体层面以至个人的改变。但这样的视点转移却始终让我带着某种罪疚感，担心事情变得小众、小圈子、个人化。

再进一步，则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及限制。谈社会理想、谈价值很容易，但正如香港社会运动近年很流行的一句，“身体最诚实。”比如说面对主流生活价值的“引诱”，我究竟能够多大程度把自己所相信、认同的价值落实下来？又或者当面对制度性的权力时，自己有多大勇气直接行动以带来改变？当我们知道人与人的重新连结是回应主流社会的重要一步时，我又如何面对自己的怠惰或者是“社交恐惧症”、导致迟迟没有做真正的社区连结？

就正如心理学家荣格（C. G. Jung，全称Carl Gustav Jung）³在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⁴等人所译的《易

3. 卡尔·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

4. 卫礼贤（1873-1930），德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1899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后，卫礼贤被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他从1913年开始翻译《易经》，耗时10年，1924年在德国出版。回德国后，他将《太乙金华宗旨》翻译成德文，取名《The Secret of Golden Flower》。此书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多种文字。

经》英文译本⁵写的推荐序中提到，“我们必须承认‘机缘巧合’的无比重要性”⁶。上述提到的种种困惑，在Shantena老师带领的工作坊⁷上，或多或少地都得到了解答。

科学某程度上象征着人类对知识、理性的终极追寻，透过科学及其方法，人类在过去几百年大量地增加了对宇宙万物的认识。然而吊诡的是，作为科学最前沿的量子物理学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经发现，我们对世界的基本假设（比如因果定律、物质的存在）在粒子的层面变得不再确定。由对理性的推崇所衍生出来的尖端知识最后却告诉我们，人类终于碰上了知识、理性的边界。当老师向我们分享着这些一百多年前的“发现”时，工作坊参与者们不禁感叹这些发现对科学家的严峻冲击。

在这个意义下，人类一方面可能为找到“知识的边界”而感到高兴，但更大的可能是让我们迅速地变得谦卑。科学对（物质）世界的自信曾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以及社会科学），以至我们在社会层面设计出诸如福特管理主义，于社会科学中发展出实证研究，甚至连马克思主义也要争夺“科学历史观”这一头衔。然而我不禁追问，一旦意识到现实并不如此坚实，世界也不一定就是眼睛见到的形状，社会上种种的思想提倡者还如何可以信心满满地为自己争辩？或者换个角度去想，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怎么还可能不意识到据理论争的限制、各据立场的偏颇？

Shantena老师分享到，量子物理学发现到观察者本身并不自外于被观察的现象，而恰恰是观察者的“进场”促使了现象的呈现（即“量子测量难题”）。在与荣格超过二十年的通信当中，量子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⁸指出旧有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二分法将不再有效，物理（Physics）与心理（Psyche）的进路是殊途同归，最终将汇流成一。Shantena老师同时提到，数学上的分形（Fractal）展示了非常简单的程序却可组合出超乎想象的复杂体系。

从这里我继续“任意联想”，开始反思结构与个人的二元概念。正如观察者并不自外于物理现象之外，个人的“进场”自然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状态，而在社会运动中所谓“制度改变”与“个人转化”的两立，极有可能只是我们在旧有的对自我的理解下的伪命题。而看似极为简单的现实介入（比如吃健康食物），在分形的意象下却可能带来超乎我们想象的效果。进一步说，“社会运动”对社会、现实介入路径的定义及预设，既是自我设限，也某程度上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其他重要面向（如自然、心灵、艺术、科学等），并因而窒碍了人与人的连结与对话。

无比重要的是，Shantena老师反复地提醒我们，在认识到波浪与海洋互为表里的实相下（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我们应对两者（“无名”与“有名”、“制度”与“个人”、“社会运动”与

5. Wilhelm, Richard and Baynes, Cary, 1950,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Bollingen Series 19.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3rd edition (196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作者翻译，原文为：“We must admi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for the immense importance of chance.”

7. Shantena老师于工作坊上分享的主要内容，详见《老子和量子物理学》一文。

8. 沃尔夫冈·泡利（1900-1958），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是量子物理学研究先驱者之一。1945年，在爱因斯坦的提名下，他因泡利不相容原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社会”）同时保持觉醒，活在世界里但又不要从属于世界。⁹

如果说量子物理学展示了理性走下去的限制，那Shantena老师对《易经》及《道德经》的分享则更是展示了人之渺小、大道之不可言说。成书于数千年以前的《易经》卜辞仍然能与现今的读者及占卜者有效对话，

既反映了成书者对自然运作的深刻认识，也不无警醒地提醒我们主流的知识体系，既不是整幅地图，更不是实相本身。而回到我前文提到自己在介入社会、参与社会改变时的犹豫与困惑，《道德经》以下的文字最能代表Shantena老师在工作坊上带给我的智慧与启示：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9. 详见《老子和量子物理学》一文。

老子和量子物理学

文 | Shantena Augusto Sabbadini

译 | 张彩云

编者按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Shantena分别在米兰大学及加州大学担任理论物理学家。出于对更具有变革性的个人和社会实践的渴望，他于1976年离开学术界，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创办了一个精神生态农业社区。80年代末至90年代，他担任意大利Edizioni编辑社翻译和顾问，游历印度并教授和实践冥想。1991年他担任国际东西方研究中心爱诺思基金会（Eranos Foundation）的科学顾问，并师从荷兰籍汉学家鲁道夫·利策玛（Rudolf Ritsema）学习中国古典，其间完成了多项翻译及评论，包括《易经》及《道德经》。自2002年起，Shantena担任意大利托斯卡纳一间另类教育机构Pari Center for New Learning的助理总监。除此之外，现时Shantena亦在位于英国德文郡的舒马赫学院（Schumacher College）教授短期课程，并主持以道家思想、量子物理学为主题的工作坊，及利用《易经》作内省工具。社区伙伴邀请Shantena在2015年10月底至11月初到北京走访交流，本文为Shantena于访京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的演讲稿译文。

世界的灵魂（Anima mundi）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evy-Bruhl）用“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来描述古代和传统文化的心灵结构。在这种心灵状态下的个体的

“我”没有清晰的界限，相反“我”跟环境融为一体，意识跟世界紧密交织（Lucien Levy-Bruhl, *La mentalité primitive*, Alcan, Paris, 1922）。对抱着这种世界观的文化来说，意识并非

思想主体才有的属性。意识弥漫于所有事物中；每一处都有意识。整个世界都是活的（animated）：世界有anima——灵魂。譬如，在古代希腊，山泉是女神，树木是精灵，风和河流也各有其神祇。

在这些文化里，日常生活的每个行为，不论是狩猎、采集食物、烹炊或建造居所，都是在跟各式各样的意识建立关系，并跟另一种东西对话，而这另一种东西跟作为“我”的个体一样，是

活的和具有意识的。

一个猎人必须跟猎物说话而不只是杀死牠，因为猎人必须说服猎物，请牠成为滋养他及其家人生命的食物，就如他们最终也会成为其他生命的食物一样。基于这种看世界的方式，日常生活的每个行为都是神圣的：每个行为都参与了令人敬畏的循环不息的生命的奥秘。人类沉浸在生命的周而复始中，始终感到循环不息的生命远比个体的存在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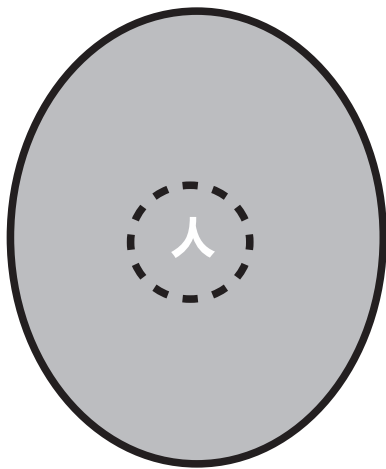


图1：世界的灵魂：在此图和下图，大椭圆代表宇宙，灰色代表意识和心灵。在原始文化里，意识弥漫整个世界，而“我”的界限是可以穿透的（点线）：我和世界之间没有清晰的分界。¹

笛卡尔和心灵与物质的分离

在现代的意识观念中，“我”和世界是分离的。人脱离世界的历史漫长而复杂——这段历史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历史。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只聚焦其中一个转折点——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将心灵和物质二分，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科学思想。

我们也许可以说，笛卡尔以被称为“科学的角度”探究哲学。在笛卡尔的时代，科学刚开始无畏地迈出它最初

的步伐。科学工作累进式的进步和哲学周而复始地推敲同样的根本问题，这两者间的差别，对爱寻根究底的人来说，大概已十分明显。笛卡尔决心要让哲学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为此他致力找寻一个我们不可能怀疑其真确性的基本命题，最后他在自己的思想过程中找到无可置疑的证据。笛卡尔认为，我们不可能确实无误地述说外在的事物。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确实无误地述说他人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此

1. 本文各图的灵感来自理查德·塔纳斯（Richard Tarnas）2008年在Eranos的一次讲课中的绘图。

刻正在思想”，而这是有关存在的事实的证明。笛卡尔的公式是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

因为退守心灵，笛卡尔不得不将通过五官理解的外在世界视为跟心灵不同的事物，为此他指出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res cogitans（心灵）和res extensa（物质、外在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当下的和最初始的证据确知心灵存在；至于外在世界（物质），我们只能根据五官给我们的资料，通过理智推论其存在。对笛卡尔来说，心灵不存在于空间，而这正是心灵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理解的外在世界具有占据空间的特性，因此他称之为res extensa。

科学范式和约化主义

在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下，现代人类跟世界疏离的命运从此无可挽回——象牙塔内的“我”孤立于其周遭的静止不动、没有感觉、外在的物质世界（res extensa）。从历史角度而言，心灵和物质的分离最显著的结果是科学研究从此可以完全聚焦物质世界，并以发现其固有规律为目的，不必受制于宇宙具有心灵等的形而上的想法。（这类形而上的想法的例子之一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象下坠是因为它们受到吸引，要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

在后来的三个世纪里，科学家们全力探究物质世界及其固有规律，并且取得相当骄人的成绩。事实上，科学

家是如此成功。以至到十九世纪末，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中的“心”（res cogitans）变得可有可无。在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里，任何“生命力量”、“精神”、“心智”或“意识”等对自然事物的干预，都变成是多余的，而且逐渐被视为“迷信”。心灵曾经被笛卡尔视为存在的首要证据，现在却成为附在物质、外在世界（res extensa）这封闭的宇宙上无关宏旨的东西。

这个约化主义的范式到今天仍享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和医学科学这些范畴。譬如，神经科学认为，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大脑的全部线路，我们就可以完全解释心灵或意识。换句话说，所有最基本的因果机制都在神经元和神经键等层面上运作。意识只是一个附带现象，是大脑里发生的物质过程的副产品。

如果世界只是静止不动的物质，我们就可以任意取用世界所有的东西。但剥夺世界的灵魂的结果是人类也一并失去灵魂，人类生命也随之失去意义，而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变成单纯是工具性的：世界的物化/客体化变成是其他人的物化/客体化。如果世界可以被约化为科学上的描述，可以用数量来量度，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被约化。金钱是物质交易普遍使用的抽象量度工具，现在却成为人类交流的终极准则。奴隶成了主人：我们发明的东西反过来奴役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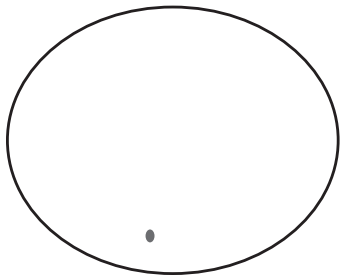


图2：现代世界：人类不再在世界中央。意识只在我们里面（如果仍然有意识这回事！如果意识不单是一个附带现象！），而意识纯粹是生化过程的一种随机结果。宇宙是一个庞大和静止不动的物质的聚合，其存在既没有终极目的也没有意义。

量子佯谬

意识从首要证据变成只是物质的附带现象。如果这可以被视为笛卡尔洞见的第一个矛盾发展，那么量子物理学的出现可说是另一个转折点，虽然意义相反却同样地充满矛盾。当科学家不断深入挖掘物质（*res extensa*）的内核，从其越来越细的结构探究物质时，最后却被迫发现——物质并不存在。我们或者可以审慎一点地说：物质跟我们天真的和习惯的想法全然不同。在微观的层面，它表现得很荒唐，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同时，也许较重要的是，在我们称为物质和心灵或意识两者间，看来没有清晰的分野，相反两者是缠结一起难解难分的。

这项发现的历史很复杂且充满争论，但聚焦一个具范式意义的故事可能有用：EPR实验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故事的起点跟1930年代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辩论有关。从一开始，次原子物理学的实验便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物理学家称之为“粒子”——构成物质的东西——的古怪表现。这些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東西可以同时在不同地方出现，或同时处于不同的状态，而且其性质表现出一种固有的不确定性。似乎只有在被观察和作为一个观察行为的结果时，粒子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状态或固定的地方。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违反常理的想法——事实上，这想法至今仍未渗透我们日常的意识，也未影响我们在这世界思考或行动的方式。量子理论的其中一些奠基人物也不能接受这种想法。爱因斯坦猛烈批评量子物理学不符合实在论（*realism*），并且跟玻尔——对量子物理学作所谓“正统诠释”的主要人物——展开了长达八年的激烈辩论。

193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他认为足以证明量子物理学不完备的决定性的论据。他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Gedankenexperiment*），证明由量子物理学引申出来被称为“缠结”（*entanglement*）的想法是如何违反常理。所谓“缠结”是量子系统间一种特殊的“超距作用”（*action at a distance*）。爱因斯坦的实验将量子理论违反常理的面向推至极端，志在得出看来是十分荒谬的结果。

“缠结”实质上是指两个系统的互动方式在它们的状态间建立了永远相连的关系，无论两者朝不同方向走了多远，它们始终互相关联，永远是一个系统。如果其中一个被量度，另一个立即知道。换句话说，空间的距离看起来毫不重要。你可以说它们间存在“心灵上的联系”，就像兄妹和母子间的联系一样。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但可以很好地表示何谓“缠结”。这概念最终要表达的是，宇宙在深细精微的层面是一个不能分的整体。我们眼里的宇宙由不同的物体构成，但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无法触及它们间极幼细的线。

上述有关“缠结”的思想实验被通称为“EPR实验”，EPR是爱因斯坦和跟他联名发表论文的两名同事的名字缩写。这实验令玻尔和支持对量子物理学作正统诠释的人相当苦恼。

1935年时代的技术不足以让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变成真正的实验，结果这个有时被称为“EPR佯谬”的争论沉寂了整整三十年。

1964年一位爱尔兰物理学家贝尔（John Bell）证明了一个简单但聪明的小定理，令物理学界重新关注EPR实验。贝尔最聪明的地方是他不理睬EPR实验的物理过程和法则而只聚焦其逻辑结构。他找出并界定了经典物理学和

我们日常思考中的物质的两个基本特性。他将这两个特性称为“实在论”（realism）和“定域性”（locality）。

“实在论”的意思是：我们看一个对象时会看到什么，要看内在于这对象的东西。譬如，我们看见一个红色的物体，它是红色的是因为它的一些固有属性跟一个蓝色物体的属性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为“实在论”下这样的定义：无论观察者如何曲解这世界，在他身外始终存在一个带着客观质素的客观世界。

“定域性”的意思是：所有东西在空间中存在（对笛卡尔来说，这概念对物质的定义是如此重要以至他将物质称为res extensa）。我们可以想象东西只占有部分空间，并且只能通过借空间传送的某种行为——物理学家称之为“信号”——跟其他东西互动。

贝尔将实在论和定域性的假设应用于EPR实验，得出的结果跟量子物理学预言的并不一致。换句话说，量子物理学的理论明显地不符合定域性和实在论的原则。相反，我们平常有关物质、物体和东西的概念则很明显符合这些原则。

因此，贝尔定理提供了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比较量子物理学和符合定域实在论的一般有关物质的理论。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世界是否实在的（realistic）和定域的（local）”这个深刻的哲学问题，竟然可以通过实验测知！

科学实验人员于是努力让实验成真。他们在1970年代不断重复进行EPR实验，终于在1980年由艾伦·爱斯派克特（Alain Aspect）在巴黎进行了最令人信服的实验。实验结果支持量子理论的预言，否定了定域性和实在论是物质的必然条件。爱因斯坦曾经认为

这想法是如此荒谬，明显地足以令量子物理学失去可信性，但爱斯派克特的实验结果却证明事物正如量子物理学所想！现在我们知道不能以定域和实在论的语言来描述自然。我们有关物质的天真的想法（当然是定域和实在的）不适用于显微镜下的世界。如果我们将定域性和实在论作为“物”的定义，那么爱斯派克特的实验的含意就是世界并非由“物”构成。

痕迹和实相（reality）

第二个问题很自然出现：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世界看似是由物体构成？为什么物体看来具有某些固有属性，占有特定空间，各方面的表现都跟我们的常识和经典物理学表述的物体一样，而只有在我们进行量子物理学的狡猾实验时除外？这就提出了一个技术上被称为“量子测量难题”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至今仍未完全明白的难题，而就如何解答这难题则意见纷纭。我以下所讲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个人的意见，并且反映了我基于自身的工作的成见。

物理学家们现在已承认量子纠缠的现象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事实深刻地挑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惯常想法。有人甚至尝试借助这理论制造新型的计算机，但一旦谈到量子测量难题，物理学家之间便会争论不休。

我认为这难题源于哲学。出现这难题是因为我们现代的科学文化受着笛卡尔的想法影响，即我们假设世界存在心灵和物质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量子物理学指出这两样东西事实上是不可分的。心灵和物质是在经验过程中同时生起的。

我们整个现代文化都假设存在一个客观世界，一个由外在于主体经验的物质构成的世界。爱因斯坦挑衅地提出

以下问题时，就指出了这个“明显”的前提：“没有人在看月亮时，月亮是否存在？”这问题看来似乎充满矛盾，但我们必须认真地解答它。我的意思不是没有人在看月亮时，月亮就不在，但我们也许应反省一下何谓“存在”。

当没有人在经验月亮或任何其他东西时，我们是否有任何有关它们的经验呢？答案很明显是没有。但我们确有下面的这种经验，譬如，我们看月亮时偶然会闭上眼睛。当我们再次睁开眼睛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月亮还在那里，位置跟我们闭上眼睛前它所在的位置差不多。而这就是我们讲的有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观世界的意义：不论是在个人还是在集体共享的经验里，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有一些可靠的式样（patterns）。

这些式样是如此可靠地重复出现以至我们相信有一个客观世界，一个由大小大小，占有特定空间和具固有属性的物体所构成的世界。但是，这只是在以我们的大小尺度谈我们日常经验时才是如此。

当我们谈的是非常专门的经验，如显微镜下的物质的性质时，情况就非如此。我们会被迫放弃前述的想法。在这里，我们的经验的式样有不同的再现方式（representation）。在这种再现方式下，客观世界跟经验这世界的主体一同生起。换句话说，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经验的首要前提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经验自身。

在这意义下，世界是由经验过程构成。经验过程本身是有式样的（就像我们再睁开眼睛时，月亮会在我们预期的地方再次出现一样），而在多数情况

下这些式样会简单地呈现为外在的客观世界。“多数情况下”的意思不是实相（reality）的究竟性质就是如此，相反它只是一张很方便的地图，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的实际需要。但量子物理学提醒我们必须对这张地图的最终基础存疑，并指出那只是我们在自身的大小尺度下所看到的世界。

我们的经验有普遍的式样。这反映一个事实，那就是经验主体拥有身体。我们是在世界内部经验世界。我们活在我们经验的世界内。更具体地说，我们活在一个身体里，必须通过身体经验世界。通过一个身体经验世界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每个经验都涉及这个存在于世界的具体物体——我的身体——的转变，每个经验都会在我的身体留下痕迹；事实上是很多痕迹，但有一个痕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脑袋里的一些神经元的启动。

这事实很有趣，因为它显示关于经验的讯息具有一定的持久性。这讯息通过物理的过程给记录下来，留下痕迹。换句话说，被经验的东西的性质看似客观存在，就像是一个客观世界一部分一样²，结果我们无法看到更深层的再现方式——即世界跟经验它的主体一同生起，因为经验过程的性质被遮掩了，尤其是我们有一个身体这事实，而这事实暗示所有经验都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由于我们有身体，对我们来说，世界无可避免地看来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对一个拥有身体的主体来说，世界无可避免地看来如此。

我们可以将经验看成是一个“主体性的原子”。由于讯息的记录无可避免地通过形成痕迹而伴随经验，我

2. Shantena A. Sabbadini, Persistence of Information in the Quantum Measurement Problem, Physics Essays, March 2006, Vol. 19 No. 1, pp. 135-150.



们也可以将经验看成是“客体性的原子”。观看的主体和被观看的客体在经验中一同生起。在这二者共同冒起前只有缠结的整体：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通过经验这个行为，一个“经验世界的”主体生起，而“被经验的世界”则作为客体生起。这两者同时生起：心灵和物质具有相同的界限和范围，是一个铜币的两面。

因此，虽然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世界并非由物体构成，对我们来说，经验中的世界仍必然看来是由物体构成的。至于世界自身（world-in-itself）当然是不可说的了。量子物理学只是一个模型，一个地图。但这个模型指出的关于“我们经验以外的世界”的事情很有趣。它暗示我们在思考“经验以外的世界”时，不能使用应用于“经验世界”的概念。事实上，我们没有可以描述

“经验以外的世界”的语言。如果我们想走近这世界，古代哲人使用的充满隐喻的语言比现代科学的描述客体的语言更能帮助我们靠近它。

老子和道

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哲学的奠基文本，据中国传统的讲法，其出现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六世纪，而现代研究则将《道德经》上溯至公元前四世纪。我们可以这样看《道德经》第一章：在这一章，老子精简而透彻地陈述了主体和客体如何从他称为“道”的原初整全世界中一同生起。他将看来是互相孤立和客观存在的纷陈事物的生起称为“名”：“名”是“万物”之母。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理解这个“名”的过程。在较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论述的心将混沌的和不停变化的

经验分类、推理和分析。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将它看成是对经验的规律的陈述：经验过程中主体/客体无可避免地分裂。由于要留下痕迹，所有经验可以说都得背叛自己，制造以下的表象——客观世界和一个“从外面”注视它的主体。至于实相（reality）的最终基础——“道”、无名——则始终在那里，始终不能言说。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以主体和客体或心灵和物质的概念来理解实相。让我们听听老子自己怎样说。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³

这两句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所有论说都是暂时性的，所有再现（representation）只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被称为正确，所有指导规范都是相对的。我们有关实相的描述只是一张地图，而地图不是那地方本身。我们绘制的地图永远都不可能等同“那地方”——实相是始终不能言说的。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道。可以命名的就非历久不衰的名。“名”在这里指所有被再现的事物，包含我们为描述实相所作的各种努力的全部面向。老子说，名或再现的事物全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它们只在某个思想世界的脉络下才有意义。因为要达到特定目标它们才有效，因此它们是从属于目标的。

但在较深层次，这两句可以被理解为经验过程本身，或者是身处世界的主体的一般“认知规律”。一旦经验发生，主体和客体就会生起。一旦意识划分自我和非自我、我和他、我和世界，

就有“名”，即是“物”生出。宇宙是物体的宇宙，因为那是一个“具名”的宇宙。意识未出现前没有物体：物体是在命名的行为中出现的。现代科学的“起源神话”将物体看成是原初的，而意识是后来的，而且可能是意外加进来的东西。这个神话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发生了大爆炸，然后物质进化，重元素形成，然后，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机分子出现。之后，也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生命出现，然后在生命进化的某一点，也许是因为神经系统已充分发展，我们称为意识的东西醒来并开始四处张望。这是有关我们的故事的当代标准版本。意识是迟来的，无意中跑了进来的客人。至于古代文化，看见的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在他们眼里，所有东西都有意识。从这个角度看，物质和意识并非两样分开的东西，而是一个铜币的两面。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客观世界和意识在经验的行为中一同生起。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名”：“名”是作为不可分和不能名的整全性存在或unus mundus（一元世界）呈现为主体和客体的过程。它通过分裂为心灵和物质以及意识和世界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个过程在《奥义书》里给描写成一个创世故事。创造主梵天对自己的永恒完美、统一和孤独感到厌闷，于是分裂为无数东西，又为了跟自己玩捉迷藏而变成母牛和公牛。梵天就这样创造了世界。

我们当然不应将主体和客体共同

3. 英译见Augusto Shantena Sabbadini, 2013, Tao Te Ching: a guid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ndational book of Taoism, Published by Augusto Sabbadini.

生起的过程理解为某个时刻发生的创世行为，以为从那一刻开始就真的有两样不同的东西——心灵和物质。相反，我们应将这过程看成是一个不停的创造行为，是每颗“经验原子”的行动，而这行动不会创造任何“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意识和物质虽然是两极却始终不可分：世界只能是意识所经验的世界，而意识只能是正在经验世界的意识。

因此，实相最终并非由分离的、个别的物体构成。虽然如此，我们活在一个具有物体和个体存在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具名”的世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因为一旦意识以主体出现，

“自身以外的”世界就以意识的对象/客体出现。“无名”是不能分化的原初的整体——*unus mundus*或“道”。

“名”是从不可分中生起主体和客体及意识和世界的行为，並由此呈现为“万物”。“名”这行动是万物之“母”。我们作为“我”——体验着自身独立存在的“我”——的旅程从她体内开始并最终在她的体内结束。

“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the Word”）⁴。这句就是这个意

思，因此在非洲的各个宗教观念里，“话语”（word）就是创造的力量。在名的宇宙以外只有无名的“道”（Dao），是话语力量不能触及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一旦万物生起，一旦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并认同一个身体，吸引和排斥也自然出现。变形虫出现时已是这样：它寻找食物和避开有毒的刺激物。进化过程的长链正因为我们拥有一样的态度而拣选了我们，否则我们不会存在。欲望（在正面和负面的意义上说，即吸引和排斥）是个体存在的法则。

佛陀以最简明而灵巧的方式谈欲望的问题。欲望就像影子一样紧随着自我：我们会被我们感到的自我的扩大、生存和愉悦所吸引，并且逃避我们感到的自我的萎缩、死亡和痛苦。但是，自我不是固有的存在：自我是一个错觉、一个幻觉，而这错觉是无常的。因此，所有欲望最终会落空：我们始终会老，会萎缩，会死亡。欲望是痛苦的根源。



4. 译注：这是基督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句。英文的word是话语的意思，1919年译成中文并为华人基督教会广泛沿用至今的《圣经和合本》将Word译成“道”，有研究分析，这是参考了老子的《道德经》。

佛教“无我”（anatta）的观念很符合当代物理学描述的世界的样子。当代物理学以无限延伸场（infinitely extended fields）来描述所有物质/能量。作为占有特定空间的物体的个别粒子并不存在：它们只是场（fields）通过占有特定空间显现的一种方式。譬如，一粒在地球的电子和另一粒在远方的银河系的电子并非两个截然可分的物体：它们是包含整个宇宙的同一个场的显现方式，为此它们之间是不可分的。在这角度下，我们的身体也非独立和具有实相的东西，相反我们的身体是类似“干预图样”（interference pattern）的东西，由延伸整个宇宙的一定数目的场叠加而暂时形成。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解释。我们的身体就像海中翻滚的波浪。一个波浪不是独立向前行进的某个体积的水，而只是海洋的水活动时形成的一个图样。这图样大体上会不受骚扰地持续一会，然后溶进其他冒起的图样里。我们可以说，波浪的究竟实相只是海。因此，如果我们想象波浪有自我意识并基于习性而追求作为独立实体地生存下去，那它的欲望无可避免地会落空。这是我们作为人类和有自我意识的众生的困境：我们不存在但我们依恋我们的存在。死亡令欲望最终落空。

因此佛陀的四圣谛是一个简单的宣言：存在（existence，ex sistere，站在外面，作为从整体分离出来的个体）就是痛苦。这是佛陀的路——超越痛苦之路——的起点。佛陀的路本质上跟老子没有分别，基本上也跟东方所有灵性传统没有分别。醒觉自我作为幻象的本质：“你”不存在。醒觉你不是波浪而

是海洋。一旦这醒觉成为你活生生的经验，你便剪断了你和欲望间的联系。你便自由了：你超越了痛苦。

因此，我们有两种方式在世界生存。在摆脱欲望，终止对自我的认同后，沉思这个奇妙、巨大和无法言说的存在的奥秘；沉溺欲望的同时，尝尽人类万般情感：爱、恨、快乐、忧愁……通过相或佛教徒说的samsara（轮回）历尽旅途的各个彩虹阶段。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跟大乘佛教一样，老子的路不是苦行和谢绝尘世的路。老子不是要人抛弃尘世，找寻一个神秘的他处（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呢？）。这奥秘和其示现（manifestations），无尽和界限是同一实相的两面。涅槃（nirvana，解放，熄灭对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的认同）和轮回同一；海洋和波浪都是水。

因此老子不说：“不要将自己看成是波浪，应认同海洋，因为那才是你的本质。”他想说的更加妙微。他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他要我们对二者同时保持觉醒：没有自我但作为自我地存在；波浪是海洋，但它不断地跳着波浪的舞蹈。老子说：活在可见的真实世界，物体的世界，不单要经验无穷的奥秘，也要经验有限世界中无边迷人和令人战栗的所有事物。跟形相和欲望待在一起，但要不断觉知无形和欲望以外的状态。活在世界里，但不要从属世界。■

在“人的普遍智识” 启迪下的思考

文 | 朱 明

编者按

翻看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的生平，在他21岁至36岁的15年间，编辑研究了大量的歌德著作。在他40岁的时候，正式创建人智学。按照人智学的理解，这分别指向了心魂成长和灵性成长的生命阶段。如同歌德观察之下的植物进化，亦如同古埃及人与古希腊人之思考状态，对于本文，各位读者不需要相信，请去感受和思考。

四年前的时候，我还在社区伙伴，为《比邻泥土香》杂志工作。那时候，团队和我想出一期“从灵性角度认识自然与人”这样的内容。为此，后续我们积累准备了挺长一段时间，但手里的素材，距离我心里想象的深度差距太远。最后，意识到自己学识不够、机缘也未到，就暂时放下了。但我的心，一直都

被这样一个角度，被“蒙在面纱后面的大自然”透出的，那太阳彩虹般温暖的光，深深吸引着，总觉得要潜下来，在这个方向上探索点什么。就这样，一个人模模糊糊磕磕绊绊地走到现在。

这里，我想说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¹发展出来的，被Steiner（Rudolf Stenier）博士²深化了的

1.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自然科学家、博物学家、画家，是德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歌德的作品在诗歌、戏剧、散文、自然科学、博物学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浮士德》、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中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自然观察方法。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认知的开启。知道Steiner博士的研究大约有十年了，直到现在，我才刚刚摸到了门口，看到了深入下去的路径。这不是知识，是关于生命本质的认知。

歌德对自然的本质的认识，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也超越了我们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Steiner博士能理解歌德的观点，解读歌德在植物、矿物的研究成果以及对色彩和光的认识，是因为他在超感官的观察中，看到在人内在真实存在的灵性部分，和在自然中活跃的灵性力量。他发现，歌德作为一个伟大的自然观察家，也清晰地看到了这些并在相关文稿中表述了这一点。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在“灵性”这个关键词上，被揭示了出来。

谈到灵性的存在，活跃在人内在的灵性，一个关键词是Steiner博士“关于人的智识”的研究。从德语直接翻译过来，也被译为“人哲学”（德文为

“Anthroposophie，为避免歧义，下文就直接用德文Anthroposophie，另奥地利哲学家Rudolf Steiner的名字，文中也直接用德文表示）。

在我的感受里，“Anthroposophie中所蕴含的，好像在夜晚，那蓝黑色天宇下的星空一样广阔深邃”。这个图景，让我想起去年冬至的傍晚，我沿着鸡足山的山路，走去放光寺。半路上天已经黑了，远远看见山谷中的镇子里KTV厅的灯光，听到里面的男人，在酒后嘶吼一样的歌声，与山上的静寂形成了鲜明的两极。脚下的路沿着山势，伸向黑黑的天际。走过一个个的寺庙，寺里静静的，清亮的禅唱和烟火香味，随着暗黄色的灯光透出来，散在四周，让人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我忽然感到，人们崇敬那些在历史长河里，在这广阔大地上，掀起万丈波澜的英雄。但在人的生死路上，也有许多人，用自己的一生，去探索生命的灵性本质。他们的存

2. 鲁道夫·施泰纳（1861-1925，又译石太纳、斯坦纳、史代纳），奥地利哲学家、教育家。在歌德科学著作的影响下，他自童年时期产生的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的兴趣与强大的精神体验得以逐渐融合。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他广泛在欧洲各地为教育工作者，农民，医生，艺术家进行演讲，共同寻找一条不再割裂科学与宗教、信仰和理性、精神和物质的道路。其创办的Anthroposophie（人智学，亦有译为人哲学）定义为灵性科学，并由此发展出教育学（华德福教育）、艺术（优律司美〔亦译作音语舞、元舞〕），人智学建筑、医学（人智学医学）和农业（活力农耕，亦译为生物动力农耕）。

在，就像错落分布在山路两旁寺院里的灯光，温暖了许多人的生命旅途。

我从2003年开始接触Anthroposophie。最近参加了两次工作坊的学习，一次是从翻译的角度上，学习Anthroposophie的基础理论框架，也触碰了中医、道家文化和形意拳站桩；另外一次是“歌德观察工作坊”。单就这两次学习，也有很多值得深入的地方。忆念过去一起同行的伙伴，我想在这里做些探讨，以期遇见“同好”，或许可以开启“共同的研究，并在生活里使用这样的研究”的过程。

我不是学者，这里做不了学术介绍，只谈自己的关注和在Anthroposophie启发下的体悟。说得不对的地方，错在我，与Anthroposophie本身没有直接关系。Anthroposophie启发了华德福教育、活力农耕、人智医学、歌德自然研究、三元结构下的社会发展等很多领域的发展，有许许多多认真严肃的师长，做深入的工作，大家可以结合自己兴趣去请益。

我们经常提到“物质主义”这个词，在看《作为教育学基础的人的普遍智识》³这本书的时候读到，Steiner博士在第一次华德福教师培训的开场致辞中，第一段话是：“华德福学校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文化行动，目的是要革新我们今日的灵性生活。我们应考虑到所有事物内在的转变；整个社会运动最终必将回归灵性（社会运动最终将投向灵性），而学校教育问题是当今激烈而重大的灵性问题中的一个分支。”对这句话，我心里特别感动，他说出了我隐隐认识到的事情。他鲜明地提出华德福教

育，甚至是整个社会运动的最终方向，是回归对灵性的认识，革新我们今日的灵性生活。这句话，也是我走到现在的生命旅程的一个缩影。

人被困在物质主义的困境里，能做的只是发展更强的运用物质的能力，和对这种方式的依赖。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发展出这么强的运用物质构建我们生活基础的能力。我们从“活在自然中”这样的状态里摆脱出来，自然只是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欢庆“人类穿越了自然的丛林”，但对于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的灵性本质，这样一个环境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

Steiner博士对此有着极深刻的认识，他从两个角度着手，“我们通过认识人的内在去认识外界，我们通过正确地认识外界来认识人的内在。”在超感官的观察中，Steiner博士看见了人本质中含着九元，而最内在、精细的部分，是人的灵性。对现在大多数人来说，灵性部分还处在初生、萌芽、无意识的状态中。但灵性对人本质中的其他部分有着深深的影响：“当你意识到，人本质中其他部分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灵性，在人的个体内在出生，不再是在圆满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寂静的像，那我们对人的内在发展，就有了一个活的，动态成长的，整体的认识。”对于有超感官观察能力的人来说：灵性的存在，和物质身体的存在一样真实。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活在人内在的灵性，好像烛光一样，照亮我们的心魂，让我们觉得温暖，充满爱意。

谈到人的九元本质，谈到人的内

3. 1919年，Steiner博士籍创办于斯图加特乌兰德高地（Uhlandshöhe）的自由华德福学校之机，亲自为特定的具有各自的特殊背景的人群进行了系列讲座，讲座内容整理为《Allgemeine Menschenkunde als Grundlage der Pädagogik》一书（鲁道夫·施泰纳出版社，全集第293册），德文版由鲁道夫·施泰纳华文编辑小组翻译，2014年通过台湾财团法人人智学教育基金会发行。

在成长，有一个重要的，贯穿在这个发展过程里的力量，祂在宇宙的本身，也在人里面，Steiner博士在德语里称之为Wille。在人哲学⁴词汇表里，描述说“Wille是一种永远新鲜的冲动，脱胎于极性的互动，节奏性的，它是纯粹的‘愿力’和‘元动力’，是我们意识不到的，亦不会带有任何思想和感情上的力量。祂处于我们的潜意识，也是宇宙本身持续的动力。”

我直接在这里讲述了两个看不见，但可能与我们的生命经验有些连接的东西，有点突兀。所以，在这里要澄清一点，Steiner博士讲的，是希望能帮助你在生活里发展出自己对人本质的认识，而不是迷信他讲的，或者不经过体认直接相信他说的。我在理解Wille这个词内涵的时候，也碰到了实际困难。后来发现，Steiner博士在演讲里描述九元生命本质时，谈及Wille与这些生命本质结合时，表现为本能、冲动、欲望、动机、愿望、决心、决定等，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一个词、一个词地去体会祂们的内涵，你会感受到一些祂们的共同特点，比如那种强烈的“动势”。若你试着只是用感觉去排列这些词，你也会感觉到祂们有一个内在的秩序。这样的观察，能帮助我们去感觉Wille，认识到Wille在人的内在发展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我们看不见祂，但透过祂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或许我们心里面会比较能认识到“这只看不见的手”。

这里拉出来两根线，如果你想了解Steiner博士在Anthroposophie中对人本质的研究，从这两条线深入进去，会比

较容易。Steiner博士在Anthroposophie的讲述中，基于他对人内在的超感官观察，创造了挺多的词，去描述人的内在世界，帮助人们可以去基于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人的内在世界的结构。他试着用清晰的逻辑和概念去帮助人们可以想象和进入人的内在。他试着在人的头脑里，用这些概念组成的结构，好像水晶一样，把灵性世界的光，折射到地球的生活中来，当一个人的内在之眼睁开的时候，可以看见那光。

但人在读他的书或演讲的时候仍会觉得困难，因为这些抽象概念试着表达那些人不能直接看见的真实存在。而理解每个概念，都需要真实的体验做基础。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好像今天一样，人们的注意力极大地被“外界的表面”抓住，对人的内在，很大程度上的无意识和没有体验。

我是个中国人，擅长使用左手，自己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思维是直觉、图像化的。有时候也在想，为何Steiner博士的做法，是建立了一个一个的台阶（概念），思考的台阶，去帮助人们思考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体验，而认识灵性？他这样做的根据在哪里？要回答这一点，要问“在这个时代里，人内在的本质特点是怎样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时代，“人的内在本质”的特点

我们对灵性这个词并不陌生，而Steiner博士称自己的研究为“灵性科学”。应该说“科学”是这个时代的特点，通过科学研究，我们好像魔法师一

4. 在汉语地区，对于Anthroposophie的翻译有不同的理解和声音。香港的文环女士是文艺大师恭亲王孙溥心畲先生的入门弟子。她在美国纽约Adelphi大学攻读博文科，后随英国艾默森学院创始人Frances Edmunds学习。她认为Anthroposophie应该翻译为“人哲学”，Rudolf Steiner应该翻译为“儒道夫·石太纳”。作者提到的词汇表是香港沃道夫教育基金会自1997年至2015年建立的700多个词汇清单。

样，获得了强大的运用物质的能力，人类现在的生活受益于此。在科学研究的过程里，人们看见了两个宝贝：一个是“客观”，让人有能力认识物质世界；另一个是“人的主动创造”里，所蕴含的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简单说，就是人通过“客观”和“创造的过程”，获得了“认识物质世界，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上，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特殊的一点是，人的“认识物质世界”和“改造物质世界”这两个部分，在人的内在被连接起来，发挥出巨大的力量。换句话说，在过去的时代，人的意识是“神创造了世界，我们人活在神创造的世界里”。但现在，人的意识是“我们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在人的意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一个意识上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我们回到人自身去看，这两个宝贝，可以理解为“一个是认知，一个是行动”。透过这两个角度，我们与

物质的世界联系起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景想象为“我们的内在世界，通过这两个窗口，与物质的外界联系起来”。那我们里面的世界有什么？是我们的心魂。

在我们心魂里的意识和思考，经历了一个发展、锤炼的过程。在歌德观察工作坊上，亚历山大（Alexander Shaumann）老师从一个西方人的研究角度描述了这个过程，他提及三个代表性时期——“古埃及、古希腊和十五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你在那些时代人的身上，可以比较清晰地看见那个脉络。

在古埃及时候，人们的意识和思考状态是“不会提问，但能感受到一些教导的神圣感并去遵从祂”。亚历山大老师在课上，给我们阅读了在德国出版的一本书的内容，是从埃及的象形文字的记录中翻译过来的。其中有一个老师给学生的教导里说：

完美的语言比宝石珍贵

如果你仔细聆听磨麦子的仆人的话

你就能达到那完美的语言

与简单的人交流，向他们学习

遇见更有智慧的人，要尊重他们

不要为你自己的知识感到自豪

不要认为你自己是有智慧的

.....

我们能感觉到这些话语里的智慧，那时候的人很自然地能从这样的话语里感觉到一种神圣感，并从对这种神圣感的遵从里获得满足。古埃及的医生有高超的医术，这样的医术也是在对典籍的背诵以及遵从老师的教导中传承的。若是不会在典籍里发生的情况，他们就完全不知道怎样处理了。在古埃及的人物雕像里，他们脸上的神情永远是严肃的，眼神望着远方。他们的眼睛关注的不是物质世界，而是神谕、天启。他们遵从与神有沟通的法老、祭司的话，并在这样的遵从的生活里得到安全感。

灵性刚刚进入他们的心魂，在心魂里诞生，他们对灵性有了初步的感知，但也意识到还有更大的灵性部分还在外面。当更富有智慧的人给他规则的时候，他觉得幸运，他感觉到与真理的连接。他们的生活，在遵从里面与灵性合一。人们为法老，或者说为神建立了金字塔。那种形状里，你强烈地感觉到了规则。

Steiner博士在对人的超感官的观察里，看见了心魂这部分的存在，他叫祂“感性魂”（Empfindungsseele），是心魂在我们人的内在诞生的开始，人们还不太知道怎么使用祂，更多的是感受到祂的灵性本质，祂带给人内在的温暖和喜悦。古埃及人还创造了天文历法，在人们内在感觉到与周围的合一感和整体感，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旅程。而在此前的文明，人们簇拥着部落的首领，领袖只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获得灵感，告诉周围的人应对的办法。比较两者，你会感觉到，在古埃及的时候，人与灵性结合得更紧密，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强，但人还是活在对灵性的神圣感的巨大敬畏里。

但古希腊的人不同，他们对灵性更熟悉，他们运用灵性进入人内在的状

态，睁开了好奇的观察这个物质世界的眼睛。亚历山大老师讲了一个事情：一个希腊人去埃及生活，有一年尼罗河的河水涨起来，这个年轻人就去问埃及的那些有智慧的年长的祭司，为何今年尼罗河的水涨得特别高，结果他发现没有祭司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他们只是遵循被教导的。

古希腊人会在心里问问题，尽管有时候给出的答案很搞笑，但他们还是为此很骄傲，洋洋得意。为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经常跑到街上，钻进人群里听他们的谈论，问他们一些问题，让他们自己发现逻辑上的错误。当时，很多人心里都暗暗地恨他。我一直觉得逻辑学是很枯燥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我理解了逻辑学出现的意义。在古希腊，灵性更深入地进入人的内在，希腊人能够运用灵性在人内在发展出来的结构，更深入地进入这个物质世界，提出问题，寻找符合逻辑的答案，或者说符合客观的答案。但也因为这样深入的结合，在古希腊人的感受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倾向，这样的感知、思考世界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比较是被封闭在人内在的一部分，人们不断在内在去练习如何使用祂，而失去了对这样一个能力的灵性本质的认知。Steiner博士结合自己的超感官观察，称这个新发展出来的心魂特质为“心智魂”（Verstandesseele）。

这样的情况，在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等一批“天才”。看达芬奇的素描和他的书，你能感觉到他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去到了一个极细致清晰的程度，去到了一个可以深入地去使用物质世界的程度。有人把文艺复兴运动称为现代化的启蒙运动，科学研究、客观、创造，这些在人们的意

识中扎下根来。人们对灵性所赋予的这样一个认识物质世界的工具的使用，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深入，人们可以结合物质世界创造出很多奇思妙想的东西，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里。但因为认识不到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工具背后的灵性本质，人也陷入一种痛苦里，失去了与灵性合一的感觉，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感和方向感，“成了一艘在无际的大海中漂浮的船”。

在这里，我有一个直觉，“父性特质”地球的灵性存在，参与到“活跃在我们内在的灵性，所推动的人的心魂发展”过程中来，赋予我们这些“人子”认识物质世界的能力。而这是为了透过我们生活过程，与自然母亲，在一个更丰富的灵性层面上合一，让地球发展成为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灵性存在。那些，“地球作为一个活的整体”在死去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灵性，一直在寻求这样的机会。（注：这段话不是Steiner博士或亚历山大老师讲的，是我在内在聆听里获得的感受，仅作参考。）

现在，我们处在第三种心魂特质为主体的新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里醒来”的意识状态下，带着崇敬、专注和爱，凝视这个物质世界，再次体验形成这个物质世界的神圣本质，并把这样的感受带进我们的心魂里。通过这样的做法及其所建立的桥梁，我们的灵性本质与在自然中活跃的灵性力量又再一次地连接起来。我们再一次进入了自然的本

质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见”了“构建我们心魂的灵性本质”和“在自然中活跃的灵性力量”，在这样一个进入表象后面的本质认识的过程里，人与自然又合一了，“我们又回家了”。这样的回家，人已经不是小孩子的状态，而是成熟的、带着清醒意识和爱的、有行动力的成人的状态。Steiner博士称这样的心魂特质为“意识魂”（Bewusstseinsseele）。这是被Steiner博士深化清晰了的歌德自然观察方法在人内在的基础。

这个时代，我们成人的心魂里，这三个心魂特质都存在。有些部分已经表现得很成熟，有些部分还在萌芽状态，不同的人情况也不同。在不同的时代情况也不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看到人的心魂特质。心魂是“灵性在人内在诞生”的基础，也在这样对人内在本质认识的图景里，我们才会比较能理解“歌德观察自然的做法”的基础。

歌德自然观察

歌德对岩石、植物、动物、色彩、光都有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他发现了植物的“形变”规律。在歌德写的《植物变形记》⁵前言中，对此有很好的概况性描述。他对植物的认识过程有两个重要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意识到植物的“叶子”，是一个“完整体”，或者是植物的一个“原形”。他在《意大利游记》⁶中写到：“我忽然灵光一现想到，植物中被人们称为‘叶’的器官竟

5. 《植物变形记》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写的一篇关于花叶变形的理论。歌德对植物学情有独钟，他认为动物和植物都存在一种“原形态”。动物的原形是脊椎骨，而植物的原形是叶子，动植物都是从各自的“原形”经过漫长的演变进化而来，这几乎就是进化论的观点。1790年歌德在《植物变形记》这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创造了“形态学”（morphology）一词，意为“对生物结构的系统研究”。该词一直沿用到现在。

6. 歌德于1786年9月至1788年5月在意大利学习、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1813年歌德开始根据这段经历写作《意大利游记》，直到1829年完成。

潜藏着真正的普罗透斯⁷，他能够透过植物的形式隐藏自身，有时也显示自身。一株植物自始至终都不过是一片叶而已。叶与即将生成的植物细胞一样重要，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认识到植物有“原形”，你可以通过研究植物的“叶子”，发现“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器官，它逐步从叶子变形为茎生叶、萼片、花瓣、雄蕊、雌蕊等等，这个过程说明了植物的形变规律。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超感官的植物原型”——自然界的事物不仅表现在外在层面，还有理想层面或者说是原型层面。为了认识“超感官的植物原型”，我们要同时使用“身体之眼”和“心灵之眼”，感官认知和直觉认知，或者说我们不仅从外在观察活的植物，也在活的植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在观察很多不同的植物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植物的内在生命规律。在比较矿物、植物、动物之间，我们不仅认识到在活的植物身上的生命法则，我们还能认识到“自然律”，在自然中活着的法则。

比如植物是完全对周围环境，对宇宙敞开的，或是说，是在一起的。与动物不同，植物没有“内与外”，只有极厚实强壮的生命力，去适应环境、生长、繁殖。宇宙或环境的力量，与植物的生命力之间发挥作用，最后展现在植物的形态上。歌德发现了在植物内在的“上升力量”和“极性力量”。上升力量是一种“永远向上发展的力量”，它不断地趋向于更复杂，更完美。他认为从叶、花瓣，变形为专门的生殖器官这样的一种不断推进的形变过程，是因为植物各器官内含的营养液在不断提纯。

这种向上的力量的本质好像是“植物的炼金术”，在不同角度的宇宙力量影响下的，在生命内在发生的纯化过程。比如矿物的纯化过程是结晶化，植物的纯化过程比矿物复杂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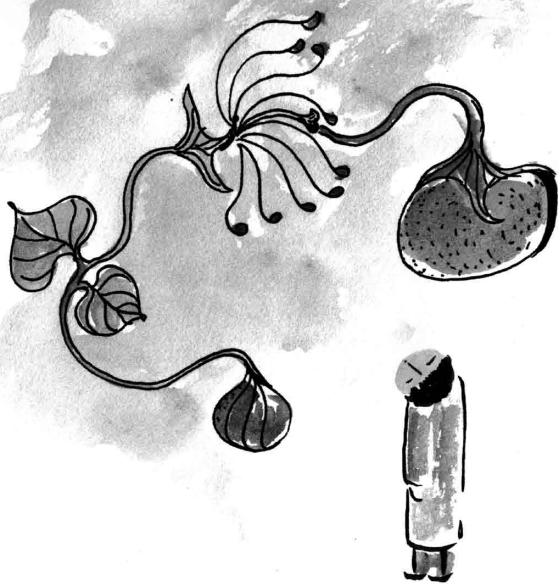
另一个是“极性力量”，它是指“一种不断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两股“同源”的“对立”力量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极富创造力。极性力量在植物的形变领域表现为收缩和扩展两种状态交替出现。歌德概括了在植物中极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六个阶段：种子变形为茎生叶，茎生叶收缩成花萼的萼片，萼片又变形为雄蕊和雌蕊，然后雄蕊和雌蕊又发育出果实，最后种子又出现了。植物跟随着大自然这个心脏有节律地扩张和收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这两种基本力量，你在动物、人的发展过程中也能观察到，不过在形态上更加复杂。当你在植物、动物、人的身上发现了同样的自然律，这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我们与这个世界本为“一”。这样，我们会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对生命的认识。当我们的视线从对自然界的观察收回到人本身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人们对物质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对活的生命的研究阶段。

这是一个西方发展的视角，这样的一个视角在Anthroposophie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同时打开身体之眼和心灵之眼，是Steiner博士描述的意识魂的特质在发挥的作用，帮助我们在清晰地看见这个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灵性本质。歌德观察基本的做法是面对一个事物，认真观察，使用

7. 普罗透斯（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早期海神，荷马所称的“海洋老人”之一。他的名字可能有“最初”的含义，因为希腊文“protogonos”表示“最早出世的”。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他经常变化外形使人无法捉到他：他只向逮到他的人预言未来。

植物眼随着大自然这个心脏
有节奏的扩张和收缩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各种手段，尽量详尽地描述这个事物的各个不同状态，这是纵向深入的角度。然后尽量广阔地看到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然后静下来，“聆听这个事物在你内心的讲述”，不是头脑的主观思考和想象。

在这样一个新的角度里，我们不仅看见事物的物质层面，也在认识事物生命的内在本质。这是一个新的人类文化，在这种新文化，帮助人们在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发展基础上，诞生新的人类生活。回到一个东方人的角度，在最近参加的两次工作坊中，主办者也有邀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师傅”，带给我们一些学习和认识。我们的文化里，有极深入的，对生命的认识。而我们的挑战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基础却是在西方发展脉络下得到的。

我们没有经历文艺复兴运动，我们没有经历创造现代物质文明的主要过程，但我们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所创造的生活基础上。我们过去有很深入的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但我们现代人的内在本质与古代中国人的内在本质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再用过去的做法去承继认识我们的传统哲学和文化，就变得很困难。Anthroposophie 是一个桥梁，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客观地认识传统里的生命观、自然观。而被真正认识和发挥的，东方传统里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会帮助到世界的文明发展去向一个新的阶段。文章的篇幅已经很长，这里就不展开了。

引入一个新事物，在开始的阶段总是极困难的。回到开篇想要表达的，我这是抛砖引玉，盼与过去同行的朋友，在一个新的生命里相遇。■



解 · 读

为了死得平静而坦然

文 | 陆晓娅

编者按

在《中国青年报》退休后，陆老师先是创办了公益机构“北京歌路营”，2012年快60岁的时候，照顾患有老年失智症的妈妈之余，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通识教育课“影像中的生死学”。陆老师自定位为一名播种困惑的老师，而不是传统认知上的传道受业解惑者，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跟学生们一起来探索。陆老师在博客中写到：“在这个年龄，我仍然拥有课堂，拥有和年轻人一起探索的机会，拥有学习的热忱，拥有创造的能力，拥有通过写作表达的习惯，拥有许多新的可能性，我相信自己是幸福的，虽然在某些同龄人眼里我可能是辛苦的。”

“人为什么会对死亡感到恐惧？”这是我在“影像中的生死学”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

学生们一阵头脑风暴后，总会说出六七个原因，比如，对未知的恐惧：死是怎么回事？死了之后去到哪里？对死亡过程的恐惧：死会不会很痛苦很可怕？对分离的恐惧：要离别亲人独自走向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我会抛出另外一组问题：相比起活到高龄的老年人，年轻人对

死亡更恐惧吗？相比起能活得更长的当代人，平均寿命短得多的古人对死亡更恐惧吗？相比起有宗教信仰的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死亡更恐惧吗？相比起身体健康的人，临终的患者对死亡更恐惧吗？

学生们在小组讨论中很快就发现，这些问题无法给出“YES”或“NO”的答案，因为总能举出反例来。

在扰动了学生的头脑后，我会带他们看一部比我还老的“老片”：日本

著名导演黑泽明拍摄于1951年的黑白片《生之欲》¹。在豆瓣上，它的评分甚至高于黑泽明获奥斯卡奖的《罗生门》²和获金棕榈奖的《影子武士》³。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所有的生死学著作中都提到了这部电影，它生动细腻地展现了一个人在死亡来临时的恐惧，以及战胜死亡恐惧的过程。

片子的主人公渡边堪治，是一个即将退休的公务员。他中年丧妻，为了带大独生的儿子，他没有再娶。他有一项令人惊叹的纪录：30年几乎不曾迟到。每天按时到岗的他，看上去忙碌而敬业，但实际上除了保住自己的“课长”职位，他几乎什么都不做。影片开头，一群主妇前来要求把臭水沟改造成儿童公园，他头都不抬就把她们打发到土木课去了。

日复一日平静而麻木的生活，被病痛突然打破。渡边患了胃癌，只能再活个一年半载。惊恐无助的他，到小酒馆借酒浇愁，邂逅了一位庸俗小说家。小说家带着渡边到赌场、舞厅去“弥补浪费掉了的人生”，渡边却在喧闹中感到更加绝望和孤独。

小田是市民课年轻的职员，因不想在“死水一潭”的办公室里度过一生，来找渡边盖章辞职。她的活力深深吸引了渡边，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缠住小田，希望她告诉自己怎样才能活得像她那样，“哪怕像你一样活一天也好”。

被渡边吓到的小田拿出一只玩具兔子，告诉渡边说，自己不过是做这种东西，“做这种东西就像跟婴儿成为朋友”。

虽然感到一切都“太晚了”，但回到办公室的渡边，开始打起精神来组织同事们去建儿童公园，甚至不惧黑社会的威胁。公园建好了，在一个下雪的夜晚，渡边唱着《生命多短促》，坐在公园的秋千上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因“死亡”而改变了人生的故事，在死亡的威胁下，“行尸走肉”般的渡边，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一座儿童公园。

但死亡真的能带来这样的改变吗？如果死亡能给一些人带来成长，带来正向的改变，它的机理又是什么呢？

医学伦理学家丹尼奥·瑟门斯（Daniel P. Sulmasy）⁴曾经说过，临终的病患大多会在三个方面发问：

首先是关于“意义”的发问：我的疾病有何意义？我所受的苦难有什么意义？我的死亡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是超越于我的死亡的？

其次是关于“价值”的发问：我的价值与我这个人的存在，与我一生的产出与创造，乃至与我这个独立的个体之间，如何产生联结？当这一切都受到威胁而即将不存在了，我这个人还有什么价值？在我死后，有什么价值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

最后还有关于“关系”的发问：

1. 《生之欲》编剧：黑泽明 / 小国英雄 / 桥本忍，由黑泽明执导，志村乔、千秋实、藤原釜足等人主演，于1952年在日本发行。

2. 《罗生门》根据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筱竹丛中》改编而成，由黑泽明执导，芥川龙之介、桥本忍联合编剧，三船敏郎、京町子、森雅之、志村乔等主演，日本大荣电影有限公司与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于1950年联合出品。

3. 《影子武士》编剧：黑泽明 / 井手雅人，由黑泽明执导，仲代达矢、山崎努、萩原健一、根津甚八、大泷秀治等主演，日本东宝映画1980年出品。

4. 丹尼奥·瑟门斯，美国内科医生、伦理学家，研究兴趣包括临终决策伦理、医学伦理教育与医学灵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参与编辑201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Safe Passage: A Global Spiritual Sourcebook for Care at the End of Life》一书。

我与家人、朋友疏离了吗？有谁曾经对不起我？或者我曾经对不起谁？我还是被爱的吗？被谁所爱？爱能超越悲伤所带来的痛苦吗？

正是这些内心深处的发问，让渡边感到了生命的巨大空虚。丧妻之后没有再娶，全心抚养儿子长大，这曾是他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所在。但当他无意中听到儿子惦记拿他的退休金买房时，他生命的意义感崩塌了。而几十年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无法在“意义感”和“价

值感”上给他补偿，几十年的生命仿佛变成了一地鸡毛。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治疗家，他曾经给许多癌症晚期患者进行心理治疗，也陪伴过许多丧亲者。他在《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⁵一书中说：“死亡的焦虑其实伴随着整个人生，它是人生的背景音乐，只是在一些时候，它被别的声音掩盖了，或者变形为其他种种东西，比如沉溺、冒险、献身、抚育后代、艺术创造等等。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用种种方式，与人之必死所带来的恐惧做斗争。这斗争的成功，带来的不是不死，而是死得坦然和平静。而斗争失败的标志，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更加强烈。”

我觉得亚隆更深刻地解释了现代人的死亡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强烈”。

用这个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渡边在死亡降临时的那份恐惧来自何方！不仅是对死亡过程的恐惧，不仅是对死后未知的恐惧，不仅是与亲人分离的恐惧，不仅是“舍不得”“放不下”的恐惧，更是对“不曾真正活过”的恐惧，对生命变成了一地鸡毛的恐惧！

不过，这份恐惧也能催生生命的



5. 欧文·亚隆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心理治疗界公认的大师、《纽约时报》畅销小说家，著有《爱情刽子手》、《当尼采哭泣》等畅销心理小说，以及《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日益亲近》等心理治疗经典。



转化。亚隆引用哲人的话论述了这个观点：“圣·奥古斯丁说：‘唯有面对死亡之时，一个人的自我才真正诞生。’蒙田则认为我们的房间应该要有一扇可以俯视墓地的窗户，它会让一个人头脑保持清醒。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穿越历史的长河以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们：虽然死亡可以从肉体上摧毁我们，但死亡也能从精神上拯救我们。”这种“拯救”，亚隆将其称之为“觉醒体验”。

觉醒体验会帮助人们重新安排生活的重心：放弃无关紧要的琐碎之事，不做违背心意的事情；花时间与至亲至爱更深地交流；更有勇气去冒险，很少担心被拒绝；同时感觉敏锐并充满感恩：比如对变幻的四季、美丽的大自然、节日或新年来临，都会有更深的感受。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也可以很好地解释死亡对生命成长的促进。这个理论认为，人本质上是动机性的动物，期待实现的目标指导着人的行为。而时间知觉是人动机的组

成部分，影响着人对社交目标的选择与追求。随着人的生命历程时间范围的缩短，不同目标的优先性就会发生变化。个体会变得愈加挑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在情绪上有意义的目标和活动。

对于渡边来说，胃癌让他意识到自己活不了太久了，他必须要思考：剩下的时间要怎么过？做什么才能让自己不再恐惧和无助？不再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活过？

他尝试了在感官世界中去“享受人生”，但那并没有让他摆脱恐惧和孤独。他看到了小田的“活力”，觉得那才是希望所在。而一旦决定用有生之年修建儿童公园后，他才真正平静下来，勇敢地接受了死亡。

其实，卡斯滕森自己，就曾在死亡威胁中产生过“觉醒体验”。21岁时，她遭遇车祸，头部受了重伤，腿也断了。那时的她只有高中文凭，已经有了一个宝宝，婚姻面临破裂，没有人相信她日后会成为学者。过了三周的危险期，“当我逐渐恢复，开始能够认识到

我离死神有多近后，我对什么事情重要有了非常不同的看法。”卡斯滕森说。父亲怕她吊着腿躺在病床上无聊，就为她在当地大学注册了一门课程，父亲去听，带录音给她，而第一门课程正是《心理学导论》，从此卡斯滕森开始了她在心理学上的学习与探索。

看完《生之欲》的电影，我会问学生们：难道只有到死神现身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想如何让自己真正地活过吗？就像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人的评价：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能用语言，只能用行动去回答的问题。我还知道，越早思考并用行动回答这个问题，你将越不怕死亡来临。只有真正地活过了，一个人才能死得平静和坦然。■



我们是舞动的山石

文 | 俸云芸¹

“你为何物？我为何物？水、土、气、火纵横交错的循环，那是你，也是我。”

小时候姥姥告诉我，人是泥土做的，我将信将疑，为何是泥土做的呢？姥姥说：“你看你随时都能搓下泥来”，然后姥姥就搓着搓着我的皮肤，我俩都笑了……这大概是很多同龄人小时候共同的经历。我们的文化中也有女娲用泥造人的古老传说，这些故事与姥姥的话语看似毫无依据，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为何物？如果一百三十五亿年前的那次宇宙大爆炸被喻为一切的起点的话，我们都是来自于那里，我们所看到、所触摸的一切都来自同一个点、同一个能量，你、我与构成土地、树木、其他生物的一切都是一个起源，只是呈现的结构不一样而已。

“水——血液、淋巴液、粘液、汗水、泪水、经血以及体内、体外的潮与汐，细胞在体液中上下浮沉，体液不停地在脏器、血管与微血管之间来回穿梭，淘洗与滋养。在你、我体内流动，在你、我身体倾入倾出的水分，是水文循环的大幅诗作，那就是你，那也是我。”

“土——由岩石和土壤所生，岩浆在地心流转，当植物的根吸吮着微粒分子进入生物机制中，土同受月亮的引力而作用。而土通过体内，每七年全面更新体内细胞。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由尘土所造，将土咽下、吸收、排出，那就是你，那也是我。”

“气——气态的世界、大气、覆盖地球的薄膜、吸气、呼气、向树木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树木所释放的

1. 作者系社区伙伴青年发展项目官员。

氧。空气中的氧亲吻每一个苏醒的细胞，原子在规律的代谢系统中移动着舞步，来回贯通。空气循环之舞不断将宇宙吸入，也将宇宙呼出，那就是你，那也是我。”

“火——火从提供热能的太阳而来，太阳拉拔植物长大，将水分子提上天空，再使水落下，使其重新充满地面。大爆炸首次吐出的物质——能量，在时间与空间的轴线中，不断旋转延伸。体内那新陈代谢的熔炉，持续燃烧着宇宙大爆炸的火焰。那火焰也成为闪电，劈开原生汤，催化了有机生命的诞生。”

以上的引文摘自约翰·席德（John Seed）²、乔安娜·梅西（Joanna Macy）³、佩德·福连明（Pat Fleming）⁴、阿恩·奈斯（Arne Naess）⁵的文集《像山一样思考》⁶，一本协作人类重新与大自然连接，把人还原于大自然的一员，重新与我们失去的世界建立感受与对话的实践手册。它的名字源于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⁷的著作《沙乡年鉴》⁸（又名《沙乡的沉思》、《沙郡年记》）中的一则随笔的名字。在奥尔多的那篇随笔中，他以山中回响的狼的嚎叫去引发人类对自然的倾听和思考，

他警醒我们：人类如果简单地以人的安全、舒适、繁荣、长寿、平静为导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将带来整个地球未来的长久危险。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又一本重要的著作——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⁹的《寂静的春天》问世。这本书直接批判了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对环境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于是，人类从“征服自然”的思想中清醒过来，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沙乡年鉴》也是在《寂静的春天》问世的时期才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生态整体论”、“生命共同体”这些概念才进入人类发展的重要视野中。在这个背景下，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深度生态学”（也作“深层生态学”）概念，强调人应该打破“小我”的概念而回归到“生态我”，人类应该正视现在面临的与万物失联的困境，以崭新的视角看待自我与万物，并重新建立与万物的连接。这种视角印证了佛教强调无我（去我）的观点，也吸引了佛教生态学者乔安娜·梅西并促使她和夫妇创办了“深度生态学中心”（Institute for Deep Ecology）。此后约翰·席德、乔安娜·梅西、佩德·福连明陆续在世界

2. 约翰·席德，澳大利亚环境运动家。他创办的“雨林咨询中心”成功促使南威尔斯的副热带雨林得以保留，继而在南美洲、亚洲和太平洋开创许多保护雨林计划。

3. 乔安娜·梅西，美国环保学者及运动人士，研究领域包含佛教与深度生态学。

4. 佩德·福连明，诗人，兴趣包括研究、种植、医药植物的写作和咨询，成立了旷野诗社。

5. 阿恩·奈斯，著名挪威哲学家，深度生态学创始人。受《寂静的春天》影响，于1973年提出深度生态学概念，并融合甘地的非暴力抗争的生态学观点，建立环境运动的直接行动准则。

6. 中文版由台湾红桌文化于2015年出版，翻译黄懿翎，编辑陈玟如。

7. 奥尔多·利奥波德，美国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观察家、思想家、文学家。

8. 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一生的观察日记，1949年出版。反映了生态和道德之间的内部关系，也是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9. 蕾切尔·卡森，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著有《在海风下》、《海的边缘》、《环绕我们的海洋》等多部科学人文作品。《寂静的春天》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于1962年出版。

各地举办“众生大会”（Council of All Beings）——一个深度生态学心理工作坊。在工作坊中他们运用原住民或远古的思维模式，带领参与者回溯地球的演化，用角色替代的方式协助参与者去除“小我”以共情其他形式的存在，去感受因为人而带来的其他存在的苦难，重新连接与万物的关系，体会人与万物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感受。这种重新连接与回归同样回应了人在面对生态破坏与社会冲突中的失落与痛苦，通过与大自然的连接找到人在身体、心灵以及外在环境的平衡。《像山一样思考》正是四位学者在深度生态学中的对话或散文集，也是“众生大会”工作坊的指导手册。

当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我急切地希望从这本书中看到“深度生态学”的定义和论述。我想象的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前瞻性科学理论著作，但看到书后似乎有点失望。整本书如诗如画，大部分都以诗歌、散文配绘图而成。看完之后我无法定义“深度生态学”，但好像从感性上又感受到了这种学说的精髓；可是要让自己对他人阐释又显得模棱两可——说不清道不明。而后在网上搜索，对“深度生态学”的解说是非常少的，大多只能看到这个观点是阿恩·奈斯于1973提出的。这一度让我很犯难，倘若我要以“深度生态学”的角度把这本书——《像山一样思考》介绍给大家，怎么能说清楚呢？当我准备落笔于此文时，才恍然大悟，不是这四位学者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深度生态学”，而是这个概念本来就有别于传统逻辑知识的理论，很难用概念化的文字抽象其含义的。我的理解是，“深度生态学”是一套重新阐释人类文明的方法，在远古时代人类与大自然是天然

连接的，人通晓和顺应宇宙的规律。农耕文明带来人划分彼此的第一次割裂——人类开始发现可以掌握一些东西发展自己，“我”与万物慢慢被分离。当然这种分割在那个时代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我们的文明也建立在这个分离的基础之上。到了工业文明，这种逐利为我所用的思想不断膨胀，人与万物的分离也到了最顶点。我们在近现代建立的所有学说几乎都是建立在一种分割观点之上的，这种分割不断扩张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危机、社会结构的暴力以及人自身的迷失；而我们又太习惯从这种分割、掌控的观点出发去寻求解决之道——我们可以运用科技寻找新的能源、可以运用科技抑制地球变暖、可以运用科技无限延长人的寿命……这些都是源于我们对于人类可以掌控一切，处于造物之首的执着（佛教所说的“我执”）。而“深度生态学”就是要去除人类的自我执着——我们太执着于理论的思索，而忘却了心的感知。“众生大会”工作坊，就是要人忘掉理论与语言的束缚，把人还原到与万物感性连接的位置。我的理解是这种连接不仅仅是感知的连接，更是一种万物共有意识的连接，是一种万物归一的感觉（holism），所以我们在其中不仅仅是看到苦难更是看到希望——在与万物分离几千年后，终于回归的希望。

正因为如此，《像山一样思考》这本文集才那么随性、那么自由，散文、诗歌、绘画、工作坊文字纪录都将这种深层次连接展现无遗。我们要怎样才能明白“深度生态学”呢？还是要如以前一样透过头脑去读大部头的论述、著作，引经据典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一种不去强调头脑层面知识结构的学说倘若还只存在

于文字的理解，那么导向的方向一定是偏离的。我想这是四位作者开办“众生大会”工作坊的目的：创造一个有别于传统知识灌输式的学习方式，透过体验真实的感受连接存在与需要。所以《像山一样思考》又是一本“众生大会”工作坊的指导和准备手册。细细读来，会发现里面的每一句诗、每一段话都可以直接用到这个工作坊之中。无论你是说哪一种语言的人，用自己的母语直接翻译书中的文字都是那么贴切与优美，这种意境超越了纯理论的枯燥，也不需要你懂得太多，更不是只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们。“深度生态学”相信每个人，不论知识的多寡、不论处于哪个阶层、不论是婴儿或是老人，都能够建立与万物的连接，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万物的一部分。这种连接天然存在，我们只需寻回，无需创造。而人类的问题在于我们偏离连接的道路太久，我们需要重新寻回建立连接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像山一样思考，也一定能像花朵一样思考，也一定能像狼群一样思考，也一定能像海洋一样思考……当我们以万物的角度看待地球与存在，那些因为人类而造成的苦难就会慢慢消失，我们就不会那么残忍地屠杀狼群，也不会那么自我地认为那片矿山只属于我，更不会合成成千上万的化学毒药、武器……



当我们重提与万物连接，特别是强调心灵去感受的时候，难免会疑惑：这种重拾万物的连接是否会导致个人灵修主义呢？正如台版《像山一样思考》导读的作者，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所长林益仁询问约翰·席德：“对个人身、心、灵状态与生态关系和谐的追求和环境运动的抗争与实践，是否有冲突？”约翰·席德回答说：“没有。反而，这两种方式应该是互补的。有人认为深度生态学提倡者仅仅是关注心灵层面的个人的修行者。其实不然，他们也参与对不公平社会结构的抗争。但越是参与抗争，就越是需要面对个人与集体面对冲突所产生的情绪起伏、愤怒与反击等内在心理变化。”参与社会改变的人尤其是站在一线抗争的人可能对此深有体会，面对社会的不公、暴政、掠夺等情景的时候，倘若无法连接到原本的初心（无法回到我与自己、他人、他物、世界整合归一的状态），我们是很容易被暴力控制的。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变成我们反抗的那一方，以暴力回击他们，也以暴力回击我们自己，如此循环，世界还是在原本的不公与暴力当中。所以我们如何处理与自己与更大存在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参与社会发展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想，《像山一样思考》给予了我们新的视角，提醒我们是时候重新理解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以及如何找到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存在之道。■

这是我们喜欢的生活和选择

文 | 米 莱¹

2009年，我在杭州参观阿郎的有机茶园和农园时了解到自然农法。当时我在四川参与地球村²的“乐和家园”建设项目，为了探索农民的产业转型以及乡村环保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对农业的学习和实践并不少，包括做土著生物肥³、深圈养殖⁴、德米特农业⁵等。加上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农转非”之前

也算是半个庄稼汉，对中国南方乡村精耕细作的传统也算是有一定的传承。自从2000年开始追随廖晓义⁶老师从事公益事业，对于农业、环保、大自然、生命、中国传统文化、永续生活等关键词，也逐渐有了一个明朗的认知和态度，从此对于这个领域的人物和著述也常有接触。特别是偶尔得到一本投缘的

1. 作者从2010年开始推行“食育”，而后创办国学书院“北京普润园”及出版自然日记《普米森林——我和食物的故事》。

2.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简称北京地球村）成立于1996年，2008年512地震以后参与灾后重建。

3. 以当地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导致作物得到特定肥料的效应。

4. 日本及韩国的一种自然农法的设计，认为猪舍圈应用自然原理以锯末、树皮、三合土铺成，有利土著微生物生长的深坑圈底。可参考赵汉珪的《自然农业》一书第104至108页。

5. 德米特（Demeter）是人智学理解下的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c Agriculture）的产品品牌，1928年以希腊掌管农业和丰收的女神“Demeter”的名字命名。

6.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书，便觉得书里面写的全都是我想说的话。川口由一⁷和辻信一⁸合著的《自然农法：我的生存之道——信步人生路》⁹一书，正是这样一本投缘的小册子。

的确是一本小册子，字数特别少，而且是访谈录，所以读起来特别轻松。又因为许多话都说到了心坎上，也就是说恰同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以欢喜心有如知己相逢。

川口先生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叔叔都死于战场。整个家庭由一位父亲、三位母亲、一位祖母和十四个孩子组成。这样的情况大概和中国同时代的家庭相似。在我的童年时代，也依然有着类似的乡土生活：艰辛与真

实，快乐与痛苦，约束与自由混杂。而对于川口先生来说，这正是他最终选择自然农法，也由此洞彻生命之道与为人之道的积淀与根源，也是他最终领悟幸福、生死、和平、真理和智慧的基础。

“把田野、山上、小河、蓄水池、附近的寺庙都当成了我们的地盘，玩躲猫猫”，“在河边捉萤火虫、追赶蝴蝶和蜻蜓，等到雨过天晴后跳进河里捉泥鳅……”这样的生活与今天孩子们拥有的手机、电视、网络、空调房比起来，到底哪样更滋养童年的身心呢？再看看那个时代吃的食物吧：“看着榨好的酱油一滴一滴地掉下来，忍不住伸手蘸一点含到嘴里……祖母做好的红薯糖，卷

7. 1939年出生于奈良县樱井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践自然农法，后来又自学中医，从医学和农业两个方面经营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创了以“奇妙的田之会”、“红眼睛自然农学习班”为主的学习场所。著有《站在奇妙的田地上》，1990，新泉社、《自然农法：我的生存之道——信步人生路》，2011，大月书店。

8. 文化人类学者、作家、环境保护行动者。创办民间组织“树獭俱乐部”，并编写了《慢的即是美的》一书，在日本倡导慢生活运动。

9. 社区伙伴有见于对自然农法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促成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年出版。

在筷子上喂给我们吃。”

一本介绍自然农法的书，却在开篇回忆起童年的美好。记得有位教育家说过，我们可能穷尽一生都在追寻童年的美好记忆。儿时的味道、儿时的审美、儿时的感情……我们一生好似一亩田，童年又好似春天的节气，种下的苦乐酸甜的种子都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转化蕴藏。所有的生命都有趋乐避苦的特征，那些受苦的经历并非没有价值，受苦和快乐是一体两面。有人认为快乐的实质是痛苦的终结。受苦容易启发思考。川口先生初中毕业后辍学务农，和大多数60年代的农民一样，使用机械和化肥农药，并因此肝脏受损，患上了肝炎。加上夜校的学习枯燥乏味，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萌生了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但是十年之后，“发现这个世界被污染了，因此魅力荡然无存。最终幡然醒悟……”他看到一种“拒绝美，并赋予丑价值”的社会潮流，觉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价值观，不仅仅局限于艺术，还包括农业、人心、精神以及人生的道路”。在他30岁那年，“得了黄疸，肚子里面积水，人整个都肿

了”。然而医生也不知道原因，也没有办法。他意识到“我们似乎只能过这样一种永远不知道原因的生活”。

艺术往往能给人灵感，当川口先生在艺术上的审美追溯到飞鸟时代¹⁰时，他对农业的审美与价值评判也就追溯到了自然农业时代。“坐火车从关东经过京都，当列车驶进大和盆地的时候，映入车窗的是整面黄灿灿的稻田。我被那样的景致深深打动了……这里才有我所追求的平静生活……从今以后我不再远游，要在这儿继续我的生活，一辈子。”于是在他38岁的时候，“不想继续做错误的事情”，决意在这种毫无变化、单纯反复的农业劳动中实现自己的艺术人生。他在大女儿出生的那一年，开始做自然农法。但这并非易事，“做自然农法做到可以收获稻米和蔬菜，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里，他的母亲坚决反对：“你这样做迟早有一天会吃不上饭的，这样怎么对得起祖先？村里人都在等着看笑话呢，就算妈求你了，别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吧！”在左邻右舍的冷嘲热讽中，他的妈妈连家门都不敢出，最后



10. 一般指公元6-7世纪的日本，此时期的政治中心位于现奈良县的飞鸟地方。

卧床不起，“有一天居然直挺挺地倒在了浴缸里”。但在这样的時候，川口先生虽然困扰揪心，感到不安，但依然坚持着，因为“我的人生是最重要的”、“天无绝人之路”。

读到这里，我们也许能明白，任何在技术上遇到的困难都不算什么，最难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有多强大，信念有多坚定。这种笃定绝不是碎片的知识和技术所能支撑的，而是源自对这个世界和生命真相的理解。

“就像地球上不可能只有人类生存繁衍一样，水田里不可能只长稻子，菜地里不可能只种卷心菜……在田里各种杂草和小动物们一起生长，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存活半年，死后的残骸又将孕育其他生命”，“自然农法是一种对自然的经营，是对有生命的作物们顺之、应之、从之，然后任其发展”。这就是自然农法的三个关键词，然后我们会发现，“到今天为止人类其实做了许多多余的事情”，“只有我们真正了解每个生命个体及这个个体世界，才能做到正确运用知识和头脑来顺应之、呼应之、然后任其发展”。

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在十年的坚守中，为了养家糊口，川口先生不得不委屈求生，外出打工，甚至到使用农药化肥的种子公司上班。当实在无法忍受那违背他的生命之道与为人之道的工作时，他决定辞去工作，带着三个孩子，过上了如同他童年时代的幸福生活。“虽然没有收入，但是能和孩子们悠然地生活，做正确的、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用去理会别人的目光和评价……我们把从自家田里收获的小麦磨成粉做煎饼，做好米团子和面团子用火烤来吃，自己做豆腐和纳豆，酿酒……我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很

多农家才有的游戏。”在书的后半部分，川口先生谈到对幸福的理解：“自然农法本身就是对‘幸福在哪里’，‘从哪里才可以得到内心平安’的追问。”而答案就在找到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自我之道的统一。这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在我们100年的寿命里，必须在进入壮年期之前找到生命之道、为人之道、自我之道。”

但是每个人成长的方向都不尽相同，选择往往都是主观的习性所决定，希求什么就会吸引什么，就会琢磨什么或皈依什么。很显然，川口先生是深受道家思想所影响的。自然农法就是道法自然、无为而为、天人合一理念的农业实践。他对中医的理解深刻，运用得心应手，而中医正是道家智慧的大用。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是对立的二元论，而是相互转化的一体两面。所以书中反复讨论了强悍和柔弱、有益和有害、个体与整体、生与死等等看似对立，实为统一的命题。“在人类社会，如果掉入相对界，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事物的话，将会招致不幸”，“生和死都是同一个生命活动、都同样重要。我们生之喜悦，也逝之怡然。”生活中处处都需要全然的智慧。比如生病了，医生的治疗与身体的痊愈是统一的；城市与乡村是统一的；勤劳与慵懒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整体观，并不是否认事物的区别与界限，而是要明白事情的度，“每个人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形成了自己对‘刚刚好’的感觉”（辻信一），“无过也无不及”，“每个个体都应该活好自己的本分”。

自然农法正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活好自己本分的体现。在技术上有三条原则：不耕种、不用肥料、不以虫草为敌。对于当代的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颠覆性的理念。在川口先生看来，自从人

类以耕作的方式代替了采集，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而石油农业正在加速走向这条不归路的尽头。大量的农业人口在化石能源的支持下变得轻松，而且还提高了产量。这看似是一种进步，但许多人都不知道，“自然界背上无数无法还清的欠债”，“并非只是能源问题……如果吃到嘴里的东西有损身心的话，将会导致我们的肉体衰退、精神颓废、生命力消弱，直至一步步地走向衰亡……”

所以真正的永续生活，必须回到生命的源头寻找答案，而不是让新的更大的错误环环相扣，越走越远。生命的源头与真相在土地上就一目了然，如果人们不以翻耕的行为破坏土地中的生命体，“自然会孕育出让生命丰盈的舞台”。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人类仅仅是大自然中相互依存的众多生命中的一环，

就不会与杂草和虫子为敌，因为杀死他们就会孤立我们自己，等同于自杀。

这些道理对于稍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人来说非常简单，但果真干起来不一定有这个魄力和定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被虫子吃光，被草欺死，最难熬的就是我们的这颗心。如果没有对真理的信心，对生命的彻悟，对得失的放下，就算是自己咬牙挺着，也熬不过别人的口实。

现在好了，有川口先生这样成功的先行者，有事实为依据，有书可以读，有地方可以学习，有这个理想的后来者应更有力量。但一定要记住川口先生的忠告：不要说你们错了，不要说我们才是正确的，不要说我们在拯救世界。要是有人问起，有人质疑，就说这是我们喜欢的生活和选择。■





社區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